社会救助立法挑战 16
2023年经济如何重回合理区间 42
万亿个人养老金开闸 48
海淘式微 58
雅万高铁效应 70
室内氡超标争议背后 82

财新周刊

Caixin Weekly



解封进行时

以科学务实的防疫策略寻找回归正常生活之路

P.24

2022年12月1日晚，广州，地标广州塔亮出"人人都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等滚动标语。

2022年 第47期 12月5日出版
总第1033期
邮发代号：32−235
ISSN 2096-1251
定价：人民币40元 港币60元 www.caixin.com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最新封面报道｜解封进行时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2年第47期 出版日期 2022年12月05日

以科学务实的防疫策略寻找回归正常生活之路

文丨财新周刊 许雯 蒋模婷 崔笑天 刘登辉 赵今朝

11月30日下午2时许，居家办公第25天，方圆忽然听到了汽车马达的轰鸣声。她向窗外看去，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广州大桥上的红色路障，正在被拆除、挪开。

方圆在广州出生、长大、工作，生活了26年。她住在珠江畔，靠近广州塔等著名地标，跨过广州大桥即可到达珠江新城，车流人声喧哗本是日常。

但在11月5日，周遭静了下来。方圆所处的疫情“震中”海珠区宣布全域管控。11月11日，管控措施升级，以河江为区界的海珠，所有跨区桥梁均被封堵，形同“孤岛”。虽曾缩小临时管控范围，但在11月28日，海珠区仍宣布主要区域社会面管控措施将延长至12月2日24时。隔江相望的天河、荔湾、番禺等区，同样处于大范围管控中。

仅仅过了两天，变化骤然降至这座素有“改革开放前沿地”美名的城市：11月30日下午，广州各区陆续宣布，即时解除各临时管控区的管控措施，按低风险区管理。

在疫情持续三年后，广州成为国内首个日增感染人数近万时，仍放弃社会面管控、积极应对防疫新形势的城市。在石家庄探索放松社会面管控历经反复后，广州再举，引起举国关注。

消息传出，不少广州市民立即走上街头，围观铁马拆除，欢声庆祝。方圆第一时间开车到白云区，接回了住在医院参与抗疫、疲惫不堪的护士妈妈。

“感觉恢复了生机。”方圆感叹。11月30日晚，广州各区陆续发布复工复课、恢复堂食的通告，不少商家甚至来不及备货开张就到了往常的打烊时间，只得先贴出复工的海报，招呼顾客明日光临。到了深夜，街上仍灯火通明，不少市民聚集到酒吧、大排档，看起了世界杯。

更积极的信号在这天深夜抵达——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国家卫健委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方面专家对优化完善防控措施的意见建议。晚11时许，这则消息随着央媒的报道，传到各个角落。

孙春兰发言提到：“随着奥密克戎病毒致病性的减弱、疫苗接种的普及、防控经验的积累，我国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新任务。”

“走小步、不停步”——发言再次强调防控政策优化的节奏，也给出下一步的路线图：不断完善诊断、检测、收治、隔离等措施，加强全人群特别是老年人免疫接种，加快治疗药物和医疗资源准备。

变化的先声已至。“堵不如疏。”在国家药监局疫苗及生物制品质量监测与评价重点实验室主任、公共卫生专家陆家海的观念里，引导人们从被动执行防疫规定，到主动采取正确的防疫措施，无疑才是新冠疫情带给我们最宝贵的经验。



2022年12月1日，广州市海珠区叠景路鹭江社区出入口外，解除管控后，拆掉的水马散落在街边，部分解封市民陆续离开。图：梁莹菲

当前，疫情在全国呈快速蔓延之势，此时防线仍在，优化防控政策还有宝贵的窗口期，但时间紧迫。

一切都还是现在进行时，能做和要做的还有很多。

11月最后一天

这是极不寻常的一天。

似不约而同，防疫措施调整的消息在11月30日纷至沓来。从南到北，广州、深圳、重庆、成都、北京、石家庄、沈阳，最新优化防控措施接踵而至。

尤以广州最受瞩目。这天下午，广州天河区、番禺区、从化区、荔湾区、南沙区、白云区齐齐发布通告，宣布临时管控区即时解除管控。

在此之前，广州防疫形势一度甚为紧张。11月初，各区划定大范围临时管控区，管控区内执行严格的封闭管理，市民生活、工作节奏再被打乱；下旬，海珠区多个管控区出现街面聚集风波，人员冲卡现象时有发生，社会管理情势严峻。

选择在此时解封，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当时广州疫情上升趋势也暂未得到缓解，日新增感染者仍在高位运行，

感染者累计已达15万例。

意外的不止公众。财新获悉，当天上午，广州市疫情防控会议尚在强调疫情攻坚，但临近中午时，最新防疫精神由省级传达到广州市级；几个小时后，广州多区即宣布解封。这颇为戏剧性的一幕，记录了这倏然而至的变化。

也是在这一天，历经十天"静默"的石家庄，再度出现转机。"二十条"（《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发布后，石家庄因率先在全国取消常态化核酸检测吸引了众多关注的目光。但这次"大胆"的尝试没有持续太久，一周后，石家庄于11月20日启动全员核酸检测、居民原则上居家，原本11月25日结束的封控措施，又再延长至11月30日。

石家庄市民杨阳在过去的十天除了下楼做核酸检测，几乎没有出门。路上行人稀少，路边商户大门紧闭，间或几辆出租车疾驰而过，有些萧索。

防疫政策在调整中似又回到原点。

但在11月30日晚间，石家庄又突然宣布解封。石家庄疫情防控总指挥部发出通知，要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是有限度的，一度取消的常态化核酸检测将重新回到杨阳的生活——进出公共场所仍需持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入睡前，他接到了小区解封的通知。

重庆紧随其后。当天晚间，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新闻发言人杨琳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主城区将逐步放开。这座城市眼下也正经受着疫情三年来最严重的冲击，感染者已逼近10万例。

沈阳也在这天宣布，调整市内九区防疫措施，有序恢复经营活动。沈阳同样面临严峻局面：日增感染者近200例、疫情未现拐点。

郑州则自11月30日零时起，解除要求居民非必要不外出的流动性管理，转入常态化疫情防控，有序恢复经营活动。

核酸检测优化措施也在11月30日密集出台。成都取消进小区查验核酸检测结果；重庆强调不加码核酸检测，有针对性地对部分群体"精准免检"；北京也在这天宣布，即日起全市长期居家老人、居家办公和学习人员、婴幼儿等无社会面活动的人员，如果无外出需求，可以不参加社区核酸筛查。

广州、深圳、重庆更在这天直截了当提出，对密切接触者，符合居家隔离条件的可居家隔离。

凡此种种，各地官方通告已是目不暇接；深夜时分，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国家卫健委座谈会上的讲话公开发表，更将气氛烘托至顶点。

座谈会上，张伯礼、沈洪兵、王军志、梁万年、杜斌、冯子健、杨维中、董小平等八位专家作了发言，对优化完善"二十条"措施提出意见建议。八位专家分涉中医、疾病预防、疫苗研发、公卫疾控、重症救治、病毒研究等多个领域，几乎涵盖疫情防控中各科学层面。据财新向参会专家了解，其未得到授权，暂不便对外披露他们的建议。

孙春兰充分肯定专家在防控中的重要贡献，希望继续发挥专业优势，发扬科学精神，围绕关键问题深化研究，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献计出力。

她还在座谈会上提到：我国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新任务。这与几日前表态的重点明显不同。孙春兰11月21日至27日在重庆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时，她强调的是，推动"四应四尽"、日清日结，压实"四方责任"，加快疫情较轻地区社会面动态清零进度。

突然而至的变化并非无迹可寻。11月29日，《人民日报》刊发署名"仲音"的文章《坚持第九版 落实二十条》。文章指出，必须充分认识到，第九版防控方案和"二十条"优化措施二者缺一不可，绝不能因为有了"二十条"优化措施而放松严防严控，也不能因为严防严控而对"二十条"优化措施再进行"层层加码""一刀切"或者简单化。

就在同一天，浙江省委宣传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表的文章《"人民至上"不是"防疫至上"》广为传播。文章中，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疫情防控是为了防住病毒，不是为了防住人；从来只有"人民至上"，没有所谓的"防疫至上"。文章还不留情面地批评了地方防疫走偏：近来有的地方借防疫之名"层层加码"，滥用权力、为难群众，导致防疫变了形、走了样。



2022年11月26日，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新建村，居民要求村委会公开有阳性病例的楼栋，并解封其他低风险楼栋，因沟通无果，百余居民自行拆除了围挡。图：丁可（实习）



2022年11月26日，北京市通州区天赐良园，有解封意愿的居民与社区工作人员沟通，民警在旁协助维护秩序。图：丁可（实习）

分别出自中共中央机关报和地方宣传部门之手的两篇评论文章，在舆论场发酵。当天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虽然重在面向公众科普的发布会内容让不少人期望落空，但实则意义重大：在这次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突出强调了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的重要性。就在发布会开始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工作组发布了《加强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方案》。

众所周知，老年人是疫情大流行时最应该保护的脆弱人群之一，疫苗接种是预防老年人感染新冠病毒后进展为重症的保护伞，也是防疫策略再调整的基石。将老年人保护置于重要地位，是不少国家和地区决定解除严厉封控时的关键部署。官方在此时将老年人疫苗接种提上重要议事日程，意味深长。

无论何种意义上，11月30日都是标志性的一天。

而在此之前，以"二十条"为起点，更大的变化正在全国发生：在北京和武汉，众多低风险社区响应"二十条"和民众呼声，解除不合理封控；更有基层回应居民诉求，探索特殊人群居家隔离；自采核酸、"精准免检"，地方政府为防疫措施优化作出更多积极尝试。

各地的自选动作，既是对"二十条"精神的遵循，也是对防疫措施再优化的探索，更对未来充满启示。12月1日，孙春兰在国家卫健委召开座谈会，听取防控一线代表对优化完善防控措施的意见建议。她强调，总结基层经验做法，推动防控措施持续优化。

封控本是为了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其最终目标，是为了让民众的生活恢复常态。遍观全国，各地已经朝这一方向作出了诸多努力。

纠偏封控加码

对北京柏林爱乐小区的居民来说，封控来得太过突然。

那天下午，一纸通知信，带来临时管控的消息。11月25日，小区所属的鑫兆佳园社区居委会发布致全体住户的一封信，信中称将对小区进行为时三天的临时管控，人员只进不出，封控从当晚8时开始，至11月27日24时解封。在这之前，小区有阳性人员，涉疫单元楼已经封控，其他楼栋仍为低风险区域。

临时封控发生在"二十条"落地生效与北京疫情高位徘徊的交叉点。始自国庆节假期的北京新一轮疫情迁延两月，日新增感染者已突破北京历史高峰，这也是疫情三年以来这座城市面临的最棘手问题。11月23日起，北京不少社区陆续开始为期三天或五天的临时管控。

"大概下午4点，社区公众号发了通知，说要临时封三天。"看到居委会的通知信，小区居民张琦感到不解，"这算层层加码吗？可以投诉吗？社区究竟有没有封控的权力？这样的一纸文件真的有法律效力吗？"

"我们必须争取自己正常生活的权利。"当天下午，张琦和邻居们陆续在小区微信群中对封控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提出质疑，并表达对小区封控后消防隐患的担忧，要求社区细化解决方案。

在居民们看来，"二十条"已有明文规定，高风险区"以单元、楼栋为单位划定，不得随意扩大"，社区因发现阳性人员就封锁大门，限制全社区人员自由出行，违背中央精神，临时管控措施也与低风险区域管控方案不符。而且小区被封由居委会下达指令，缺乏法规明文依据，执行程序不规范。

但无人回应。质疑在居委会的沉默中持续发酵，当晚"封控令"即将生效前，居民走到小区门口要求解封，沟通无果后有人报了警。

人越来越多。更多的居民向小区门口聚集，在警察在场的情况下，居民与社区居委会开始对话。在一段在场居民录制的视频中，社区工作人员向周围居民解释，"我们也是刚接到通知，（小区）临时封三天，目的就是让大家静下来，周日晚上解封，不耽误大家周一上班，如果有就医需求和其他急事，登记一下是可以出的，不知道我这么解答能不能回应大家的疑问？"

"高风险区以单元、楼栋为单位划定，不得随意扩大，这是'二十条'规定的。""按照法律，县区级以上政府才有权力作出封控的决定，如果是政府要求封小区，那请出示红头文件。""可以倡导，但不能强制。"有居民高声喊道。

当晚10点，这场在寒风中持续近两个小时的沟通，以达成理解与共识宣告结束。在场的常营乡乡长允诺，小区当场解封，拆除封堵铁皮，并倡导小区居民在即将到来的周末居家，非必要不外出。"可以！"在场居民一口应下，人群中响起掌声。

居民表达诉求有理有据有秩序，社区和政府积极回应诉求——回看这一晚，张琦觉得这些都是达成良好结果的必要前提，缺一不可。

这次被视为"教科书级别"的协商，以短视频形式在社交媒体广为流传，成为北京不少小区居民表达合理诉求的参考范本。当晚北京朝阳区多小区回应居民诉求，对标"二十条"精神，解除临时管控，拆除隔离物。

"看到朝阳区部分小区在居民集体努力下解封了，还是很羡慕的。"北京房山区的陈小天也有相同遭遇，因部分单元出现初筛阳性人员，她所在的小区从11月25日零时开始临时管控，人员只进不出。

"这明显和'二十条'不符，我知道得很清楚。"她曾在单元住户群中要求社区人员解释，但没有得到回应。

看到北京越来越多的小区解封，她决定不再等。11月26日傍晚，陈小天和十来个邻居来到小区门口，质问防疫人员为何不解封，“大家提前做了准备，拿‘二十条’‘九不准’作为依据”。

小区物业经理打电话叫来了居委会主任。“我们小区比较大，有三个居委会主任管。他们陆续都来了，很年轻，态度也很好。我们说他们违规违法，他们说也只是执行上级指示。”面对面的沟通持续了两天，人群渐渐在寒风中散去，只剩下两个女孩在门口僵持，居委会工作人员为她们送来了暖宝宝。

“大家都能互相体谅，最终还是达成一致了。”就在当天下午，北京疫情新闻发布会重申严禁采取硬质隔离、硬质围挡，封堵消防通道、单元门、小区门；临时管控原则上不超过24小时。发布会结束后，小区的门打开，解封了。

听到消息后，陈小天特意出门转了一圈，“平时我很宅不出门，但当天就是觉得应该这样，应该庆祝”。

北京之外，变化也正在发生。陈小天远在长春的妈妈告诉她，自己和邻居正准备遵从“二十条”精神和居委会沟通，争取小区解封。

10月以来，全国疫情持续胶着，居委会以发表公开信、倡议书的方式封控小区，此类情形屡见不鲜，有的甚至用铁皮围挡封住整个小区，居民反应强烈。

多名法学专家向财新指出，居委会不是政府机关，没有行政职能和执法权限，以居委会名义出台的临时管控措施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明显违反“二十条”要求。

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宋华琳表示，中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由此，居民委员会是一种自治组织，并非行政机关。而封控小区是一种限制行为，只能由法律授权的行政机关才可以作出决定，以居委会名义封控小区没有法律依据。

部分“加码”防疫措施与现行规定对比

地方防疫措施	“二十条”	第九版防控方案
时空伴随	● 及时准确判定密切接触者，不再判定密接的密接。	❶ 优先判定和管理与病例接触频繁、持续时间长等感染风险较高的密切接触者。对于人员较为密集复杂的病例活动场所（如餐厅、娱乐场所、超市等密闭空间场所），可适度扩大密切接触者判定范围。 ❷ 对与感染风险较高的密切接触者同住、同餐、同工作（学习）、同娱乐（如棋牌、卡拉OK）等长时间密切接触人员判定为密接的密接。
封控小区 划定临时管控区 全城“静默”	❶ 将风险区由“高、中、低”三类调整为“高、低”两类，最大限度减少管控人员。 ❷ 原则上将感染者居住地以及活动频繁且疫情传播风险较高的工作地和活动地等区域划定为高风险区，高风险区一般以单元、楼栋为单位划定，不得随意扩大；高风险区所在县（市、区、旗）的其他地区划定为低风险区。	❶ 发生本土疫情后，根据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活动轨迹和疫情传播风险大小划定高、中、低风险区域。 ❷ 将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居住地，以及活动频繁且疫情传播风险较高的工作地和活动地等区域，划为高风险区。高风险区原则上以居住小区（村）为单位划定，可根据流调研判结果调整风险区域范围。 ❸ 将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停留和活动一定时间，且可能具有疫情传播风险的工作地和活动地等区域，划为中风险区，风险区域范围根据流调研判结果划定。 ❹ 中高风险区所在县（市、区、旗）的其他地区为低风险区。
全员核酸	❶ 没有发生疫情的地区严格按照第九版防控方案确定的范围对风险岗位、重点人员开展核酸检测，不得扩大核酸检测范围。 ❷ 一般不按行政区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只在感染来源和传播链条不清、社区传播时间较长等疫情底数不清时开展。	● 疫情发生后，经流调研判，传播链不清、风险场所和风险人员多、风险人员流动性大，疫情存在扩散风险时——城市：省会城市和千万级人口以上城市疫情所在区/一般城市疫情所在市的城区/农村地区疫情涉及的自然村、涉及乡镇政府所在地及所在县城，每日开展一次全员核酸检测，连续3 次核酸检测无社会面感染者后，间隔 3 天再开展一次全员核酸检测，无社会面感染者可停止全员核酸检测。



注：各地目前正根据“二十条”和第九版防控方案陆续调整上述加码行为，还有许多地方在观望；根据孙春兰11月30日国家卫健委座谈会最新防疫精神，以及恢复正常生活的需要，防疫措施第一轮优化后，未来还将进一步调整。
资料来源：国家卫健委官网《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

居委会以公开信、倡议书的方式封控小区，更无法可依。宋华琳指出，中国《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二条、四十三条明确规定，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可以采取紧急措施，并予以公告。这意味着，采取措施前必须向社会公告，公告必须由县级以上政府发布，以居委会名义发布的封控通知，实则无法律依据。

表达、回应、沟通，进而达成共识，湖北武汉的王然也刚刚经历了一场小区解封前的交锋。她住在武汉江岸区塔子湖街道金桥汇小区，在这之前，小区一直没有阳性病例，但无故封控5天。11月27日，不愿被继续无理封控的居民们来到小区门口，要求社区落实“二十条”，其中不乏年事已高的老人。几番沟通，社区最终解封。

王然的经历并非孤例。据财新了解，11月27日武汉多个小区响应居民诉求，提前解封。

广州的变化是自上而下的。在广州解除临时管控的当天，广东省内佛山、中山、清远也相继跟进。

临时管控区实则是地方政策产物，本质上仍然是自行加码。11月11日发布的优化防控措施“二十条”，已提出取消中风险区，高风险区一般以单元、楼栋为单位划定，不得随意扩大。这意味着大规模社会面管控将不复存在。但面对秋冬季奥密克戎疫情，各地取消中风险区后，不到两周即普遍采用“临时管控区”名义，继续变相封小区、封区甚至“封城”。

在多地迎来解封潮之际，持续“静默”的辽宁锦州决定坚持封控措施。12月1日，锦州防疫指挥部发出《关于当前疫情防控措施的几点考虑》，称疫情防控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在短期内就可以实现“动态清零”的情况下，不应当放弃近十天以来的努力，“能清零而不清零，实在是太可惜了！”此番表态引发民意反弹，次日锦州再发出通知解除封控，全市有序恢复秩序。

从科学角度，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病毒学专家金冬雁对解封小区完全支持。他以香港为例说，疫情高峰时香港最多有50万—70万人感染，在没有采取封控措施的情况下，疫情也自然回落，感染者数量由70万人降至千余人。他认为，防疫关键不在于封控小区，而是保护老人，“老人保护好了，社会就是安全的”。

有熟悉防控的人士称，在对严重疾病的疫情防控中，设定真正的“临时管控区”仍有一定的必要性。“比如在流调溯源、追查密接的时候，可能会对一些场所临时封闭，等待最终核酸检测结果。”他认为，临时管控的时间不宜太长。

北京市于11月27日宣布，临时管控的时间原则上不超过24小时。济南市11月29日发布规定，对划设时间已达48小时的临时管控区，经排查没有风险后应及时解除管控。

探路精准检测

新冠疫情三年，核酸检测是确诊的“金标准”。随着今年以来各地常态化核酸采样点迅速铺开，“应检必检、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一度成为口号；在有些地方，不参加全员核酸检测甚至会被赋“黄码”。

陆家海直言，核酸检测确实在疫情防控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主要是在德尔塔毒株之前。当时的病毒致病性很强，但现在奥密克戎已成主要毒株，要想精准防控，检测方式也需要作出适时调整。“要基于症状检测，有症状的人才可能发展成重症。”

核酸普测的强执行在本周悄然“松动”了——一些地区对无社会面活动的人员实行免检，以求减少聚集感染风险，节约核酸检测资源。这被称为“精准免检”。

11月30日起，北京全市推行“精准免检”。“如果没有社会面活动，同时周围又没有感染者和密接者，他们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并不高。有针对性地免检是对这部分人群更好的保护，也有利于集中精力用于真正风险人群的筛查。”北京市朝阳区副区长孟锐在前一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11月27日、29日，广州与郑州也宣布除高风险区外，无社会面活动的人员如无出行需求，可不做核酸检测。

对24—72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查验也在放宽。12月2日，成都宣布除进入医疗机构外，居民出入公共场所只需要持绿码；广州进入公共场所、门急诊就医也只看绿码，多个社会面核酸采样点暂停，工作人员收到撤回通知。这两地均强调“不得扩大核酸检测范围”。12月5日起，北京无48小时核酸证明将可搭乘公共交通。

在“二十条”与新冠第九版防控方案中，并未提到“常态化核酸”的字眼，仅是要求限定全员核酸检测范围，并对快递、外卖、医疗机构就诊患者等风险岗位、重点人群开展核酸检测的监测预警。随着各地根据“二十条”精神优化防疫措施，常态化核酸查验适时退出是题中应有之义。

还有部分地区在采样方式上有所突破。11月23日，北京市丰台区26个街道试点核酸自采。五日后，新村街道万芳园社区居民何辛雨接到居委会通知，可以提供以家庭为单位的核酸自采服务，1户1管，每管可做1—5人，超过5人加一管，每户按人数领棉签。自采者需要在“声智健康”小程序上注册，添加家庭成员及试管码，采样后在指定时间内将样本送至社区专用箱内。

居委会在通知中特别说明，“自检为自愿原则，因软件为测试阶段，不保证出具结果时间，请慎重选择”。社区附近的常态化核酸检测点也正常开放。

核酸自采的量有限，何辛雨所在的社区每日只发放100管，10时发放。“大家热情高涨。”她说。11月29日，她提前10分钟来到社区领取，却发现前面已经排了十几人；领取时不需要扫健康宝及登记信息，但送回样本时需要登记门牌号与每户人数。

全程体验下来，何辛雨感觉操作有难度：一方面，虽然看了一遍视频教程，但采样时还是很难擦到扁桃体；另一方面，小程序注册、绑定较为繁琐，老人使用存在一定困难。

此外，相较专业人员采样约12小时出结果，核酸自采的结果出得也更慢。小程序显示，何辛雨11月29日11时采样、18时核收，检测机构是北京博奥医学检验所，核收后约20个小时才出了检测结果，可以同步到健康宝。

核酸检测对采样规范性要求不低。据《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标本采集技术专家共识》，采集口咽拭子时，需适度用力来回擦拭双侧咽扁桃体至少3次，然后再擦拭咽后壁3—5次，拭子进出口腔时应避免触及舌头、悬垂体、口腔黏膜和唾液。

如果咽拭子未刮到上皮细胞，会在检测时导致检测试剂的内对照“预警”。

即便采集到足够量的细胞，但若采集部位不当、采集深度不够，也会导致采集到的细胞绝大部分都不含病毒，造成假阴性。这些问题内对照是发现不了的，只能通过加强对采集人员的培训与考核加以规避。

因此，《新冠病毒标本采集和检测技术指南》中明确规定，从事标本采集的技术人员应当经过生物安全和实验室检测技术培训，熟练掌握标本采集方法和操作流程，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如今，居民自采水平参差不齐，且未经统一培训，将会导致核酸检测的准确性进一步下降，意义有限。自采推行后，博奥医学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自采样本到达实验室后，后续的检验流程和专业人员采集的样本无区别，不排除自采样本出错概率更大这种可能性，但他没有向财新透露自采样本的检测失败具体数据。

除北京外，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的康巴什区也在11月14日起推行核酸自采，但主要是面向居家隔离人员——这属于重点人群，带来的漏检风险更高。社区为每人一次性发放10至15管，10人一管，每天由居民自采，社区上门收集。

在相关标准、规则都尚未明晰，自采的灵敏度、特异性缺乏公开的试验数据支持的情况下，国家对核酸自采采取默许态度。11月29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医疗应急司司长郭燕红称，注意到有的地方开展核酸自采工作；她仅强调要特别注意自采核酸的规范性、有效性和安全性，要制定完善的实施方案，同时要做好组织实施，加强技术指导。“因为采样的质量规范性和安全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即便是自采核酸，也要保证采样的质量。”



2022年8月22日，陕西西安一小区内，医务人员上门为居家隔离人员进行核酸采样。



2022年11月12日，广州市荔湾区居民进行抗原自测，并将自测结果通过穗康小程序上报。

自采的推行初衷或是减少核酸检测过程中的聚集性感染，亦可减少混管检测阳性后的核验压力。本轮北京疫情前期披露的风险点位中，一部分是社会面核酸采样点。11月19日至21日，房山区披露了约30个核酸采样点为涉疫风险点位；通州区则披露了约60个核酸采样点。除居民区附近点位，也包括高速路口、医院等，部分采样点如公议庄村武馆（中生京益）采样点、于家务延芳广场采样点反复出现，疑似引发聚集性传播。在防疫过程中，北京各区逐渐减少社会面常态化采样点数量，并在社区内统一组织居民进行检测。

可以看出，核酸检测规则虽有松动，但惯性仍在。实际上，如今相比于试点核酸自采，以及在城市范围内推行常态化核酸检测，在特定群体推行抗原的居家自测或是更优选择。这不仅有数据支持，也有先例可循。

抗原自测已在全球普遍实行，应用场景是有症状人群、密接或参加聚会前。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建议出现阳性结果需要隔离在家至少5天；若阴性结果建议在24—48小时后进行重复自测，降低假阴性风险。自测者用鼻拭子采集鼻腔样本后，将拭子头浸于保存液，再将保存液滴在检测卡上，等待几分钟可出结果。

多国曾在一个时期内免费发放抗原试剂盒，以缓解医疗资源紧张、控制疫情传播，如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日本等。

相比核酸检测，抗原检测测的是病毒表面的蛋白而非核酸，因此无需提取与扩增，可以将采样到查询结果的时长从6小时压缩到15分钟内。但从方法学上看，抗原检测的灵敏度与特异性更低，这意味着会有更多的假阴性和假阳性，适用于高风险、高流行率的地区使用。

现今大规模核酸检测在真实世界中的准确率，受到采样员的操作手法、混采的样本稀释、检测员的操作手法等因素影响，难以确定，这为抗原自测带来更多机会。

金冬雁认为，对于假阴性，尽管单次抗原检测的灵敏度低于核酸，但连续三日抗原自测的准确率与核酸差别不大；对于假阳性，香港每日的感染者中约有60%—75%是通过抗原检测报告的，香港会对这些人进行核酸检测的抽

查、复检，“（核酸）复检（和抗原结果）的不符合率基本在2%以下”。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文件，抗原自测在症状出现前1—3天和发病后5—7天、病毒载量高（Ct值≤25—30）的患者中效果最好，其建议对抗原试剂盒的最低性能要求是灵敏度≥80%、特异度在97%—100%之间。国内现已获批的抗原试剂盒灵敏度在75%—98%区间、特异性在95%—99%区间。

关键在于，抗原自测乃是居民察觉症状后自行检测就医，与大面积筛查后的封控措施方向有别，更适合生活常态化场景，消耗的公卫资源亦大为节省。

世界卫生组织在9月份发布的一份政策简报中提到，可将抗原检测作为确认新冠病毒感染的可行替代方法，尤其是在核酸检测不可用或结果不及时的情况下。尽管抗原检测不如核酸检测敏感，却是对最具传染性的新冠感染者的快速、廉价和用户友好的检测方法。

今年3月，多款国产试剂盒陆续获批，抗原自测开始在国内应用，但仅作为核酸检测的补充手段，而非代替。因此，在各地落实中，核酸检测仍是绝对主流。

到了本轮北京疫情，抗原检测的应用明显上升，传递积极信号。据财新了解，有社区会为阳性人员以及其左邻右舍发放抗原试剂盒，要求连续每日自测；有社区鼓励居民自备抗原试剂盒，检出阳性居家隔离；有社区面向到访过风险点位的居民发放抗原试剂盒，可自行领取；还有社区要求跨区回来的通勤人员做抗原检测。12月1日，北京要求医疗机构不得拒绝无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患者就医，可以现场补测抗原代替；广州鼓励家庭自备抗原试剂盒。

有抗原试剂盒生产企业人士透露，近期北京向他们下达了保供任务，且要求的量比以往都大。据财新了解，抗原试剂盒的供应尚可，电商平台未有缺货现象，每人份均价在4—6元，政府采购价则可降至2元以内。今年国家放开抗原试剂盒审批后，曾有一批企业积极扩产，若工厂无疫情影响，头部企业的日产能可达千万人份。

金冬雁还分析称，抗原检测筛查出的都是最具传染性的人。部分核酸阳性但抗原阴性的感染者传染性很低，可以考虑不再对他们实行封控、隔离、转运。

居家隔离扩围

11月29日深夜，敲门声忽然响起。家住北京海淀区的齐雁打开房门，被通知自己的妈妈、姥姥均在“十混一”中检出阳性。社区工作人员要求全家人足不出户，等待后续安排。次日凌晨4点，一家人再次被敲门声叫醒，接受核酸检测复核。

齐雁焦虑不已。姥姥96岁了，患有高血压等基础性疾病，腿脚也不太好，“听到太多噪音心脏都会不舒服”。万一只有姥姥确诊，独自转运、隔离，不要说老人，全家人的情绪都“受不了这种撕扯”。她寄希望于周围的方舱不够，社区同意居家隔离。但社区很快答复，正在将周边医院紧急腾用做隔离点，一旦确诊就要拉走。

煎熬了一天，11月30日下午近5点，社区忽然通知，根据最新政策，无论复核结果为何，高龄老人一律不再转运至方舱。不久，又通知复核结果均为阴性，建议居家监测，连续抗原自测两天，向社区上报结果。拿着社区发的一盒抗原试剂，想到这一天的“大落大起”，齐雁心里五味杂陈。

据财新了解，目前北京、广州多个社区已开始执行类似举措：允许孕妇、照护儿童的父母、强烈表达不愿集中隔离的轻症感染者等群体，经社区研判居住环境达到隔离场所标准，与居民沟通后可就地居家隔离。一位重庆市民政系统官员则透露，已经下达内部通知，允许高龄及患有基础病的老人居家隔离。

风险人员隔离是切断传染病传播的重要一环。集中隔离可保障管控的强制力，但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居家隔离更为人性化、低成本，但社区需承担一定的外溢风险。两种隔离政策的取舍，一直是防疫方针调整的重点。

无论是第九版将次密接由集中隔离改为居家隔离，还是“二十条”不再隔离次密接，将高风险区外溢人员由集中隔离改为居家隔离，方向都是减少对社会运行的干扰，防止疫情前端管控的资源投入过量且不可持续。但正逢秋冬季疫情，各地转运、隔离资源仍然持续承压。能否探索再优化？

广东成为首个官方公开肯定居家隔离适用范围进一步拓宽的省份。11月27日晚，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广东工作组与广东省的工作对接会上，广东省省长王伟中表示，要认真甄别感染者、密切接触者，支持符合条件的密接人员实施居家隔离。

11月30日，广州、深圳、重庆等城市更明确通告，符合条件的密接者可以居家隔离。同日，广州市疫情新闻发布会强调，不随意扩大密接者甄别范围，不以时空伴随作为判定密接者的标准。

作为今年秋冬季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内城市之一，广州隔离资源一度严重短缺，重复此前多个城市的“大建方舱”之路。10月22日至11月28日，广州累计报告新增感染者14.3万余例，在院治疗11920例，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96497例。据官方披露，截至11月17日12时，全市建成交付方舱医院16个、在建20个，可提供床位数114392张，加上隔离点板房床位132015张，共规划床位数逾24万张。此外，广东举全省之力，疏解数万名广州城中村居民到其他地市集中隔离。

官方苦于隔离资源捉襟见肘的同时，放宽居家隔离门槛，让防疫更人性化，也成为多个社区居民们的共同诉求。在2022年初上海疫情期间，就曾有多个社区争取密接和阳性患者居家隔离；"二十条"落地后，北京、广州、上海、成都等各大城市也有社区以联名签署倡议书、前往居委会请愿等形式，表达支持密接和阳性邻居居家隔离的意愿。

事实上，各地基层早已在综合考虑防疫资源和居民意愿的基础上，试行密接者和阳性病例居家。此轮广州疫情中，花都区人民法院机关纪委副书记汤倩支援海珠大塘疫情防控指挥部。11月25日晚，她曾遇到所辖网格内一位阳性感染者申请携子集中隔离。沟通后，她了解到感染者与14岁孩子同住，孩子核酸检测仍为阴性，但患有抑郁症，生活较难自理。稍加思索后，汤倩建议对方居家隔离，避免孩子在隔离点交叉感染，同时向上级请示，最终得到批准。她还表示，这种隔离"一人一策"在此次广州疫情中并非孤例。

如何看待这种探索？是否有违法风险？宋华琳指出，《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要求对病原携带者予以隔离治疗，但并未限定集中或居家隔离。只要场所符合隔离条件，基层有所变通，不应视为违法。

医疗专家也肯定了居家隔离扩围的可行性。11月27日，北京佑安医院呼吸与感染疾病科主任医师李侗曾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能够做到精准，一家一策、一人一策，阳性人员居家隔离不送方舱是可以考虑的。

但一位上海基层疾控人士认为，如果仅停留在基层自主变通的阶段，阳性人员居家隔离的个例不应被视为"自下而上"的防疫策略优化。他直言，2022年奥密克戎疫情波及全国以来，有阳性人员和密接者居家隔离早已不是稀罕事，但都是无奈之举，"医院和酒店都没房间了，只好居家"。这种迫不得已的调整，一旦隔离资源补足，又会回到原点，甚至会倒逼地方政府继续斥巨资兴建隔离场所。

如何继续启动"自上而下"的隔离政策调整？李侗曾认为，并非所有阳性人员和密接者的居住环境都能满足居家隔离的条件，这需要专业人员评估，而很多社区并没有掌握可靠的评估方法。因此，如果隔离政策将来调整，必须做好预案。

居家隔离不仅对硬件设施有要求，也对居民的自我防护和社区的服务能力提出挑战。根据11月21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指南》，居家隔离期间，需要保持家居通风，做好环境消毒，尤其与家庭成员共用物品和卫生间时，要做到每次使用后消毒。社区则需要对居家隔离者登记造册、定时抽查，确保上门核酸检测、环境清洁、送货上门、心理援助等服务。

社区不免担忧居家隔离扩围意味着沉重负担。在"二十条"刚公布时，广东某基层社区医生便向财新表示，一旦扩大居家隔离范围，仅仅是增加的核酸检测需求，便足以令社区头疼。

据财新了解，抗原自测或将作为居家隔离扩围的重要配套措施推广。北京朝阳区八里庄街道某社区在11月30日晚回答居民提问时表示，对居家隔离期间的感染者不再做上门核酸检测，只在隔离七天后进行抗原自测和核酸复核，符合条件即可解除隔离。

金冬雁介绍说，经历2022年初第五波奥密克戎疫情后，在香港是否去方舱隔离主要基于感染者的个人意愿，目前感染者居家隔离已成为主流。他认为，虽然居家隔离存在执行上的难度，但不应过度夸大居家隔离的交叉感染风险。与其强调社区能力，不如做好公众教育："给出一套科学的规范，督促大家遵守，同时明确惩罚机制，同屋夫妻彼此不传染的案例都很多。"

北京朝阳区奥运村街道居民马乔也认为，形成民间共识，是探索居家隔离扩围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11月28日，同楼有阳性病例被居家隔离，曾共同争取小区解除临时管控的邻居们，一时却产生了分歧："据我观察，有人会认为把邻居拉走集中隔离就可以'一劳永逸'地防止被感染，也可以避免封控时间被无限延长。"

"但我是学预防医学的，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消除对被感染的非理性恐惧，同时学会如何将交叉感染的风险降低。"马乔说。他提到，由于社区并未提供详细的居家隔离消毒、用药、自我护理指南，一些居民在社区群内分享了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海外的官方指引，有医学背景的还义务为老年人解答基础医学问题。

"退一万步说，即便居家隔离会升高感染风险，但居民希望得到人性化对待的意愿，本来就应该得到尊重。"马乔认为。

县域能否跟上

当大城市的人们热火朝天地谈论"二十条"时，从首都发出的政策优化信号还未被遥远的基层和乡村真正接收落实。随着病毒传染力的增强，很多原本人口流动较少、感染风险低的农村地区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病毒的威胁，恐惧下的"硬核加码"并不鲜见。

受疫情影响，河南中西部一个县城的很多学校不久前临时决定放假。赵玉梅所在的村子要求，凡有学生回家，大门上都要拧上铁丝。全村的全员核酸检测频次，也从隔天一次变为每天一次。11月22日儿子回家后，赵玉梅的家即刻被拧上了铁丝，一家三口甚至连续几天都是透过门缝采样做核酸检测。

很快，村子出现了三年来的首个确诊病例，系一名归乡学生。此后的每天晚上，赵玉梅一听到120进村拉人的

声音都会害怕，时常联想到远在疫情更严重的北京工作的女儿。听闻北京社区管控松开更觉不可思议，她反复叮嘱女儿：“甭管外界放不放开，少出门、多喝热水、戴双层口罩，千万别感染了。”

村里近几日已无病例。算上早期防止外村输入感染的时间，村子此前封控了20天。据了解，12月1日，村子已能自由出入。不过，该地另一乡镇一位村民称，几天前距他七八里地的一村子出现病例，12月1日村里通知村民不让出家门，“太夸张了。”

在地处济南、德州交界地带的山东齐河县，三年来每逢周边县市疫情发生时都非常紧张。官方数据披露，11月德州多区县出现病例，但齐河至今未有病例通报。查询国务院小程序，截至12月2日，该县未有任何高风险区域。此前在11月24日，该县已发出倡议，“非必要不离齐、非必要不来齐”。一名齐河县居民告诉财新，此前该县很多小区、村子都被管控；她所在的小区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直接用铁皮封住小区的四个大门，封锁近10天，居民仅能在小区内活动。至12月2日，才收到小区解封通知。

“这三年尤其这一年以来，德州有疫情，齐河封；济南有疫情，齐河封，一直是这种状态。”这名居民称，“九不准”“二十条”推出后，基层封控管控几无任何变化。齐河地理位置特殊，很多上班族每天往返济南通勤，“这些天很多人要么在济南回不了家，要么在齐河没法去上班。明年我们肯定要搬回济南，绝不在这儿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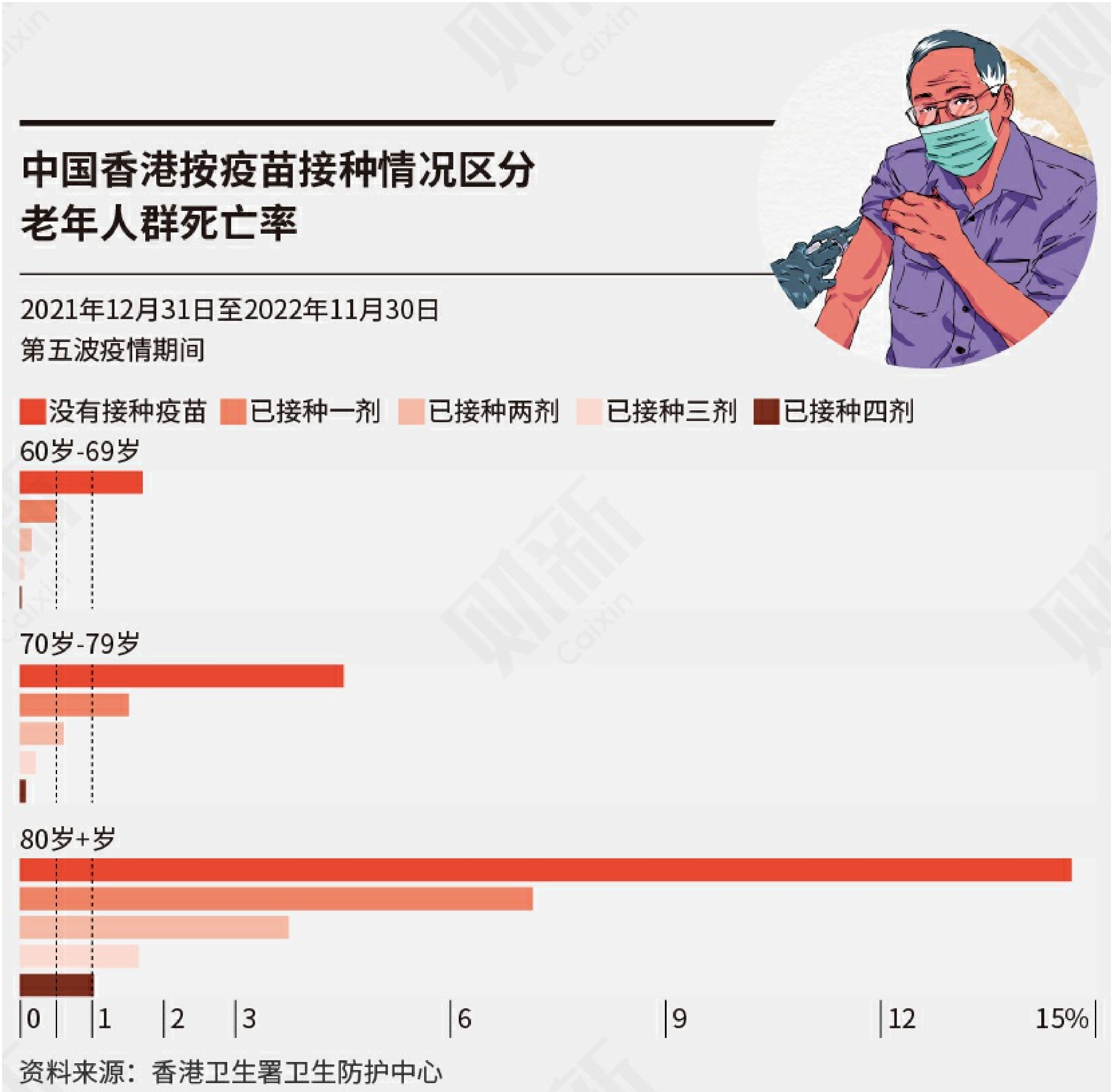
“清零”政策下基层封控过严，亦有无奈之处。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名返乡大学生与基层干部沟通的音频中，这位干部直言，“二十条”在县城根本落实不了：“国务院指挥小组有多少专家多少教授，县城有几个专家？就像你在学校本科、研究生老师讲的课，给小学生讲解，他能听懂吗？”

即使在发达地区的基层，完全落实“二十条”也不容易。浙江的一个小县城中，疫情正赶上“二十条”颁布。一位基层工作者称，当地围绕“二十条”作出许多工作部署，基层防控压力大，为保险、快速控制疫情，对风险较大的区域采取临时管控措施。她说，现在基层人员都比较疲惫了，“二十条”对基层管理精准度要求高，实操中想要控制住社会面的风险难度大。“现在是疫情初期，城市小，快速处置能控住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也有地方对于调整封控方式较为积极。一名四川乡镇干部告诉财新，“二十条”出台后，民众对精准防疫的要求更高，以前镇上出现一名阳性病例，全镇就会临时管控，现在有“杜绝层层加码”的要求，只是将感染者和密接人员拉去集中隔离。

据四川宜宾一名村党支部书记王娟观察，“二十条”后最大的变化是核酸检测频率明显减少，此前该市几乎出现一例就要全市核酸检测，国庆节后几乎每三天全市一轮。“二十条”后更加精准，‘哪个村有，哪个村全员连续三天核酸检测。”据她介绍，该市目前城镇管控更加精准，小区封控仅封锁高风险所在的楼栋，其他楼栋仍然开放出行。但一谈到自己所在的农村，她的立场又有所疑虑。“如果有阳性，应该要封整个村，不准外出。”她说。

在陕西省山阳县卫健局原副局长徐毓才看来，农村人口密度小，人际接触较少，且人口大部分是老年人；在防疫工作中，农村的主要风险是对外来人口的管控，若管控不到位，则易在红白喜事等场所引发大型聚集性感染。此外，部分邻近机场、高铁站的农村，在疫情严重时若未对小商贩和务工人员做好闭环管理，也易引发疫情。不过，疫情三年来出台的很多方案缺乏对农村的详细研究，尽管基层干部投入很大精力，但办法不太多。



“二十条”发布后，很多基层、农村地区的防疫措施并未改变，部分地区甚至更严。徐毓才称，关键是问责机制没有建立，尽管各地组建了治理层层加码专班，但从未有人因为层层加码受罚，所有受罚的官员都是因为疫情防控不力。精准防疫的导向在顶层并未真正树立，层层传导至基层，压力越来越大。

临近春节，随着外出打工人员返乡，乡村面临的防控压力正在加大。王娟所在的村子有5000多人，节前有四五百人要返乡，村里最近几乎每天都需从几十公里外的隔离点“定点接人”，回来还需上门开展三天三检或贴封条隔离。她亲身体会到，相比疫情前，村务工作多了三分之一，且没有防疫经费。“压力很大，一旦有阳，我们是第一个感染的。”

四川某县政府一名工作人员称，病毒已侵入乡镇基层，县级防疫人员每天收到大数据反馈的重点或者风险人群信息，就需要打几百个电话核实、告知，村务人员更捉襟见肘。“一个村只有四个村干部，要负责600名村民，其中十几、二十个人需要居家隔离，怎么管得过来？”

随着疫情更多波及乡村，基层医疗硬件也待考验。正处疫情发展期的河北邯郸农村，有居家隔离的阳性老人近一周才如愿住进县里的定点医院。李秋的爷爷于11月23日被通知核酸阳性，但为照顾瘫痪在床的奶奶，加之两人都已年迈无法去方舱，居家隔离多日。奶奶基础病多，长期卧床未做核酸检测，也未打新冠疫苗，隔离期间一直高烧不退。

“村医隔离了，爷爷奶奶隔离五六天没有医生来看，也没有人过来测核酸，他俩是无症状还是轻重症，我们都不知道。村里恨不得都离得远远的。”李秋说，即使是配药也很麻烦，由于在村里隔离，没有人主动送药，每次都是自己联系书记，书记向上反映，才能勉强续上药品。几番周折后，11月30日，李秋联系上了县定点医院，终将两位老人送入医院。

近两日，虽然一些地方习惯性的封控仍在延续，但已有不少县城、乡村陆续解除或放松封控措施。随着政策转向，基层乡村面临的考验还有很多。

“关键要让老百姓知道真实情况，给大家说实话。”徐毓才指出，观念的转变越到基层、农村越慢，目前网络上许多有关新冠病毒感染率、重症率、死亡率等科学探讨难以存留，应当在全社会形成公开讨论，逐步消除老百姓心中的恐惧。

重塑防疫共识

对病毒和防疫政策的认知鸿沟，并非只存在于城乡、偏远和发达地区之间。广州11月30日取消临时管控区后，家住海珠区的施施看到，小区居民有的第一时间赶往启动堂食的餐厅，有的继续闭门不出，还有人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又怕感染，又想出行自由，于是戴好口罩、紧闭车窗，驾车上路开了一圈。远在江苏的亲戚发来令她哭笑不得的问候：“广州‘躺平’了？要小心啊！”

新冠防疫战线纵深三年，于14亿人口的大国而言，观念?差异在所难免。但也正因为幅员辽阔、区域差异显著，欲?使?防?疫政策转向平稳落地，形成官方与民间的新共识至关重?要。

“必须正视，现在很大一部分民众对新冠是恐惧的。”陆家海说，“不广泛普及新冠和传染病的知识，反而增加民众的心理负担，造成次生灾害。”

亡羊补牢未为晚。近期，越来越多官方媒体和专家发声，详解奥密克戎特性，以及民众最关心的后遗症、反复感染风险问题，直面公众疑虑。11月29日，中国疾控中心传防处研究员常昭瑞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表示，国际和国内监测数据证实，奥密克戎变异株及其多种变体，致病力和毒力都相比原始株和德尔塔等变异株明显减弱。她还提到，目前中国新冠重症及其关联死亡处于较低水平，但是有基础性疾病、高龄和没有接种疫苗的人群如果感染了奥密克戎变异株之后，仍然可能会出现一定比例的重症。

除了了解疾病特性，民间也关注防疫政策调整的科学依据。新加坡经验值得借鉴。在政策转换的过程中，新加坡政府做出大量民众沟通，新冠相关信息海量透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前后做过十次新冠相关的全国性演讲，数名核心部长组成的跨部门抗疫工作小组频繁召开新闻发布会，把感染情况、政府的政策逻辑、可能出现的后果向民众和盘托出，在沟通中也不时承认当下掌握信息不足、未来可能继续变化。

“如果公众不信任公共卫生部门，不相信他们获得的信息，我们是无法战胜一场公共卫生危机的。”新加坡通讯及信息部部长杨莉明在国会演讲中总结道，“从一开始，我们就决定让公众最大限度保持知情，实话实说。”



2022年3月22日，山东青岛，崂山社区网格员徐静在何家社区巡走，用喇叭通知村民做核酸。二十条对基层管理精准度要求高，实操中想要控制住社会面的风险难度大。

有国内一线防疫人员希望，医疗卫生部门向民众和防疫人员充分解释防疫策略、变化，明确工作时间表，让他们看到"隧道的尽头"。在更有预期的情况下，利用压制疫情争取来的时间，主动地、积极地再做一些准备。

一位新冠定点传染病医院的感染科医生还认为，应当使民众理解，政府与民众在抗疫中的角色定位已然转变。"现在的改变不是说政府不管了，而是不再以那么硬性的管理方式去对待已经影响没那么大的传染病。政府不再是'大家长'，每个人要做好自我保护，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角色转换难以一蹴而就，在此过程中，官方指引至关重要。"比如什么情况下去看病，什么情况下去做抗原检测，什么情况下可以吃一点自己减轻症状的药，要给民众明确的指引。"上述感染科医生说。

配套措施也要跟上。"比如说取消全员核酸，但是上街买个菜还要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那肯定不行。取消了核酸，原有的空缺就要由抗原马上填补。承认了抗原检测，就要搭建好自我申报系统，建立抽查制度，追究造假者的法律责任。"金冬雁说。

专家还建议，做好公众教育的同时，政府自身亦需解放思想、转变认知，并与民间保持互动。持续做好疫情信息披露至关重要。

基于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制度，2020年1月至今，从国家到地方各级卫健委一直每日在官网实时披露新增病例数据。其间也根据疫情发展及科学认知的进步，不断调整公布数据种类，例如2020年4月起公开披露无症状感染者数据。目前每日定期发布的数据类别，包含了新增境外输入及本土确诊病例、新增境外输入及本土无症状感染者、新增治愈出院、现有确诊、累计确诊、累计追踪密接、尚在医学观察密接等。

此外，相关部门和院校还不定期地通过一些权威官方平台，发表具有学术研究性质的报告和文章，公开重要数据。例如，6月18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英文周报》刊文披露了3万多名2022年上海奥密克戎BA.2疫情期间入院新冠患者的病情数据，指出其中仅0.065%发展为重症，无人发展为危重症。

数据为中国防疫政策三年来的调整提供了重要参考。为应对防疫新形势，实现科学精准防疫，疫情数据的统

计、披露方式亟待更新。

陆家海认为，鉴于无症状感染者的健康风险较小，且未来防疫政策的重点将转移至救治病人，核酸检测主要针对重点人群，应重点公布确诊、重症和死亡病例。

类似举措在新加坡有先例。从2021年10月中旬开始，新加坡卫生部每日疫情报告的重点，从感染人数转到重症死亡人数，每日公布当日新增病例数、死亡人数、呼吸机使用人数、ICU占用床位数。后三项均指向重症需求和医疗救治能力。而在全球，只统计出现症状的感染者也已成为主流。

数据披露的详尽程度也有提升空间。目前在全国各地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病毒传播R0值、重症率、病死率、疫苗的真实世界保护率等核心数据常有缺失，更鲜见不同地域、年龄组、基础性疾病组的细化数据。

而中国香港自抗疫之初，数据统计及披露就比较充分，目前更包含确诊数据、疫苗接种、检测、检疫及隔离、治疗五大类，每类有多个细分项。这些数据在政府官网统一更新发布，与疫苗接种点地图、出入境政策等资讯结合展示，并被制成多种图表、海报等便于公众理解。

目前，香港特区政府通报新冠疫情的每周报告中，选择多达12项数据进行公开，包括每日新增病例数、过去七天平均病例数、抗原检出阳性人数、核酸检出阳性人数、新冠疫情全周期流行病学曲线图、病例年龄及性别分布、毒株类型比例、区域发病率、校园病例数、养老院病例数、不同年龄段和疫苗接种组别的死亡率、病例近期曾到访的地区/国家。

更有观点认为，未来官方应更新对旧有概念的解释、定义，进一步推动新共识形成乃至制度革新。

如新冠肺炎更名。近日，广州市政协常委曹志伟在个人公众号发文，称已经向国家卫健委建议，将"新冠肺炎"更名为"急性新冠感冒"。曹志伟工作室告诉财新，工作室是通过国家卫健委公开的渠道提交建议，已经得到国家卫健委回复并感谢其建议。他们的出发点是消除普通群众对于新冠病毒的恐惧，舒缓焦虑的情绪。

金冬雁亦认同此观点："奥密克戎很少有肺部症状，不应继续称为'肺炎'。"不过，相比于"急性新冠感冒"，他认为应该参照世界卫生组织的统一命名COIVD-19，直译为"2019冠状病毒病"，从而科学合理地指代疾病。

重估疾病管理等级亦可提上日程。徐毓才称，疫情防控已三年，全球大量科学研究数据已经出现，没有必要继续坚持将乙类的新冠肺炎按甲类管理，这是很多问题出现的根源。这也是多位专家的共识。

甲类管理属于强制管理，对隔离、密接预防、流调报告等方面的要求远在乙类管理之上。"甲类管理的传染病一般具有如下特点：传染性强、危害严重、病死率高，同时参甲管理的传染病具有特异性、时限性和地域局限性，一般在特定的短时间内需要快速有效控制，比如肺炭疽、SARS、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新冠经过三年防控，已经成为全球流行的传染病，不符合参甲管理的初衷。"一位上海疾控人士表示。

乙类传染病防控的本质则是严格管理，对个案进行调查、隔离、宣教，对重点岗位人员调离岗位，对聚集性疫情采取综合性防控措施，关注密切接触者，关注重症和死亡。上述上海市疾控人士说："如果新冠不回归乙类传染病，未来的冬季会很漫长。"

巩固后端防线

防疫政策优化，各地的后端防线准备好了吗？

前述11月30日的座谈会在完善阻断病毒传播"工具包"之外，亦对加强疫苗接种、加快治疗药物和医疗资源准备提出了要求。

老年人疫苗接种"洼地"是当下疫苗接种的痛点。截至11月28日，中国老年人群接种率仍低于全人群水平，60岁以上老年人全程接种共2.28亿，全程接种率仅为86.42%，完成加强接种1.82亿。而更为关键的是80岁以上人群，他们既是重症的高危人群，也是目前接种最明显的"短板"。截至11月28日，中国80岁以上老年人的全程接种率为65.8%，80岁以上老年人加强针接种人数约占该人群总数的40%。

财新从多方信源获悉，11月30日，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已下达工作指标：2023年1月底前，80岁以上人群新冠疫苗第一剂接种率达到90%，符合条件的目标人群全程接种率和加强免疫接种率均达到90%；60—79岁符合条件的目标人群全程接种率和加强免疫接种率均达到95%。



2022年4月21日，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老年居民接种新冠疫苗。图：殷立勤/中新社

设立明确的工作指标，这是一个信号——防疫优化工作重点向后端防线有所倾斜。

在此之前，疫苗接种常让位于防疫任务。有华北某县免疫接种人员提到，近期全国疫情多发，大型城市疏散的返乡大学生以及务工人员成为乡镇防疫重点，人员流动增加了防疫难度，当地有四家卫生院先后"沦陷"被迫关门，加之动辄"封村"，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几近暂停，多次向上级建议无果。

在实施环节，老年人疫苗接种扩面受其自身认知、担心偶合或不良反应、接种人员难以把握禁忌证、接种服务不够便利等因素阻碍。11月30日，针对全国卫生系统的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培训，提出了解决接种难点的三条措施：充分利用大数据手段，精准摸清目标人群底数，建立目标人群台账，逐人动员，逐人销号；在最大限度为老年人提供便利的基础上，对失能、半失能的老年人，组建接种小分队提供上门服务；对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争议中不属于医务人员责任的，加大协调力度，主动化解矛盾，保护医务人员积极性。

目前共有6种疫苗接种组合方案。已有多项研究证明，新冠疫苗序贯加强保护效果优于同源加强。同源接种之外，国家卫健委提供了3种序贯加强方案：两剂科兴/国药灭活疫苗加一剂康希诺注射用或吸入用腺病毒载体疫苗、两剂科兴/国药灭活疫苗加一剂安徽智飞重组蛋白疫苗、两剂科兴/国药灭活疫苗加一剂丽珠集团重组蛋白疫苗。

寻找更好的疫苗仍在路上。据悉，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正在发起一项临床试验，比较16款新冠疫苗用作灭活疫苗基础免疫后第三针、第四针加强接种的有效性及安全性，为未来新冠疫苗免疫加强策略的制定提供依据。这其中也包括了部分针对奥密克戎的疫苗。然而，即便走到使用边缘的新疫苗仍要经历审批、扩产能、生产等繁杂的程序，时间之长恐难用来应对这轮大规模疫情。

因此，要直面当下疫情冲击，巩固新冠最后一道"防线"迫在眉睫，即储备、统筹规划医疗救治资源。

前述感染科医生告诉财新，他和同事已经做好了未来几个月打一场硬仗的准备，"防疫政策这样优化，医疗机构必然会面对比此前更严峻的挑战"。

担心中的医疗资源挤兑挑战虽大，但并非不能克服。一方面，大量轻症患者、无症状感染者若居家自愈，可以缓解医护人员支援方舱、发热门诊导致的诊疗压力，有限的医疗资源将进一步集中。另一方面，部分普通型患者也可考虑居家自愈，院内的普通病房用于症状偏重的普通型患者救治，ICU用于重症患者、合并有较严重基础疾病的普通型患者救治。

缩小密接人群范围以及调整密接隔离地点也势在必行。因为医院接触感染者概率高，医务人员一旦因为成为密接而遭无差别隔离，动辄封闭科室和院区，医疗资源的平稳供给必然受到冲击，令医院成为全社会精准防控目标落

实的软肋。

另一关键环节是ICU的床位数。上述感染科医生认为，仅关注目前政府披露的住院治疗人数意义有限，关键要看ICU的入住率。他建议，医疗机构应该按照感染人数的万分之一配备ICU床位。

2021年9月下发的《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设置管理规范》提出，每个地市级以上城市定点医院重症救治床位要达到医院床位总数的10%。11月17日，国家卫健委公开重申这一要求。

然而，ICU历史欠账较多。新冠疫情初期，有参与武汉抗疫的重症医学专家告诉财新，中国ICU床位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都不够，绝大部分医院的ICU床位满员甚至超负荷运转。目前中国综合医院ICU科室床位占比约为3%，仍远低于美国的15%，基层医院更加薄弱。2020年发表的一篇关于亚洲国家重症床位的研究显示，中国每10万人ICU床位为3.6张，低于马来西亚等中上收入国家，更显著低于新加坡等高收入国家——新加坡每10万人ICU床位为11.4张。

财新采访发现，即便疫情期间，部分重症医学科实力强劲的医院加速扩容了ICU床位，但与10%的要求仍有距离，遑论重症基础薄弱的医院。

临时转换ICU床位亦是一条路径。前述感染科医生建议，可以临时扩充的ICU床位更灵活，配备有心电监护和移动式呼吸机即可，重要的是保证充足的供氧。这样难度更小，成本更低。据其在本轮疫情中的诊疗经验，很多收治的重型患者耗氧量相比武汉疫情时更少，相比肺部问题，合并基础疾病的问题更严重。

他还建议，这部分重型患者，更应该回归平时的诊疗、救治方式。“新冠应该回归乙类传染病，像流感一样，你不会看到平时有患者得了流感，就把他专门转到传染病医院去。”前述感染科医生说。这样，不仅非新冠患者的医疗资源挤兑现象将缓解，医疗机构也可以从“防院感”的束缚中进一步解放。在防疫过程中，不少医院有院感后立即停诊、疏散住院病人的操作，导致肿瘤化疗、血透等非新冠患者求医无门。

金冬雁还建议参考新加坡经验，考虑在有条件的社区建立吸氧中心，“相当于把一部分中、重症也分流到社区就近治疗”。掣肘国内重症资源扩增更关键的因素，是重症医务人员的短缺。曾有赴湖北、吉林、黑龙江等各地援助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工作医生提到，包括传染病医院在内，很多医院缺乏拥有重症救治能力的医生，“有些医生甚至不知道怎么使用呼吸机，不懂呼吸支持技术”。医疗资源短期快速扩容不现实，如何在疫情大规模增长以及医疗系统被动受冲击之前，理顺医疗服务流程，统一灵活调配资源，成为当下必须且能梳理清楚的问题。

有效、可及的药物也十分重要。目前已有部分地区试行阳性人员轻症居家隔离，对这部分人群的用药指导需明确。随着石家庄、广州等地防疫政策优化，一度出现“囤药潮”，有药店连花清瘟胶囊售空，甚至引发网售国产新冠口服药阿兹夫定风波。

前述感染科医生指出，居家的轻症患者确实需要适当备一些药缓解症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退烧药，二是止咳药，“但不要存太多，用量也不要太大”。

而国内已获批的两款新冠口服药阿兹夫定和辉瑞的Paxlovid均属于处方药，有一定副作用，不应该随意购买。以Paxlovid为例，其由奈玛特韦与利托那韦组合而成，奈玛特韦可以通过阻断新冠病毒3CL蛋白酶的活性，破坏新冠病毒的RNA复制，阻止病毒在体内大量繁殖；利托那韦也是一种蛋白酶抑制剂，用以减缓奈玛特韦在体内的分解，是一款老药。

“利托那韦可以影响到所有经过肝脏代谢的药物。我们平常在市面上买到的药物里面，几乎80%是通过肝脏代谢，相当这个药吃进去，可能会对这些药物产生相互影响，导致药效的增加或降低，这可能会是致命的。”前述感染科医生说。

而对入院患者来说，Paxlovid获应急附条件批准的用途是成人伴有进展为重症高风险因素的轻至中度新冠患者，例如伴有高龄、慢性肾脏疾病、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慢性肺病等。实际上，目前这些轻中症患者入院治疗的数量并不大，药物的价格也不低，因此医院对新冠口服药的储备并不多。不过，未来储备量需要增加。

将重点移至疫苗、药物、医疗资源等重要防线，无疑将开启疫情以来另一场严峻的“大考”。陆家海认为，这对实现科学防疫的长期胜利来说必要且关键。

曾作为广东省科技攻关领导小组成员参与抗击2003年SARS疫情的陆家海，在11月被封广州家中的一个夜晚如此写道：“我们应该把‘动态清零’的‘零’，理解为‘零重症’‘零死亡’，而绝对不是‘零感染’。只有把目标转移到实现‘零重症’‘零死亡’上来，才能够真正扭转被动为主动，打赢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

何辛雨、方圆、齐雁、施施、马乔、杨阳、张琦、王然、赵玉梅、王娟、李秋、陈小天均为化名；周信达、陈曦对此文亦有贡献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新冠肺炎防疫全纪录（实时更新中）

版面编辑：刘潇

社论｜经济重回正轨要靠改革开放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2年第47期 出版日期 2022年12月05日

改革开放没有止境。它并不必然是危机驱动，而应成为各级政府的主动选择



苏州，太仓港集装箱码头，一批汽车即将出口东南亚、南美洲等海外市场。未来开放的重心是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图：视觉中国

中国经济今年如何收官、明年如何开局，成为年终岁尾公众关心的话题。日前，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抓实抓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全面落地见效、巩固经济回稳向上基础。专家学者亦纷纷就经济重回正轨提出意见建议。这些建言各有侧重，却有一条重要共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既是重要的历史经验，也是当下的现实需要，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江泽民逝世，世人在沉痛悼念的同时，不禁抚今追昔，深切感到中国经济稳定和发展，仍要依靠改革开放。

2022年，受国内外错综复杂因素影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超出预期，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成为重中之重。通过实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中国经济及时扭转了二季度以来的下滑势头，三季度GDP同比增长3.9%。不过，当前中国经济复苏势头不稳、基础不牢。相比9月，10月经济指标已然全面回落。从近日发布的统计局制造业PMI等数据来看，11月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加大，实现全年增长目标极其困难。之所以形成目前的局面，除了长期存在的种种深层次矛盾，直接原因是近期国内多地暴发大规模新冠疫情，叠加一些地方在防控上“层层加码”“一刀切”、简单化，动辄要求商户关门歇业、小区临时管控、市民居家不出，这不仅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还进一步影响了市场主体的预期和信心。不当管控的后果已经且将继续显现，令中国经济蒙受巨大损失。

新冠疫情已走过三个年头。随着奥密克戎病毒致病性减弱、疫苗接种普及、防控经验积累，中国疫情防控面临转机。日前，随着《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发布，各地开始积极优化防控政策。当务之急是坚持科学、精准、依法防控。应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地探索如何优化防控政策，以将疫情对经济社会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程度。此外，还须深入落实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稳就业稳物价，尤其是要实现房地产等高风险行业软着陆。

然而，根本而言，欲使中国经济重回正轨，仍要靠坚持改革开放。这是4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上，中国经济并非一路凯歌行进，曾遭遇比眼下更为困难的危急关头。但是，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国经济安然渡过了这些难关。我们难以忘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面临巨大的困难和压力。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1992年重启改革，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并在接下来的数年，实施了涉及价格、税收、财政、金融、外贸、投资等多领域的波澜壮阔的整体性改革。中国经济不仅转危为安，而且奠定了其后经济高速增长的体制基础。20世纪末，大批国有企业陷入困境，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更令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用三年时间推进国企改革，并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在2001年毅然“入世”。以此为节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更为强劲。中国能有如今的综合国力，端赖于此。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改革开放事业需要一棒接一棒地接力干下去。

改革开放没有止境。它并不必然是危机驱动，而应成为各级政府的主动选择。十四大以来的30年，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但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面临不少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那种“改得差不多了”的想法万万要不得。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应该承认，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国资国企、要素市场化等领域改革亟待深化。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均空间巨大。空间就是潜力。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道理是清晰的，但是，遇到具体问题则往往控制不住“看得见的手”。在抗疫过程中，“层层加码”“一刀切”、简单化等错误做法屡禁不止，正表明权力之手远未得到有效约束。

扩大开放的任务也极其繁重。未来开放的重心是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须知，开放的标杆是不断提升的。“入世”之时，中国开放尺度之大可谓石破天惊，如今却又须与21世纪最佳国际实践对标。

在日前举行的第十三届财新峰会上，数位前财经部门负责人提醒三年疫情对中长期经济增长造成的“机制性损伤”，这正说明了当下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紧迫性。中国经济发展不会由于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而自动完全恢复，需要下大力气营造良好的各方面环境，包括投资环境、营商环境、消费环境、舆论环境。新的一年即将来临，中国经济要走出三年疫情的阴影，重回正轨，实现高质量发展，根本上要靠改革开放。行胜于言，这将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先贤最好的告慰和纪念。

（本文为即将于2022年12月05日出版的《财新周刊》第47期社评**）**

版面编辑：刘春辉

最新财新周刊｜社会救助立法挑战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2年第47期 出版日期 2022年12月05日

酝酿近30年，四次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社会救助法》迄今未出台。难在哪里？



2012年3月22日，安徽合肥，在桥下生活的流浪汉。

文丨财新周刊 唐爱琳

南开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关信平还记得大约15年前第一次参与社会救助立法时的场景：民政部邀请有实践经验的一线工作人员与若干专家学者，在北京一家宾馆里封闭开了一周会。

“以往社会救助政策是分散的、单项的，当时试图把社会救助的体系通过立法整合起来。”关信平向财新回忆说，相关部门一度认为草案能够顺利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还请他提前做好讲解准备。

自1994年起，这一立法项目先以《社会救济法》之名列入了八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后改名《社会救助法》进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草案曾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但始终未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程序。2014年2月，国务院以行政法规形式出台了《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下称《暂行办法》）。

《暂行办法》明确了社会救助的制度框架，但也有其局限性。十三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政部原副部长宫蒲光2019年在《关于社会救助立法中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暂行办法》无论从立法位阶上还是法规的完善性上看，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弱有所扶，完善社会救助制度。2018年，《社会救助法》再次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作为条件比较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的第一类项目——这已经是该法第四次进入立法规划。2020年，民政部与财政部发布《社会救助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同时，这一立法项目还在2020至2022年连续三年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民政部的年度立法计划。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任期临近尾声，《社会救助法》虽已形成草案，但恐难于2022年出台。《法治日报》11月22日报道称，目前国务院相关部门正按照要求积极推进社会救助立法工作进程；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认真研究议案所提意见建议，加快立法进程，尽早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多位参与立法研讨的学者表示，《暂行办法》法律位阶偏低、条款过于笼统，加之近年来经济社会发生较大变化，社会救助面临从输血变造血、从济贫到助弱、从给物质到给服务的转型，加快推进社会救助立法已成为共识。但社会救助的复杂性也带来了诸多争议：脱贫攻坚完成后，面向需求多样的相对贫困群体，需重新界定救助范围、救助方式和地方标准；社会救助措施涉及多部门，需破解实施过程中民政部门牵头难以及综合施策时统筹协调的问题；经费保障方面，央地财政支出责任尚不明确；因新冠疫情而备受关注的临时救助，也面临主动发现机制欠缺等问题。

摸石过河

社会救助立法的脚步起源于约30年前。

“社会救助制度的建立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国公益研究院执行院长高华俊曾长期在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工作，参与制定了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他看来，社会救助立法经历了三个阶段。

高华俊告诉财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民政部法制办承担了首次社会救助立法的起草工作。当时社会救助立法是一项部级工程，法制办抽调了相关人员，考察了各个典型国家的社会救助制度，他也曾赴澳大利亚、新西兰考察。高华俊认为，广泛调研打开了社会救助立法的序幕，囿于当时尚未有成形的相关制度，首次立法工作更多是开阔了国际视野。

彼时社会救助制度也在摸索中起步。1993年上海试点实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出于国企改革中解决下岗失业人员生计的需要，1999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得以颁布。此后全国多个省份试点农村特困户救助，2007年底全国所有的涉农地区全部建立农村低保制度。

农村低保完成全覆盖以后，社会救助立法讨论进入一个高潮，不断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议案提案建议加快立法进程。在高华俊印象中，2009年是第二轮社会救助立法研讨最为活跃的一年，讨论集中在社会救助的涵盖范围、救助标准与水平等方面。关信平也参与了这一轮立法研讨。他回忆，因社会救助工作分散在各个行政部门，呈碎片化，整合的过程并不容易。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在2012年接受《京华时报》的采访时透露，造成立法进程缓慢的原因在于涵盖范围、专项救助衔接、管理体制等方面均存在争议。其一，对该法涵盖的内容有分歧，是综合性立法还是专项立法，是完美立法还是渐进立法，困扰着立法进程；其二，一些专项救助如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等仍在实践摸索中，其管理和运行机构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存在着较大差异，且大多简单叠加在低保制度之上，这些专项救助写入法律客观上难以妥善处理；其三，管理体制及职能分工尚未理清，社会救助涉及多个部门，各部门均想将自己负责的相关工作纳入法律，如果步调不能一致，救助立法进程就会放慢，如低保制度有相对成熟的机制，但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尚未形成，以及住房救助属于住房保障部门管理还是民政管理也存在分歧。

多位学者透露，201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原计划于当年初次审议《社会救助法》草案，然而草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未能通过。2014年2月，《暂行办法》公布，被认为是"曲线救国"，虽降低了立法层次，但起到了"退一步、进两步"的效果。

《暂行办法》共13章70条，初步形成了"8+1"的社会救助体系，即包括基本生活问题的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助，专门问题的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突发问题的临时救助等八项社会救助制度，以及解决个性化突出问题的社会力量参与体系。高华俊认为，这反映了当时对社会救助的普遍认知，也是各方妥协的结果。

时任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胡可明曾在《暂行办法》出台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立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主要看实践经验的成熟程度，专项救助和临时救助制度实践尚不充分，通过行政法规的实践，待条件成熟时，再适时提请全国人大制定法律。

《暂行办法》问世仅一年多，郑功成在2015年8月便发文呼吁重启社会救助立法。他认为，《暂行办法》是临时性的行政规范，虽解决了社会救助中的一些问题，但不足以完整规范、刚性约束整个制度的运行。同年4月，河南信阳市救助站一名13岁男孩因不明原因死亡，其父亲确认尸体时发现孩子已瘦成皮包骨，形如"干尸"。这起恶性事件引发公众对当地社会救助站的质疑，后公安将失踪人员信息与救助站流浪人员信息对接。"这类案件与社会救助制度不健全相关，与之相关的是立法的滞后。"郑功成写道。

由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发布的《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2018》指出，《暂行办法》并未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责任分担机制、救助待遇标准的正常增长机制，也无法有效实施申请者的家计调查（指对居民家庭的收入和支出及与其有关的基本经济情况所进行的专门调查）和对骗取待遇者的法律制裁，同时又无法杜绝不符合条件者也享受了最低生活保障等待遇的现象。

2018年，《暂行办法》实施四年后，《社会救助法》再度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社会救助制度也面临从输血变造血、从济贫到助弱、从提供物质到提供服务的转型，在关信平看来，许多制度都尚未定型，立法应为未来发展留足空间。

2019年，民政部曾委托研究机构对《暂行办法》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财新获得的评估结果显示，社会救助面临对象人数下降，救助标准偏低；救助项目不够平衡，部门协调仍待加强；社会救助服务发展缓慢，城乡差距较为明显；基层工作队伍薄弱，救助经办能力欠缺；救助监督不合理，容错纠错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一些地区财政投入逐渐萎缩。对此，评估组建议推动社会救助体系转型，加快相关立法，强化法治保障。

2021年6月，郑功成在接受《人民政协报》采访时表示，社会救助立法必须要明确主管部门和坚持问题导向，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民政部门在整个社会救助体系中的统筹和牵头职责，解决当下社会救助面临的民政部门牵头难、救助方式单一、各地救助标准差异过大、社会救助面收缩等问题。

提标扩面之争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救助人群、救助水平和救助质量这三个维度都面临调整。

宫蒲光认为，中国社会救助支出长期处于低位运行状态，其增长率远低于同期财政支出增长率。他比较了2008

年至2017年全国城乡低保支出和财政支出总量的变化，发现十年间财政支出总量增长了2.25倍，而同期城乡低保支出仅增长了1.72倍，城乡低保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由2008年的1%下降至2017年的0.83%，这一比值使得中国位居世界上社会救助资金投入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

社会救助覆盖面、社会救助水平均偏低，救助内容也有待拓展。宫蒲光援引民政部数据表示，城乡低保人口近年来呈加速下降趋势，城市低保对象从2009年的超过2300万人，以年均8%的降速下降到2019年不足千万人；农村低保对象也在2013年达到峰值5388万人后，持续下降到2019年的3400余万人。截至2019年5月，城乡低保覆盖面仅3%左右，显著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社会救助水平方面，2018年，城市低保平均标准仅占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10%左右，而美国这一数值为20%，欧洲最低生活标准相当于最低工资的43%—60%。此外，社会救助内容方面应在满足基本物质生活需求外，还要满足救助对象精神需求和人格平等的尊严需求。

关信平也认为，社会救助应面向未来，救助标准有待提高，覆盖人群也应扩展。他告诉财新，在基层调研时发现，大部分地区维持现有低保水平，缺乏积极扩面的动力。

在一些发展较快的地区，以往仅定位于济贫的社会救助或难以满足高质量发展需要。高华俊回忆说，三四年前他参与深圳社会救助研究课题时发现，当地低保对象仅千余人，特困户仅十余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提标扩面和政策调整，目前低保户扩大到3000余人，特困户上百人，但相比深圳的人口规模以及全国其他大城市的情况，仍然没有打破可能面临的"无人可救"局面。

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执行院长宋宗合2019年在上海调研时也发现，由于低保补差的要求，一些上海低保对象经过核算每月仅需补发1元钱，这远低于核算本身的行政成本。同时由于低保资格线的要求，一些人均收入刚达标或略高于低保线的边缘困境群体被排除在低保之外。

现行的低保制度存在各地标准差异大、缺乏增长机制等问题。多位学者表示，现行低保标准由地方制定，造成不同地区、城乡之间差异较大；低保标准的调整机制也不完善，各地对于低保标准的调整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和方法，一些地区将低保标准与平均工资、最低工资或人均消费支出等因素挂钩，但在实践中，更多的地方则是比照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低保标准进行调整。

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救助分会会长林闽钢撰文表示，《暂行办法》对救助对象和救助标准等关键问题都采取了授权式条款，而社会救助立法是对行政给付行为进行规制，需增加社会救助标准制定程序，可采用"法定量化标准"办法，即仅规定社会救助标准制定层级、制定程序、标准的测算方法和调整方法等内容，授权各省份制定各地标准。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救助分会副会长杨立雄看来，制约救助标准提高的原因还包括低保资格线与救助线的合二为一。根据《暂行办法》，申请专项救助需有最低生活保障资格，在制度上形成了专项救助与低保的捆绑，造成了低保边缘群体与低保群体在保障水平上的"福利悬崖"。这意味着，提升低保标准，将同等程度提升受助标准，不仅造成财政支出增长，而且抬升福利悬崖，因此各地对提升低保标准都持较为谨慎的态度。

2020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下称《意见》），提出用两年左右时间，健全分层分类、城乡统筹的中国特色社会救助体系。然而，对于如何分层分类，各方有不同建议。

宫蒲光认为，"按率施保"或有助于解决低保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在经济波动情况下，低保标准的相对稳定与居民收入的长期波动并存，难以事先准确掌握受助对象总量和补助经费总额，难以科学合理安排低保资金。"按率施保"可先从总体上确定低保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即低保覆盖率，按东中西部实行差异化的覆盖率，再分解到各个地区，通过立法确保低保对象收入水平不低于此标准。

扩大低收入群体数或是扩面的方式之一。2022年11月26日，在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主办的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论坛上，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司长刘喜堂介绍，自2021年7月民政部组织全国民政系统在原来开展救助的基础上开发建设了全国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目前已汇集了6300万低收入人口的信息，在低保、特困群体以外，还包括约610万低保边缘人口，即家庭人均收入超过低保标准1.5倍或2倍，以及约680万的临时救助的支出型贫困人口。所谓支出型贫困是指由于家庭成员出现重大疾病、子女就学、突发事件等原因，导致家庭财力支出远远超出承受能力而造成的生活贫困。由于这些家庭人均收入略高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无法享受低保，实际处于社会救助的"夹心层"，一旦遇到不测，往往比低保户更困难。

刘喜堂表示，近两年，民政部门工作重点在于认定低保边缘人口和支出型贫困人口，随着动态监测持续开展，估计监测的低收入人口可达全国总人口的5%左右；后续将按照分层分类原则实施救助，即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可享受低保金等基本生活救助，根据家庭需要给予相应的医疗、教育等专项救助；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可根据需要享受专项救助；其他临时遇困人员或家庭，给予急难型的社会救助。

为解决专项救助与低保的捆绑现象，刘喜堂还表示，将住房、教育、医疗、就业等专项救助向低保边缘家庭或者支出型困难家庭延伸。"目前文件正在制定中，很快要出台，实际上在工作中已经开始实施了"。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社会救助分会副秘书长姚建平透露，从实际效果而言，低收入群体覆盖面较窄，比如北京这一群体数量仅有五六千人。申请人需首先声明愿意接受家庭经济状况核对，通过核对方能被认定为低收入家庭，但低收入家庭又不享有现金救助，申请人往往缺乏动力。

征求意见稿在救助对象中，也写入了支出型贫困家庭。姚建平记得，在最近的几次研讨会中，支出型贫困是一大焦点问题。有数据显示，脱贫攻坚战后期，因病致贫人口已占贫困人口总数的42.3%。"这是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又较难解决的。"姚建平说，支出型贫困的衡量办法、刚性支出的界定范围等均存在争议。

林闽钢在对征求意见稿提出的建议中亦表示，从最早实施支出型贫困救助的上海来看，实际上能纳入的对象很少，并且在立法中如果收入、支出和消费标准三个概念同时使用，难以测量，特别是对农村家庭搞清楚收入已很困难，支出型贫困的界定更难。

关信平说，一些地方探索支出型贫困群体救助时，较为普遍的做法是默许基层社会救助工作人员有一定程度上的自由裁量。他建议，应建立多层社会救助瞄准机制，第一层为收入、财产瞄准机制，并将刚性支出纳入考量，第二层为群体类别型的瞄准机制，第三层为基层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按规则而实施一定的自由裁量瞄准机制。

求解民政牵头难

15年前，郑功成参与过一次社会救助立法研讨会。他后来回忆："当时看到几十个部门到会，都在希望将自己有关的工作内容纳入法律之中，我就知道这个法律很难如愿立法了，因为要把所有问题都归进来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在现实中还完全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要在法律上加以明确也是不可能的。"

类似的部门协调问题，宋宗合也多次遇到。他曾帮助一些地区起草专项救助的实施办法，在征求相关部门意见时，每个部门都询问增加内容的上位法依据，最终只能回到《暂行办法》的写法。

社会救助工作涉及民政、医疗、教育、住房等多部门。在郑功成看来，这种分割体制直接造成了政策、资源、信息分割，不同救助项目之间的协调联动不够。林闽钢也表示，《暂行办法》只依照"分工负责"的原则规定各部门事权责任，并未明确规范其相互间议事协调的具体法律责任以及相应的实施程序。

《暂行办法》出台前后，国务院批复同意建立由民政部牵头的全国社会救助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后又于2017年要求在全国建立县级政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协调机制，由政府负责人牵头，民政部门负责，卫生、教育等相关部门和单位参加，定期研究解决当地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问题。

这一协调机制在运行中仍存障碍。关信平举例说，2018年，某地住建部门进行农村困难群众的危房改造，计划在低保户、特困户和建档立卡贫困户以外扩大救助面，但因住建部门无法把握低收入家庭的数据和边界，便寻求当地民政部门配合，后者则表示没有这个数据。住建部门后来找到乡镇和村，基层干部考虑到扩面可能带来的额外负担，也不愿配合。

北京市西城区一名社会救助工作人员告诉财新，在基层实践中，各委办局都能完成自己职责范围内的救助，但对于特殊救助个案，大多期待民政兜底。"民政又是弱势部门，若非地方领导调度和相关部门协同参与，很难推动综合施策。"他回忆，自己曾遇到一名患重病的救助对象，在医疗救助保障已满额后，仍有许多其他医疗支出。患者找医保局，医保局认为已经尽责，其余兜底工作应交由民政。民政部门于是请区领导出面，启动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联席会议，根据情况一人一案，在联席会议上形成统一意见。

在社会救助从单一现金救济转向提供服务等综合救济时，也面临着多部门协调配合。一位基层工作人员表示，在为困难群众提供就业方面，民政部门和人社部门缺少分工、衔接，他所在的地区，失业的困难群众可以到人社部门办理灵活就业登记，但实际并未有固定工作，收入不固定。"从人社部门的统计来看，他属于就业人员；但从收入水平来看，属于收入偏低，有待民政救助"。

关信平认为，社会救助要从以往单纯"输血"的兜底网变为帮助困难群体发展"造血"功能的助跳网，需要民政和人社等部门联动，不仅安排工作，还应通过培训提高困难群众的工作能力。

体系整合的困难还体现在家计调查所依赖的数据库建设上。前述北京西城区社会救助工作人员表示，地税和国税合并后，个税数据缺乏，手机钱包、银行理财、商业保险理赔等数据整合也存在短板；当地推动的困难家庭数据平台，尽管有相关委办局参与，一些数据仍有待整合，一些部门出于信息安全或部门利益等原因，不愿共享信息。"大数据的核查比对本应是更有力的核查手段，减轻人工工作量，但现在感觉作用不太明显"。

宋宗合调研时发现，在推动一网通办的背景下，2019年上海家庭经济收入核对中心纳入了十余个委办局的数据，还包括小银行的数据，占到了所需20余个委办局数据的大多数，而其他省份多只能获得七八项数据。此外，全国有31个省建立了低保核对中心，但每个省份的数据来源和数据源级别不同，造成了区域间认定核对难以统筹。

自2014年起，姚建平作为世界银行项目专家，督导各地建立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系统。他发现，政府各部门数据往往需要所在地党政一把手亲自推动才能实现整合，而有些数据如金融资产等，其核查则受到法律效力更高的《商业银行法》约束。他建议，立法中要明确规定社会保障审核部门在获得申请人授权的情况下，有权要求其他相关部门提供户籍、婚姻状况、住房、纳税、公积金、养老金、车辆、股票、证券、银行存款、个人信用报告等相关信息，各部门也有义务为社会救助的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提供帮助。

对于民政牵头难的问题，郑功成表示，立法应明确民政部门担负社会救助政策体系统筹之责的管理体制，实行统筹规划、协同推进、分别问责；如果条件确实不具备，立法也至少要解决民政部门在社会救助体系建设中"统

筹”作用的落地问题。

另一种解决民政“小马拉大车”的路径，则是单项推进立法。姚建平表示，一些学者提出，应将基本生活救助与其他救助剥离出来单独立法，这是相较于前两次综合立法尝试的不同路径。财新注意到，征求意见稿保留了“可以单项实施，也可以多项综合实施”的规定。

杨立雄是单项立法的支持者。他认为，社会救助项目多、稳定性差、各项目差异明显，《暂行办法》采取“一揽子”打包的综合立法路径，造成文本整合度低、条文可操作性差等问题，而且将多项社会救助纳入立法保障范围，也可能会在短时间内给财政造成较大压力。他建议，将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助进行整合，建立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并对此立法，遏制低保人数继续下滑势头；在专项救助方面，可推进专项立法，对临时性、应急性救助项目则以行政法规方式予以规范；同时，民政部门应建立全国性的贫困家庭、低收入家庭数据库，形成上下级纵向贯通、部门横向互联的救助信息共享机制。

经费如何分担

2021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年全国用于城乡低保、特困人员供养和临时救助的资金总额超过2000亿元，其中财政资金为社会救助资金的主要来源。实践操作中，中央与地方对于社会救助的财政责任分担并没有明确规定。

林闽钢在论文中表示，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权上移、事权下沉，使社会救助等公共事务主要下放到地方政府，社会救助筹资结构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分责共担，中央政府承担主要的财政支出责任。自1999年以来，中央财政在低保项目中对财政困难地区进行补助，近年来中央转移支付比例不断上升，2014年中央财政支出占城乡低保总支出近70%，“这已不是‘补助’的性质”。

根据《暂行办法》，县级以上政府应将社会救助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政府安排的社会救助资金和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2016年，财政部和民政部联合下发《中央财政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不过林闽钢表示，上述文件对中央和地方资助比例、分担比重等都没有制度化的规定。

各地财政收支差异导致了央地资金分配的差异。宫蒲光注意到，在西部地区，社会救助资金过度依赖中央财政的问题比较普遍，如陕西省出台地方政策规定，市县两级财政按照上年度可用财力的3%和2%预算安排社会救助资金，但在实际运行中，陕西多数县的社会救助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其中低保资金中央转移支付比例高达95%，市县两级基本没有资金安排。

在2021年6月底全国政协召开的“《社会救助法》的制定”双周协商座谈会上，曾担任过12年四川省民政厅副厅长的全国政协委员张力表示，越到基层，财政安排的社会救助资金越少，他建议立法明确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救助资金支出责任，可参照义务教育公用经费保障方式，分档明确中央与地方按比例分担支出责任，同时考虑参照脱贫攻坚中县级政府可以统筹使用涉农资金的办法，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民政部2020年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提出，地方各级政府应当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合理安排社会救助资金，按规定列入预算，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中央财政给予适当补助。在林闽钢看来，这一表述略显笼统，他认为应明确地方政府的层级，规定财政预算救助资金的具体比例，明确中央财政补助标准。

杨立雄则认为，应明确中央政府的主体责任和地方政府的辅助责任。2015年，杨立雄曾与财政部合作课题，分析低保项目上财政支出低于财政预算的情况。为减轻自身责任，地方政府往往将支出责任一层一层往下转移，形成多级财政分担模式，甚至出现少数地区由省、市、县、街乡四级分担的情况。他建议，目前，低保和特困供养两项支出，中央实际上已承担了80%以上的责任，但是这种责任并未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也未用明确的计算公式划分央地支出责任，未来应在相关法律中对央地支出责任给予明确，并建立央地分责的计算公式。

临时救助考验

2022年春季，奥密克戎毒株引起的新冠疫情在吉林、上海等地暴发，关信平也有几个月被封控在上海家中。他观察到，一些无法外出工作的困难群众面临家庭经济困难。以往临时救助多关注急难事件，如因自然灾害或家庭突发等灾难性事件而导致严重经济困难和生计困难，但对失业导致的临时性困难关注不够。关信平向民政部提出建议，将因疫情造成收入降低、失业，导致家庭经济陷入困难的人群也纳入临时救助范围。“社会救助应设有预案和相应的法律条款，以应对这类紧急情况。”他说。

自新冠疫情以来，民政部已多次发布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政策文件，根据民政部统计公报，2022年前三季度，已临时救助619万人次，2021年全年共实施临时救助1198.6万人次，2020年则为1380.6万人次。

2020年发布的《意见》指出，强化急难社会救助功能，依据困难情况制定临时救助标准，分类分档予以救助；逐步取消户籍地、居住地申请限制，探索由急难发生地实施临时救助；畅通急难社会救助申请和急难情况及时报告、主动发现渠道，建立健全快速响应、个案会商“救急难”工作机制；推动在乡镇（街道）建立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

但在实践中，临时救助认定困难、经办服务能力不足、主动发现机制欠缺、受助对象人户分离等问题困扰着一线工作人员。

姚建平告诉财新，调研时曾询问基层干部，在财政资金充足的情况下，低保能否多帮助一些困难群众。由于缺乏家计调查的准确依据，在农村，低保对象认定中，民主评议起了关键作用，为避免引起矛盾纠纷，基层干部有时宁可舍弃多出的名额。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临时救助上，临时救助是否需要家计调查、资格标准的划定等都有待出台更具有可操作性的细则。

宋宗合表示，实践中，由于缺乏操作准绳，临时救助或成为低保的叠加。一方面，对于未经家计调查的对象，基层干部不敢发放救助金，担心会被事后追责；另一些情况下，临时救助的资金多用以支付低保户的学费、解决医疗救助等方面，未能发挥临时救助的功能。

宋宗合注意到，河北设立了自省级至区县级的社会救助基金会，将财政盈余注入基金会用以解决临时救助问题。对更多地方而言，基层的临时救助经费是根据上一年的临时救助数量申请，但突发情况往往伴随着救助对象数量增长，这意味着已预先固定大小的资金池要应对具有弹性数量的受助对象，打乱了基层工作程序。他建议，临时救助需细化操作流程，同时基于民政业务变动性和模糊性的特点，给予基层工作人员自由裁量权并建立容错机制；资金方面应自上而下建立临时救助的急难资金，并对资金来源、监管、权责等进行界定。

对基层而言，社会救助工作人员流动率通常很高。前述北京西城的社会救助人员坦言，新招入的社工先分配至社会救助部门，需直接面对受助对象，工作承受的不理解、不支持更多，但缺乏激励机制，往往造成工作一两年后即流失。但社会救助政策纷繁复杂，没有两三年的学习和实践也很难掌握。关信平表示，基层还存在的由居委会、村委会代办低保情况，缺乏稳定的和专业性较强的经办机构和专业人员，容易造成“人情保”“关系保”。

2020年，林闽钢就社会救助经办机构管理问题向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提出建议。他建议，社会救助经办机构应采取政府直管模式，形成覆盖全国的分层设置、垂直管理的组织系统，设立中央、省、市、县四级机构，在乡、镇和城镇中的社区设立相关服务网点，建立一支专业化的社会救助职业队伍，以专业经办制取代代办制。

此外，现阶段人户分离的情况导致主动发现机制欠缺。“政策没有找人，人也不会找政策。”宋宗合在调研时发现，除了主动发现机制的欠缺，弱势群体也缺乏权利意识。北京市民政局曾做过调研，约70%的受访低保户不知道自己应享有的权利。他观察到，由于临时救助对象多跨地域，所在地民政往往难以掌握相关的家庭收入数据，仅能依靠个人申报，造成基层工作人员不敢保、不敢救。

关于救助申请，征求意见稿中写道，申请社会救助应当按规定向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杨立雄表示，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已高达3.76亿，其中省内流动占比超过三分之二，人户分离接近5亿人。社会救助要打破户籍限制，一个关键措施是建立以省为单位的低收入人口管理平台，让“数据多路跑，群众少跑腿”，实现省内流动人口按常住地申领社会救助的目标。

在姚建平看来，社会救助应建立救助对象动态跟踪机制和主动发现机制。具体而言，应建立城市贫困动态跟踪系统，采集并跟踪城乡贫困人员的各种信息，尤其是重度残疾人员、患重特大疾病人员以及发生重大事故人员的信息，争取在贫困发生之前提前干预；另外，可利用现代通信方式和手段，建立一个包括社会爱心人士和志愿者以及民政、社保、卫健、教育、残联、妇联等有救助项目的部门经办人在内的网络，随时掌握潜在救助对象的线索，减少应保未保现象发生。此外他还建议，对因疫情影响而失业的困难群体，应提高失业保险的参保覆盖面。

周昕（实习）对此文亦有贡献

版面编辑：刘春辉

最新财新周刊｜海淘式微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2年第47期 出版日期 2022年12月05日

曾被预测为万亿元市场规模的跨境进口电商，历经政策红利终结、增长乏力和疫情冲击，大批垂类交易平台陷入困境，消费萎缩

文丨财新周刊 沈欣悦 杨锦曦

中国电商行业年底的两次大促相继哑火：阿里巴巴和京东没有披露综合电商最大促销季“双11”的战绩；过去数年紧跟“双11”的跨境进口电商大促“黑色星期五”，也罕见营销声量。

原因无他，曾经与海外促销季同步推“黑色星期五”的各类垂直电商平台，已经从半年前开始纷纷爆发经营危机。2022年夏天，母婴进口电商蜜芽正式关停App，在过去两年间其已逐渐放弃进口业务；买手制平台洋码头现金流极度紧张，拖欠了数亿元卖家货款。在跨境进口电商行业勃兴的2014年至2015年间，这两家公司各自融资数十亿元，快速成为行业“独角兽”，其中年销售额刚在6.6亿元的洋码头，估值就超过了60亿元，一度冲刺上市。

“严峻的现金流状况、业绩下滑、员工流失、货物通关效率等诉求，是当下不少进口电商平台普遍遇到的困境，进口品牌在面对国内品牌的竞争时，也开始出现疲弱态势。”深圳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如此总结跨境电商行业的困境。

跨境进口电商在中国进口贸易总量的比重仅为3至5个百分点。从海关数据看，无论体量还是增长，跨境进口电商大约从2021年开始陷入增长停滞，当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1.92万亿元，增长18.6%，但其中出口1.39万亿元，增长28.3%；进口5319亿元，却下滑0.9%。到2022年，进口下滑速度和幅度都在扩张，第一、二季度同比分别跌4.2%、9.3%。资本断供，叠加新冠疫情冲击，一批苦捱到2022年的跨境进口电商走到了自己的终点。

新冠疫情引起的海外供应链阻断、物流不畅，是跨境进口的一大阻力。另一方面，政策红利衰减，企业如果缺乏自我造血能力，行业如果找不到更多市场化需求，市场增长和规模必然走向停滞和萎缩。

跨境进口电商是乘着政策东风而起的。2012年12月，中国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工作启动；2014年7月，海关发布对跨境电商的监管要求，跨境电商的合法地位得以明确。据海关总署和中国电商研究中心统计，2014年中国海淘群体约1800万人，成交规模为1400亿元。市场当时预计，到2018年，跨境电商的市场规模将达万亿元级别。

但2016年税收新政的出台，使跨境进口电商失去政策红利，经营成本大幅抬升，行业融资迅速冷却，企业发展驱动力转向商品贸易能力，融钱砸补贴、价格战抢消费者的模式难以为继。IT桔子数据显示，2014年至2016年，跨境进口电商领域的投融资数量分别为17、44、36笔，2017年则骤降至5笔。

此后数年，在消费升级的推动下，中国消费者对进口商品的需求依然旺盛，据艾瑞咨询，中国跨境电商用户规模从2016年的0.42亿增长至2019年的1.39亿。在政策端，2016年以来，进口商品的正面清单多次扩充，试点城市范围增加，单次交易、年度交易金额上限也分别提升了3000元、6000元，为拉动进口消费提供了一定支持。行业整体规模从2016年的582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2050亿元，四年翻了2倍。

不过，由于基数增大、贸易摩擦等因素，跨境进口电商行业相对过去50%以上的年增速显著放缓，2019年和2020年增速分别回落至21.5%、11.5%。部分垂类或中小规模的进口电商在市场竞争中出清，而阿里、京东等头部综合性电商则在这一阶段凭借资本、流量、供应链等优势，狂揽海外品牌和中国用户，行业集中度明显提升。至2020年，阿里的天猫国际、考拉海购和京东国际，占据了跨境进口电商（B2C）中近七成份额。

渠道转变的背后，海淘主流也从最初的依靠代购邮寄、在海外网站自行下单转运，演变为在中国国内跨境电商平台直接购买、保税仓清关发货。保税仓模式的兴起，将海淘时效与国内网购基本拉平。

深圳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告诉财新，从跨境电商后台采购量、物流订单等数据来看，2022年上半年，美国、日本、韩国等全球主要贸易体对华外贸出口持续下降。数据背后是中国两大贸易港深圳、上海相继暴发疫情，货物通关受阻，对跨境电商进口行业影响甚大。

跨境进口电商洋葱OMALL总经理何伟成对财新称，目前行业面临的挑战，一是国内消费力有所下降，二是海关对跨境电商监管越来越趋向一般贸易靠拢，三是防疫对物流管控影响了消费者下单意愿，譬如某些区域有三个多月无法送达快递。

深圳市跨境电商协会补充称，受疫情、俄乌冲突、能源危机、欧美全域高通胀、美元加息等因素影响，美欧、日韩等主要贸易经济体的基本生产要素大幅涨价，这些出口商品价格上涨，让中国消费者消费意愿下降。与此同时，中国工业门类齐全，“物美价廉质优”的国货在加快替代进口商品。

垂类电商破产潮

于2016年4月8日落地实施的跨境电商进口新税政，业内俗称“四·八”税改，使得进口商品的税收成本普遍抬升，成为行业发展的转折点，资本热潮自此迅速退却。

具体而言，此前仅征收行邮税，且税额低于50元就免税；新政后按70%比例进行征收增值税、消费税，限额以内免关税，但超过限额须按一般贸易方式全额征税。比如海淘中流行的奶粉、保健品等品类，原本500元以下的订单不需要征税，新政后税率接近12%；售价100元以下的平价彩妆在跨境中占比很高，原本属于免税，新政后综合税率接近33%。跨境进口电商享受的税收红利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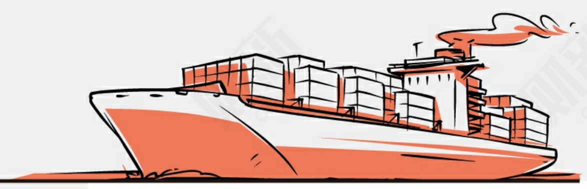
融资热潮迅速退去。主营母婴品类的蜜芽自2017年起未再获得外部融资。一名券商电商行业分析师指出，近几年来，跨境电商行业能够拿到融资的基本是出口平台或出口型品牌，进口领域几乎融不到资。

鼎堃跨境电商俱乐部创始人徐鼎鑫告诉财新，2013、2014年，很多进口电商起家模式基本是用资本补贴达到获客目的，通过价格战把主营品类的价格打到最低，自身缺乏造血能力。2019年，网易将考拉海购卖给阿里巴巴，被跨境电商行业视为另一个标志性事件。“这项交易，阿里的动机是吞并行业第二；而对网易而言，是不允许再烧钱下去。”前述分析师认为。

垂类进口平台一度被视为专注垂直品类，能获得较好的用户粘性，因而吸引了资本追逐。然而一旦更具网络效应、品类丰富且有价格优势的综合电商发力，垂类平台就失去了吸引力。“消费者为什么还要单独下载一个垂类App？”

“此外，进口电商缺乏‘贝塔增长’（指行业基本面的增长），因为满足的是消费者对特定品类、商品的需求，而中国供应链强，意味着进口供给的空间有限。”上述分析师称。

从微信生长起来的社交电商拼多多，通过短视频快速积累流量的抖音、快手，纷纷从电商巨头阿里手中抢走用户时间以及网购份额，而垂类电商获取流量更是艰难。“巨头动不动就能拿出数十亿补贴商家和买手，相比之下，垂类平台拿不到好的进货价、好的流量渠道，电商买家忠诚度很低，哪里多快好省就去哪里。”徐鼎鑫总结称。



跨境进口电商兴衰十年间

2012年起	事件	中国陆续批准多个进口试点城市
2014.2	事件	天猫国际上线
	影响	走通“保税进口”模式，行业快速跟进，利用保税备货模式迅速发展
2014.7	事件	海关总署发文明确对跨境电商的监管要求，增列海关监管方式代码
	影响	明确了跨境电商的合法地位
2014年末	事件	中国海淘群体约1800万人，成交规模为1400亿元
	影响	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淘市场
2014.11	事件	蜜桃网获得3000万美元B轮融资
	影响	资本追捧，跨境进口电商融资额不断刷新
2014.12	事件	蜜芽宝贝获得6000万美元C轮融资
	影响	资本追捧，跨境进口电商融资额不断刷新
2015.1	事件	洋码头获得1亿美元B轮融资，贝贝网完成1亿美元C轮融资
	影响	资本追捧，跨境进口电商融资额不断刷新
2015.3	事件	第一个“网上”跨境商务综合试验区正式落户杭州
	影响	被视为跨境电商行业强烈的政策支持信号
2016.4	事件	“四八税改”落地，进口商品税率普遍提高，可进口商品由负面清单变为正面清单管理
	影响	保证不同贸易形式下的税收公平、减少税收流失的同时，大幅抬高了跨境电商的经营成本
2018.11	事件	提高跨境电商进口的交易限额；明确进口商品不执行首次进口许可批件、注册或备案要求
	影响	消费者每年能购买的进口商品金额增加，新品的进口流程更简化
2020.1	事件	将石家庄等50个城市及海南全岛纳入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范围
	影响	区域间的政策差距进一步缩小，支持跨境电商在全国范围成长
2021.3	事件	将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范围扩大至所有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综合保税区、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保税物流中心（B型）所在城市
	影响	区域间的政策差距进一步缩小，支持跨境电商在全国范围成长
2016至2022	事件	五次扩大跨境电商进口商品正面清单，品类更丰富
2021.8	事件	母婴进口电商贝贝网拖欠供应商货款
2022.7	事件	蜜芽停止跨境进口电商业务，彻底转型
2022.8	事件	洋码头面临订单流失、银行抽贷，拖欠供应商货款

资料来源：财新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在多名跨境电商从业者看来，洋码头的危机，除了疫情带来的一系列冲击，实质是跨境进口行业必须走向合规。洋码头的主营模式是买手制，平台上入驻的卖家为海外个人或商家，平台仅提供撮合交易服务，不承担货物责任，属于轻资产模式。

一名跨境进口物流从业人士称：“相比自营，第三方买手能提供更个性化的服务，比如应客户要求拍商品细节，寻到小众商品，但需要买手自己解决物流，有的买手为了避税、少报税，走了歪门邪道。”

目前，跨境进口电商在清关环节面临更严格的税收抽查，这名跨境物流人士告诉财新，在跨境进口电商兴起早

期，海关抽查比例为2%至3%，现在抽查比例或提高至20%。而物流公司并不愿意接收不规范的小型买手型卖家的订单。因为一旦清关的货物中被查出少报、漏报现象，就会提升海关对同批货物的查验比例，甚至降低海关对物流公司的信任度，其他客户的货物清关速度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更倾向于服务大平台的正规客户，每个商品都有销售链接和凭证。”

随着海关监管趋严，企图避税的卖家只能辗转不同口岸设法入境，商品时效大受影响，生存空间愈发缩窄。“我们看到很多买手想要长久地做生意，也在转战大平台，很多洋码头的买手都转去天猫京东了。”上述物流从业人士说。

到2020年暴发疫情，进口电商供应链阻断，成为压垮垂直类电商的“最后一根稻草”。洋码头在2021年初融资一轮后，到年底资金链已十分紧张。2022年，行业开始大面积暴露经营危机。7月，蜜芽宣布停服，专注做国内ODM（原始设计制造商）品牌；8月，洋码头创始人兼CEO曾碧波用公开信方式透露公司订单流失、遭银行抽贷。乐吾淘、GMALL全球购等跨境进口电商也在近两年纷纷倒闭。

洋码头是上海的本土电商，主要用户和高消费用户大多来自本地。曾碧波称，2022年上海遭受长达三个月的疫情冲击，导致大量订单取消、流量流失，致其发展节奏被完全打乱。此外，由于国际航班运能减少、口岸清关时效大幅拉长，洋码头买手的资金结算回笼也受到严重影响，而用户耐心有限，订单取消率大幅增加。

物流优势不再

2022年10月中旬，为防控疫情蔓延，宁波北仑港码头等地静默管控，当地保税仓被封锁。北仑港是阿里巴巴跨境进口的主要港口之一。时值“双11”促销，北仑港被封打乱了诸多品牌的营销和销售。

瑞士牙膏品牌Dr.Wild的中国代理商Rachel告诉财新，疫情导致的突发问题很多，对初涉跨境电商的商家来说应对不足。“比如北仑港的保税仓被封时正值‘双11’前期，被国际物流判定有仓库积压滞销库存，无法再通过其他城市的保税仓进行备货。”

“2022年上半年，海关要求所有跨境商品进来后先静置七天。”一名跨境电商人士对财新说，现在部分口岸依然有这个要求。多名跨境物流人士表示，进口周期变长，对流转效率和消费者下单意愿的影响都较大。

跨境物流服务商海通万邦CEO余海清告诉财新，今年前十个月，来自进口物流的服务收入同比下降了两到三成。另一名主做食品的物流服务商称，从海外发货到清关完成，2021年的周期是7至14天，2022年延长至18天左右。

2022年3月至5月，北京、山东、浙江、河北等地纷纷出台进口货品疫情防控方案，要求对非冷链物品、不适宜消毒货物或非特殊急用货品入库静置，静置期为七到十天不等。余海清告诉财新，2月至4月，香港疫情最严重时，通过香港进口至内地的货物，甚至连静置都不能在保税仓内进行，要在保税仓外自行找一片地方静置7到15天。另外，进口货物在到港消杀后，进入保税仓还要进行二道消杀，进口链路时效大大拉长。

直到7月12日，国家卫健委发文称，新冠病毒在大部分物品表面存活时间短，一天内全部失活；各地不再对进口非冷链物品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对低风险进口非冷链物品不再实施预防性消毒。

跨境电商进口分为保税仓备货和海外直邮两种模式。保税仓属于“境内关外”，卖家提前大批量备货至保税区存放，消费者下单后再从保税仓清关发货，收货周期较短，与国内网购接近，但有滞销风险，适合标品、爆品；海外直邮是指下单后从海外供应商直接发至消费者手中，收货周期偏慢，适合长尾的非标品、小众商品。

“目前采用保税仓模式的跨境进口订单占比达95%左右。”前述跨境进口物流从业人士向财新介绍。天猫国际、京东国际、唯品会等跨境进口平台均在全国各城市设有自营保税仓，服务平台内部订单。

疫情导致进口周期变长，对食品、生鲜类目影响最大，从海外备货到国内清关完成时，很多保质期不长的食品已经变成了临期产品。“奶粉进来后，需要消杀、静置和清关。一些消费者甚至恐慌，误认为有病毒才需要静置，消费意愿有所下降。”徐鼎鑫认为。

“跨境电商清关效率优势已不明显。”奢侈品电商亿奢汇创始人刘平军告诉财新，亿奢汇以前主要依靠跨境电商模式清关，但从2020年开始逐步缩小跨境电商占比，目前八到九成货物通关以一般贸易的方式清关进口，因为利用香港仓库卡车运送货物清关，走一般贸易流程，周一到周四能够保证72小时完成清关；但如采取跨境电商模式，则需要7到14天。“奢侈品客户对效率要求比较高，对价格没那么敏感，我们愿意牺牲三四个点利润去提升客户体验。”

为减少保税仓封控带来的出货问题，天猫国际称，通过大数据对消费趋势分析预知到的热卖商品，会提前存放在各口岸的保税仓中。此外，来自世界各地奇特、小众的长尾商品，则通过直购方式发货到中国。目前，菜鸟在全球有1000多条物流干线，在中国建有170万平方米的保税仓，用于服务保税仓和直购产品。

跨境电商的成本也在增加，美元汇率上涨，欧洲通胀严重，物价上涨，服务于海外仓的劳动力、物料成本上涨：“海外仓属于固定资产投入，非常讲究规模效益。”上述跨境从业人士称，在跨境进口订单量下降的背景下，分

摊至单个包裹的成本飙升。

该名跨境进口物流从业人士称，目前，每个包裹仍须进行多次单包消杀，工作人员全部住酒店闭环管理，消杀设备也须额外花钱采购。此外，疫情导致航班熔断，航班班次减少以及燃油费上涨导致运价提升。“每一单包裹从国外发到国内，成本在二三十元钱，其中用于防疫的成本占一两元。”

市场萎缩

跨境进口电商市场的下滑幅度和速度，都甚于整体消费大盘。从业者担忧，这个一度被认为过万亿元交易规模的市场一蹶不振。

一家进口电商的负责人告诉财新，与2020年相比，近期平台上的客单价几近腰斩，尤其是高端品类下滑明显，“烟酒、戴森吹风机、高端化妆品销售都不太好，洗发水、沐浴露等必需品还可以。”他透露，不止自己的公司如此，唯品会等平台的进口商品销售也在下降。

“最大挑战是需求减弱，进口货少了。”一名进口食品物流供应链服务商人士告诉财新，该公司主要运输婴配奶粉和食品类商品，8月进口货量开始出现同比下滑。比如深圳盐田港，乳制品类商品以前每月进口150多个集装箱，最近两个月只有130个左右。她指出，跨境进口的奶粉以德国、新西兰品牌为主，定位偏高端，“经济不好，很多消费者消费降级，可能就转向国产奶粉品牌了，一个月大约便宜3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4月起，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多月处于统计以来的最低区间。在疫情反复的背景下，居民收入和收入预期均受影响，引起消费能力和意愿下降。

10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5%，环比降3个百分点，为6月以来最低。其中，升级类消费持续低迷，化妆品类消费同比下降3.7%，金银珠宝类消费同比下降2.7%，服装鞋帽、针纺织品消费同比下降7.5%，通讯器材类消费同比下降8.9%。

“进口电商覆盖的需求是偏中高端、可选属性强的，消费主力是中产，受宏观经济影响大，钱包收缩后砍预算，最主要砍的就是进口这部分。”前述券商分析师认为，进口电商消费差，主要是受国内整体消费疲软的影响，海外供应链不再是问题。

易观分析的监测报告显示，2022年二季度，中国跨境进口零售电商市场规模为1171亿元，同比下跌9.3%。

刘平军告诉财新，奢侈品的消费主力从“60后”“85前”，慢慢变成了“95后”，后者更喜欢潮牌、设计师品牌，可以看到整个奢侈品消费的平均客单价在下降。“奢侈品的趋势是，从身份象征、保值商品变成快时尚消费；大奢消费还很坚挺，但基本只集中在路易威登、香奈儿、爱马仕等有限品牌，原来火的Bottega Veneta等品牌下滑严重。”

由于国内疫情频发、散发，线下门店停业的日子显著增加，2022年上半年，奢侈品公司在全球业绩增长平稳的情况下，向来贡献颇丰的中国市场却遭遇滑铁卢。LVMH集团在中国的营收已现“严重的两位数下滑”；开云集团在中国最严重时有三成门店处于停业，中国在其财报中被称为受影响最大的市场，亚太地区（日本除外）的可比销售额下降了8%；历峰集团在中国内地的销售额二季度、三季度也下滑了两位数，拖累亚太市场整体下滑5%。

徐鼎鑫认为，市场对进口产品的需求依然在，一旦疫情恢复正常、需求反弹，依然会有大量货物涌入。不过，随着进口品牌、海外买手愈发倾向于前往更大平台经营，头部综合电商瓜分了绝大部分跨境电商的市场份额。根据易观报告，2022年二季度，在跨境进口零售电商市场（仅包括B2C模式）天猫国际以38.1%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考拉海购以23.4%的份额排名第二，京东国际以22.9%的份额排名第三。

天猫国际在近期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称，过去一年，新加入天猫国际的品牌有8500多个，新的品牌和商品增量非常快，满足了消费者对海外产品的需求。京东国际提供的部分品类销售数据显示，2022年7月，京东国际跨境酒水品类店铺数量同比增长154%，“618”期间跨境酒水成交额同比增长6倍；2022年上半年，跨境休闲零食成交额整体同比增长200%，乳制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60%。

亚马逊海外购在中国B2C跨境进口电商中排名第五，占据2.8%的市场份额。一名亚马逊人士告诉财新，亚马逊海外购今年卖得好的产品，例如国家地理益智玩具、VR头盔、设计师家装作品等，“国内电商基本不存在类似供给，可以理解成是超前于国内大众消费的部分。这部分盘子也许不会很大，但始终存在。”

空间仍在

“发展至今，跨境电商的优势已不在于优惠几元钱的税，而是进口流程相对简化。”何伟成表示，但跨境电商最具红利的两大品类——化妆品和保健品——监管越来越严格，行业担心相关政策存在不确定性。

税收新政后，历经两年过渡期，2018年最终确定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仍按个人自用进境物品监管，不执行有关商品首次进口许可批件、注册或备案要求。这意味着跨境电商进口流程相比一般贸易仍有简化优势、贸易壁垒更低，海外品牌能同步将新品销往中国。

不过，海关对跨境电商的监管趋向严格。一名北京海关人士告诉财新，近两年各地海关对跨境电商进口走私开展“断链刨根”专项整治行动，进入保税仓也需要更规范。

2021年12月31日，商务部、海关总署公布了更新后的《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目录》，三乙醇胺被列入其中，这意味着含有三乙醇胺的商品，在进口前须实施申请《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

何伟成解释称：“三乙醇胺是化妆品常见成分。2022年起要求含有此成分的化妆品办理‘两用物项许可证’，相当于视为危险化学品来监管。这个证很难办，通过一般贸易进口危险化学品的企业才有资质。”

在归类预裁定方面，跨境电商的监管也在向一般贸易看齐。“韩国化妆品很多是套盒，比如一个面膜加一个洗面奶，面膜属于高端化妆品，洗面奶则不是，一般贸易进口应该两类商品报两个税号，但跨境电商监管之前对此比较模糊，企业通常二选一报税。但近期这一做法正在被纠正，对两三年前报税不准确的案例予以罚款。”何伟成表示，监管趋严叠加疫情双重影响下，很多同行都放弃了进口电商行业，转做出口电商，或在国内做品牌，洋葱也在转型，增加国内商品供给的份额，开始做自己的品牌。

据财新了解，豌豆公主、菠萝蜜等跨境进口电商平台，因涉及用个人快件通道做B2C业务，也被予以整顿。深圳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告诉财新，个人境外海淘和海外代购这种碎片化的跨境电商进口贸易，不仅涉及通关、物流和支付等众多业务环节，还会随着各职能部门业务混合在一起，一旦职责边界模糊，监管难度就会加大。

刘平军认为，从某种程度来看，跨境电商是一个过渡性的临时政策，近年来随着一般贸易的关税有所下降，服务体系越来越完善，跨境电商在奢侈品等高客单类目的优势越来越不明显。

但综合性平台电商对跨境进口业务的感受不同。有平台电商人士告诉财新，跨境进口电商业务依然有非常强的政策支持，进口正面清单在不断扩充。“正面清单是根据消费者需求来扩充的，对企业、消费者来说都是利好。”

2022年3月1日起，再次优化调整后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正式实施，此次调整新增了滑雪用品、家用洗碟机、猫砂等29项消费需求旺盛的商品。2016年以来，跨境电商“正面清单”已经过五次调整。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城市范围也在逐步扩大。2018年，先在北京等37个城市试点运行，2020年进一步扩大至86个城市及海南全岛。2021年3月，试点范围扩大至所有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综合保税区、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保税物流中心（B型）所在城市及区域。

对海外品牌而言，跨境电商仍是新品进入中国市场的渠道选择：更灵活、滞销风险更低的海外直邮模式可以测试新品的市场反应。天猫国际告诉财新，2021年，加拿大西洋参品牌大山行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次展出花旗参即溶咖啡、花旗参即溶奶茶等新品，随后就在天猫国际上架；日本护肤及健康食品品牌FANCL在进博会上亚洲首发保健食品新品，并在“双11”期间上平台发售。

对部分品牌商而言，跨境电商则是应对代购的被动选择。Rachel告诉财新，Dr. Wild品牌通过一般贸易方式进入中国已经有八九年时间了，在2022年开始做跨境电商，尽管利润更低，但不得不做，因为“水货”已经对品牌价格体系造成了冲击。“我们是从厂家进货的，一些代购从药店进货，在电商平台也开了海外店，对我们造成了冲击，但无法投诉，只能自己也来做跨境。”

在生产环节，保税仓也能承接最后的加工环节，对冲海外供应链不稳定风险。天猫国际称，其推出的保税仓工厂，将燕窝、化妆品这些品类的最后加工环节放到保税仓，企业可实时对接消费需求，规避因疫情等各种不确定性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譬如美国一家化妆品品牌，通过中国国内订购包材，纯料体由美国进口，在保税仓工厂完成眼霜软管和罐装13万件的生产，保障了在这次“双11”前上架。

徐鼎鑫认为，跨境领域的一大趋势是，越来越多海外品牌被中资并购，“比如美赞臣出售给春华资本，贝拉米被蒙牛收购，Swisse被健合集团收购，上海国药也在并购保健品。”对垂直平台而言，转型势在必行：加强与实体渠道合作，比如宠物电商应专攻线下宠物店、宠物医院；增加国内标品的供给，不断扩品类、扩品牌等。▫

张而弛，胡静怡（实习）对此文亦有贡献

版面编辑：刘春辉

最新财新周刊｜图森“宫斗”警示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2年第47期 出版日期 2022年12月05日

一家横跨中美欧业务的自动驾驶公司，在监管压力下面临地域切割的困境。图森案例的警示在于，相似的危机在步步逼近类似的科技公司



2021年7月9日，中国上海，2021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图森未来展台。

文丨财新周刊 杜知航 余聪

业务跨越中美欧、在美上市“自动驾驶第一股”图森未来（NASDAQ：TSP）最近麻烦不断。公司不仅受美国政府的深度监管，被迫拆分中美业务，还被独立董事发起调查，质疑主要股东隐瞒关联交易，招来股民的集体诉讼。

10月31日，图森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CEO）侯晓迪突然被董事会罢免。董事会下属的审计委员会称，正在调查图森与氢能重卡公司Hydron的关联交易，而Hydron是图森公司另一位联合创始人陈默所创办。按照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要求，审计委员会由未在图森任实职的三名独立董事组成，监督公司的财务风险。

侯晓迪被罢免后，图森原运营执行副总裁Ersin Yumer接任CEO；董事会成员不变，仍为Brad Buss、Karen C. Francis、Michelle Sterling、Reed Werner和侯晓迪五人。但除了侯晓迪，其他四人均是外部独立董事，董事长则由侯晓迪变更为独立董事Brad Buss。

2022年3月，时任董事长陈默和CEO吕程双双辞职，两人职位由侯晓迪接任；到10月底侯晓迪被罢免后，图森未来领导团队再无创始成员，市场因此传出“几个‘洋姜’（非华裔）抢走中国人公司”的说法。

图森由陈默、侯晓迪于2015年在美国创立。陈默为加拿大籍，侯晓迪为美籍，其他高管也多为华裔或中国籍人士。3月，在陈默和吕程辞职的同时，图森在和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FIUS）签署的一份“国家安全协议”的要求下，在公司董事会设立了“政府安全委员会”，美国国防部前官员Reed Werner进入公司担任独立董事，并兼任政府安全委员会会长及审计委员会成员；图森还承诺控制数据存取、限制技术分享，并定时向CFIUS汇报。

未料到11月10日，剧情一百八十度大反转。陈默和吕程突然宣布回归图森董事长和CEO的职位，并“血洗”董事会，包括Reed Werner在内的所有独立董事均被开除。陈默和侯晓迪利用了纳斯达克上市规则，将两人的投票权集中到陈默手中，使得陈默投票权达到59%，继而重掌公司控制权。

公司夺回来了，损失却极其惨重。图森未来2021年4月上市时股价为40美元/股，而到2022年12月1日，股价缩水近95%，跌至2.24美元/股，市值从IPO时的85亿美元跌到只剩零头。尤其在侯晓迪罢免风波以来的一个月，股价就暴跌了六成多，迄今未见起色。

表面上，这是一场图森未来董事会内部的“宫斗”，同行却看得“瑟瑟发抖”。一名跨境贸易法务人士说，多家业务跨中美的自动驾驶公司紧急前来咨询，“图森的事要是落到自己头上，该怎么办？”；相关投资人也忧心忡忡，自动驾驶领域还没有一家公司能够盈利，主要依赖外部投资支撑研发与市场探索。一名自动驾驶行业人士称：“想投中国自动驾驶公司的美元基金，都在担心这些公司不敢再赴美上市。”

图森未来的英文名是“TuSimple”，然而它的未来不再“simple”（简单）。透过图森未来这一罕见案例，一群业务、市场和团队跨越中美的自动驾驶公司，正在急切寻找中美科技和市场脱钩后的可能出路。

争夺控制权

“我的职业和个人生活都是完全透明的，我充分配合了董事会，因为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从根本上否认任何不当行为。”10月31日，被图森未来董事会免职后，侯晓迪在领英上如此回应。免职前，他一人身兼公司董事长、CEO、总裁和CTO多职。

侯晓迪的被罢免，与独立董事展开的调查相关，而独立董事发起的调查又和美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图森早在上市之际就已招来美国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招股书披露，CFIUS正在调查图森未来的中国股东——新浪董事长曹国伟旗下的投资机构Sun Dream，该机构持有图森20%的A类普通股，曹国伟当时还担任图森董事。CFIUS意在审查Sun Dream对图森的决策影响是否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经历超过十个月的调查后，2022年2月22日，图森宣布与CFIUS达成协议，两名董事——曹国伟和新浪首席财务官（CFO）张怿——于当前任期届满后退出董事会，Sun Dream不再提名其他董事候选人，也不再增持公司股份。紧接着，图森原班高层接连离开。3月3日，董事长陈默和时任CEO兼总裁的吕程同时辞职，时任CTO侯晓迪接过他们的职务。

作为协议条件之一，图森董事会需要接纳一名具有美国政府背景的新独立董事——美国国防部前官员Reed Werner于4月23日就任图森政府安全委员会会长，对外职务是安全主管，并加入公司董事会下属审计委员会，参与监督公司运营。与此同时，陈默则退出了董事连任竞选。

Reed Werner来头不小。据领英信息，2004年至2013年期间，他的早期职业生涯在美国国务院、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美国海军预备役部队度过，其中在2004年和2006年两次派驻伊拉克；2010年至2018年转战商场，在投行高盛（Goldman Sachs）担任高管，其中四年在高盛香港担任执行董事；2018年至2019年，在北京英文在线教育平台大米科技（VIPKID）担任战略金融和全球公共政策副总裁；任职图森之前，Reed Werner重归美国政府，2019年至2021年在美国国防部工作，任南亚和东南亚安全事务副助理部长。

新领导班子组成后，离职的创始人陈默成为图森独立董事们的调查对象。审计委员会的调查一直秘密进行，直到10月31日罢免侯晓迪时才突然披露详情。

三名独立董事称，经调查发现，2021年，图森员工在工作期间为Hydron，即图灵智卡工作，劳动价值在30万美元内。审计委员会认为，陈默违反了公司章程，没有将这件事报告审计委员会，也没有得到审计委员会的批准。

2022年6月，陈默宣布在美国加州洛杉矶成立氢能重卡公司Hydron，主要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可搭载L4级自动驾驶功能的氢燃料重卡及提供加氢基础设施服务。据财新了解，当时Hydron已完成两轮融资，总计融资超过8000万美元，同时正在进行B轮融资，投前估值预计在10亿美元，计划募资2亿美元。

实际上，在此之前的2021年7月，陈默已经在上海启动了中国造车项目图灵智卡，定位为新能源商用车研发制造公司。

审计委员会显然将图灵智卡和Hydron视为一体。两家公司确实有一个共同的控股股东陈默，但接近图森的人士对财新称，两家公司是独立主体，且中国造车项目近一年多来已经处于和美国业务拆分的“飘摇”状态，不敢积极拓展市场。另一名人士则对财新分析称，陈默没把图灵智卡做起来，所以后来在美国再创业，设立了Hydron。

Hydron也曾对外声称，会跟具备L4级自动驾驶技术的公司合作，这种合作包括但不限于图森未来，并强调自己是一家独立公司，与图森没有股权关系。

但审计委员会指控，图森在考虑OEM（原始设备生产商）合作伙伴时，在签署保密协议之前，曾向Hydron及其合作伙伴共享了某些机密信息，这件事也没有及时告知公司审计委员会和政府安全委员会。

一名图森内部人士对财新称，侯晓迪因为Hydron的调查被罢免，可能是因为侯晓迪和陈默的关系很近，审计委员会想当然地认为两人私下串联，但这种怀疑目前来看缺乏明确证据。

多名内部人士或接近图森的人士均对财新表示，侯晓迪和陈默的关系一直很好。侯晓迪主内，是图森的技术领袖；而陈默主外，负责公司对外合作和融资。二人于2015年联手创立图森未来，总部设在美国圣地亚哥。陈默在青少年时期即移民加拿大，后来曾在中国互联网领域多次创业，创立过页游棋牌平台深蓝兄弟、楼宇广告平台苍穹广告、汽车交易平台车国网；侯晓迪则是较纯粹的“技术宅”，在中国上海交通大学读完本科，2014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得计算与神经系统博士学位，毕业后便联合陈默创办了图森未来。图森一名前高管透露，侯晓迪一手建立了图森的技术团队和技术核心架构。



图森被外部人控制了仅仅十天，11月10日，剧情急转，陈默、吕程突然宣布回归图森"官复原位"，夺回了公司控制权。"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根据尚未定论的审计委员会内部调查，终止侯晓迪CEO、总裁、CTO职务，并免去董事长职务，这是对股东和公司利益的严重损害和滥用职权的行为。"图森公告称，股东会投票决定罢免所有独立董事，"创始团队将带着初心回归，并尽快推进重组董事会与管理团队"。

陈默和侯晓迪二人在图森未来的投票权合计为59%，后者将投票权授予前者，以使图森成为纳斯达克交易所定义的"受控公司"（controlled company），陈默即可掌控公司控制权，反击独立董事，重新洗牌公司管理层。"陈默很聪明地利用了纳斯达克的上市规则。对两位联合创始人来说，这是利益最大化的做法。"联合能源集团总法律顾问、副总裁张伟华评价称。

博弈远未终结。图森仍须遵守纳斯达克和美国政府的要求，尽快委任新的独立董事加入审计委员会，还须重新任命安全主管。

图森未来已收到纳斯达克的退市警告。在10月31日侯晓迪被罢免之时，本是图森未来三季度财报的发布之日，但公司财报（下称10-Q报告）迟迟未发。11月17日，纳斯达克通知图森未来，最迟要在10-Q报告截止日后180天内（2023年5月15日前）提交报告。审计公司毕马威（KPMG）11月22日公告宣布辞去图森未来首席会计师，原因是"图森未来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未经政府允许“踢走”安全主管，可能让图森未来遭受CFIUS处罚。图森并未公开其签订的“美国国家安全协议”全文。据其他公司以往公开的美国国家安全协议，例如CFIUS与航天卫星服务公司Momentus Inc.的协议中，如果Momentus Inc.未经美国政府同意，将政府安全会主管从公司董事会撤走，公司须支付赔偿，其中包括支付每天10万美元（100万美元封顶）的罚款。

业务硬拆分

在自动驾驶卡车领域，图森一度风头无两。招股书披露，在启动上市前，图森累计获得超过8亿美元（约52亿元人民币）融资，投资方包括美国快递公司UPS、英伟达、鼎晖资本、新浪资本等。

在主机厂合作方面，2021年3月，图森与瑞典货车厂Scania合作，开始在瑞典路测。2020年7月和9月，图森分别与全球商用卡车OEM厂商Navistar和Traton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计划在2024年之前实现L4级自动驾驶卡车量产，并获得了5700个预订单。Navistar是美国最大商用车制造商之一，Traton是大众集团旗下的商用车子公司。

2021年12月29日，图森宣布旗下半挂式卡车完成在开放公共道路上的完全自动驾驶——没有人在车上，也没有人为的干预——此属世界首次。2021年报显示，目前图森运营约100辆L4级自动驾驶卡车，其中75辆在美国、25辆在中国，中国业务主要在园区、港口、矿区等封闭场所。

一名熟悉图森未来的人士向财新介绍称，图森的货运网络目前已覆盖美国一半城市，“在美国能想得到的大物流公司都和图森有合作”。原本图森预计2024年货运网络能覆盖全美，其官网称，美国物流公司UPS、DHL，货运公司U.S. Xpress、Schneider，联合太平洋铁路（Union Pacific），卡车租赁公司Penske、Ryder均是图森的合作伙伴。

然而，自CFIUS的调查介入开始，在中美高科技加速脱钩、数据安全监管加严等挑战面前，图森未来不得不作出改变。

在与CFIUS达成协议一个月后，2022年3月，多名知情人士向财新确认，图森准备把中国业务从上市公司拆分出来，以使中美业务各自独立运营。

一名图森人士当时告诉财新，中国业务将以10亿美元估值从上市公司分拆，以后在中国市场独立运营、运营团队保持不变。如此调整旨在规避美国政府监管限制。另一名接近图森的人士则称，图森甚至计划出售中国业务，并不排除中国业务团队进行管理层收购；不过，据财新了解，吉利控股集团也曾接触收购图森中国业务。

多名市场人士对财新分析认为，图森拆分中美业务，主要是外部监管压力。美国政府担心图森在美国的自动驾驶路测数据等敏感数据传到中国，也担心图森在美国研发的自动驾驶等技术流到中国，对美造成国家安全风险。

以国家安全为由，美国“长臂管辖”外国公司对美投资的历史悠久，这从CFIUS的“成长史”便可看出。CFIUS于1975年在美国总统行政令下建立，最初用来研究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对美国投资的政治目的，2003年“9·11”事件，以及2006年迪拜世界港口公司提出收购一家英国航运公司（包括该公司在美国六个港口的运营权）后，美国政界对海外对美投资的警惕性不断升级，CFIUS对海外收购的审查权力也逐步扩大。

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任内，CFIUS的权力大为提升。金杜律师事务所合规业务部顾问戴梦皓分析称，在《2018年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的要求下，除部分国家和特定例外的情况，涉及关键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和敏感数据的并购交易，一般要强制向CFIUS申报；CFIUS有权要求特定交易安排进行调整，甚至可以让已经并购的公司拆分。

近年来，CFIUS已介入诸多中国公司对美投资案例。2020年，CFIUS开启调查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收购美国公司Music.ly，目前该案尚未完全了结。而另一起收购案——中国泛海收购美国保险企业Genworth的交易，最终在2019年6月8日获批，但此前因用户数据安全隐私问题，交易双方多次向CFIUS提交材料并延长交易交割时间。

到美国现任总统拜登时期，CFIUS对中国相关公司的审查未见放松，甚至进一步细化、深化。2022年9月，拜登下达行政令，将CFIUS的监管重点与先进科技挂钩，要求重点审查“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产业”——微电子、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量子计算、先进清洁能源、气候适应技术以及对粮食安全有影响的农业工业基础等领域。在其任内被否决的中资收购案例包括：2021年12月，否决中国私人股权投资基金智路资本收购韩国半导体商MagnaChip Semiconductor（美格纳半导体）案；2022年9月，否决中国凯莱英医药集团以5800万美元收购美国生物医药公司Asymchem案。

美国白宫称，拜登的行政令将CFIUS的工作与美国政府的整体“国家安全优先事项”联系了起来，而“国家安全优先事项”，即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保护美国人的敏感数据和增强美国供应链弹性。

但与上述中国公司作为收购主体不同的是，图森总部在美国，创始人并非中国籍，CFIUS为何要查一家美国本土公司的事务？一名熟悉资产追索的美国律师向财新分析称，对任何外国主体可能控制美国业务的交易，CFIUS都可以审查；而就图森来说，最初引起CFIUS关注的是中国股东（即新浪）对（图森）的控制。

随着调查进行，CFIUS对图森的兴趣进一步深入到数据和技术的传输。在2022年2月与CFIUS达成的国家安全

协议中，除了须让中国籍董事退出，图森还须限制对特定数据的获取，并实行技术管制计划——这一要求直指图森中美同步运营的跨市场模式，因而切割其中关系在所难免。

但业务拆分并不容易。上述图森前高层表示，图森虽有中美欧等多地业务，但公司内部在数据、技术、知识产权和团队上原本是共享的，各地业务内容也是相似的，如要拆分，便要硬生生拆为两家独立公司，各自要有独立的数据、技术和商业化方案，而且从此互不相通，这对图森是一种极大的消耗。

他指出，TikTok应对美国政府调查的解决方案是"将美国的用户数据存在美国、中国的数据存在中国"，但这在自动驾驶公司身上很难实现，因为作为一家人工智能（AI）公司，数据几乎等同于技术，数据深刻融合技术并随时促进技术进步，"数据是拿来用的"，在各地收集到的路况数据用来建立算法和模型，最终融入产品并在各地销售。

多名行业人士也称，自动驾驶企业即使想要切割中美两国业务，数据库、代码库也没有办法完全拆分。此外，在团队上，许多创业公司的运营是扁平化的，团队跨国共用，难以拆分。

前述熟悉图森的人士称，图森原本计划于2022年9月完成中美业务拆分，但现实进度很慢，估计要推迟到2023年2月才能完成。他透露，拆分完成之后，中国公司需要"养活自己"，例如做一些自动驾驶级别较低的L2+级业务，来养活级别较高的L4级自动驾驶业务的研发。

图森案例的警示在于，对许多在中美两国同步开展业务的科技公司来说，相似的危机也在步步逼近。

戴梦皓指出，CFIUS一直在调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对美投资，但中国在全球购买力较大且又被美国认为能挑战美国国家安全，所以近年来成为重点调查对象。他提醒，与图森模式相似的科技公司可能需要作好自我保护与应对准备，包括作好最坏的打算。他指出，通过其他国家公司层层套"马甲"或拿税务架构来遮掩，这些手段在CFIUS那里可能是行不通的。CFIUS会进行穿透审查，并基于实际控制人对交易进行国家安全审查和评估。

也有行业人士指出："中国投资方背景只是一个明面上的理由，事实上很多投资基金看起来是中国背景，但钱可能是从美国募集的，这种该如何界定，究竟要穿透到哪一层为止？ 背后的根本问题是美国要如何定义这些资本和国家安全的关系。"

同行的担忧

图森的遭遇，令自动驾驶同行们不寒而栗。

一名前自动驾驶行业人士称，图森风波可能使那些想投资中国自动驾驶公司的美元基金趋于谨慎，"担心这些公司未来只能在中国上市，主要是背后投资退出问题"。

主要业务在中国的自动驾驶公司小马智行以及卡车自动驾驶技术公司智加科技，均是2016年在美国加州硅谷成立；2017年成立于广州的文远知行以及2019年成立于深圳的元戎启行，则都在美国布局了业务。大多数头部自动驾驶公司均在研发、测试方面布局美国。这些公司的创始人，过去一直相信技术、投资能够自由跨越国界。

美国加州因为领先的技术、开放的政策环境，被称为"全球自动驾驶大本营"。加州交通管理局（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DMV）每年公布的自动驾驶路测报告，涵盖测试车辆数量、测试里程以及在测试中驾驶员人工干预的次数，是业内评判自动驾驶企业能力的关键标尺之一。一名自动驾驶公司管理层人士曾向员工称："如果在美国没有办公室，怎么还能称得上自动驾驶公司呢？"

此外，各家自动驾驶公司在前期融资时也不分美元或人民币的资本，反而希望不同背景资本带来不同的属地资源，以助未来覆盖更多市场、扩张业务，并提升自身估值。

但到2022年，"市场站队"成了行业必须面对的现实。自动驾驶行业意识到，涉及跨境的股东结构和业务布局，可能招致更严苛的数据安全审查等监管风险。奥纬咨询董事合伙人张君毅认为，小马智行、智加科技这些在美国有研发、测试的企业，现在面临的监管压力都会很大，而2023年美国政府可能还会有更严苛的政策出台，需要针对性地梳理业务结构及布局。

美国原本是自动驾驶企业理想的上市之地，其二级市场对尚未盈利的科技企业有更大的包容度。中国造车新势力蔚来汽车（NYSE：NIO/09866.HK）、小鹏汽车（NYSE：XPEV/09868.HK）、理想汽车（NASDAQ：LI/02015.HK）均首先在美国上市。

2021年4月，图森挂牌纳斯达克，但6月滴滴（NYSE：DIDI）"赴美IPO"巨震后中国公司海外上市审查变严，小马智行、智加科技赴美上市计划也随之搁浅，只得更加依赖一级市场融资。小马智行一名内部人士对财新称，不管一级还是二级市场，关键目标都是募集资金。2022年3月，小马智行完成D轮融资，融资额未披露，投后整体估值达到85亿美元，后续融资压力不小。

一名知情人士对财新透露，智加科技也在考虑拆分中美业务。公路货运平台满帮（YMM.NYSE）是智加科技的大股东，"满帮希望出让一部分智加美国的股份换取智加中国的股份，让智加中国成为它的全资子公司"。

另一名自动驾驶企业人士则称，上述跨境布局的自动驾驶公司多为VIE（可变利益实体）架构，投资主体均在

境外。从目前规则看，如想要在中国内地上市，除非拆掉VIE架构；而到中国香港上市理论上可行，但是港股流动性不佳，估值也不高。

目前在L4级自动驾驶行业，无论Robotaxi（无人驾驶出租车）还是Robotruck（无人驾驶卡车），全球范围内均无法依靠自身业务“造血”运营，行业流行的说法是：“自动驾驶未来一定会实现，但是什么时候实现无人知晓。”这就意味着，L4级自动驾驶对外部融资“输血”还有着持续的需求。“现在整个行业面临的窘境是：上市上不去、融资融不到、大规模落地落不了。”上述人士称。

前述小马智行内部人士也向财新坦承，自动驾驶是一个需要投资人长期投资，以支持长期迭代的行业。而L4级自动驾驶可被视为经济风向标。经济景气时，投资人愿意为声称未来市场规模万亿级别的自动驾驶行业下注；经济萧条时，投资收紧，多数人在看不清落地时点的自动驾驶行业面前就会选择退却。

北汽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贾广红近日对外表示：“目前自动驾驶行业到了一个大家想要回报的阶段，资本市场出现迷茫是一个正常的情况，这其实是产业发展和资本投入的错配。”

中美两国的数据安全审查，是监管视野内的重要关注点。

作为美国公司，图森在美国须遵守多重数据和金融监管。对于数据跨境，美国近年来主张数据的自由跨境流动，并通过自由贸易协定等方式落实数据自由流通。但对会影响到国家安全的技术信息，美国则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

美国实施“受控非密信息”（CUI）制度，相当于信息的出口管制。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执行主任吴沈括介绍，CUI制度主要针对某些物品、商品、技术、软件等的非机密信息，如果这些信息出口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防扩散目标产生不利影响，则出口商需向美国政府申请出口许可。“实操中，许可申请通常会经过多重的审查过程，包括国防部、能源部、情报机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以及国务院下辖部门在内的美国政府相关机构都会参与审查。”吴沈括介绍称。

另一方面，由于有一部分业务在中国，图森若要把数据传到美国，也需遵守中国的数据监管。经过数年酝酿，《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自2022年9月1日起施行，安全评估是数据出境的合规方法之一，用于传输量较大、关键敏感的数据出境合规。▫

关聪对此文亦有贡献

版面编辑：刘春辉

最新财新周刊｜雅万高铁效应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2年第47期 出版日期 2022年12月05日

印尼乃至东南亚的第一条高铁，由中国高铁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建成



2022年11月16日，印尼万隆，雅万高铁试验段上行驶的高速铁路综合检测车。 图：李培养/新华社

文｜财新周刊 杨敏（发自印尼巴厘岛） 文思敏，应楚岩（实习）（发自香港）

11月16日下午，在G20峰会的中国—印尼元首会谈举行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一同通过视频远程见证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落地的标志性项目、东南亚地区的第一条高铁——雅万高铁——进行测试运营。

当两国元首和双方官员在连线大厅内坐定后，身穿相同制服的中国和印尼司机，分别用中文和印尼语向两国元首报告：雅万高铁的综合检测列车已经准备完毕。随后，习近平和佐科向他们下达了“开始”的指令。远程得令的两位司机随即转身，从站台进入车厢，启动综合检测列车。

随着掌声响起，一列银白色车身、身带橙红两色涂装的列车，缓缓驶出万隆郊区的德卡鲁尔站——这也是全长142.3公里的雅万高铁所设的四座车站之一。

这次进行综合检测的路段，是从德卡鲁尔站出发，行驶至巴厘岛的四号梁场。担当这次测试运营任务的综合检测列车，可以实时检测60多项技术参数，探测包括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灯设备的状态和列车动力学响应。未来，在雅万高铁通车后，这列高速综合检测列车，每天还会在客运列车发车之前执行检测任务，为雅万高铁的养护维修、保障运行安全提供必要支持。

雅万高铁，是印尼乃至东南亚地区的第一条高铁。通车之后，印尼首都雅加达到印尼第四大城市万隆之间的旅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个多小时缩短至40分钟。雅万高铁是中国高铁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在海外建设和总包出口的第一单项目，从高铁设计、工程施工再到装备制造和运营管理，雅万高铁全线都采用了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以及中国生产的工程机械、钢轨、动车组列车等装备。印尼作为东南亚大国，经济正快速发展，基建需求庞大，雅万高铁势必具有区域乃至全球示范效应，为中国未来更多出口设置标准和增加经验。

印尼大兴基建

印尼是全球最大的群岛国家，素有“千岛之国”的称号。由于地理疆域较破碎分散，印尼交通基础设施并不完善，特别是铁路和水路，都尚未建成全国性的交通网络，严重制约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是经济发展和引进外资的瓶颈。

“基础设施是帮助人类发展的最大杠杆之一。”印度尼西亚主权基金INA的CEO 里达（Ridha Wirakusumah）11月在G20峰会现场接受财新专访时说。他认为，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从一个贫穷的国家发展到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背后的一大因素是基础设施建设。

雅加达和万隆这两座城市都位于印尼人口最稠密的爪哇岛上。爪哇岛上住着1.5亿人口，占印尼总人口的近60%。雅加达的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若算上周边卫星城市居住人口超过3000万。然而，由于交通基础设施不便，使得雅加达的“去中心化”进程阻滞。

早在2008年，印尼政府就计划在爪哇岛上，为首都雅加达和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之间建造高铁，规划线路全长共700多公里。而雅加达到万隆的这段雅万高铁，则是这一宏大计划里第一个付诸实践的部分。

雅万高铁的建成，不仅能够直接提升两城之间人员往来和物流运输的效率，还将带动轻轨等配套交通设施的建设，极大地缓解城市的交通堵塞问题。万隆是印尼旅游名地和纺织业中心，与金融中心雅加达的进一步连接，能够促进双方优势资源的互通互换，提升当地经济的发展，对沿线地区的产业升级和投资也将有所带动。

印尼落后的基建设施也意味着巨大的投资机遇。2014年总统佐科上任后，开启了雄心勃勃的基建计划，以改善“千岛之国”的内部联通性，促进印尼东西部地区的平衡增长。

“佐科政府想优先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基建，另一个就是人力资本。”里达指出。据他介绍，雅加达到万隆的“生存之路”曾是一条非常糟糕的路，此前是300多年前由荷兰殖民者建造的。然而，交通不便导致物流成本和生活成本高昂，比如“过去在巴布省，1公升汽油的价格是雅加达的10倍”。

不过，印尼的基建发展计划面临大量资本缺口。根据《印度尼西亚政府2015年—2019年中期建设发展规划》，在五年内计划建设2659公里公路、1000公里高速公路、3258公里铁路、24个大型港口等项目，所需资金达4245亿美元。为此，印尼政府推出PPP（公共私营合作伙伴）条例，增加投资领域、提供更加灵活的法律框架，以吸引私人投资来填补基础设施融资缺口。

佐科政府对基建的高度重视以及印尼潜在的市场潜力，令日本和中国闻风而动。《雅加达邮报》在2015年的报道中，将中日高铁竞标形容为“下一盘大棋”，认为这是两国在亚太地区软实力的一次较量。

现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谢锋，曾在担任中国驻印尼大使期间向媒体透露，在雅万高铁的工程竞标过程中，日本也有意拿下这一项目，并先后多次向印尼方面提交方案。

日本当时为印尼提供的方案与中方相似，但融资条件更为优厚。日本报价40多亿美元，比中方50多亿美元的报价低一些；日方为雅万高铁项目提供40年期贷款，宽限期为10年，贷款利率低至0.1%，而中方提供55亿美元贷款，贷款期限为50年，利率为2%且有宽限期。

最终，佐科授权印尼国有企业部决定雅万高铁项目中标方。佐科希望该项目是企业与企业之间（B2B）的纯商业行为，而非政府对政府（G2G）的项目，“不能使用国家预算，不能对国家预算造成负担；作为企业间项目，尽可能多使用本地元素”。

中方在最终提交的竞标方案中承诺：将推动印尼的本地化生产，最大限度地使用本土的原材料、机具等，并尽量聘用印尼的管理、技术和劳务人员，为印尼提供大量就业机会；也同意可以进行技术转让，以扶持印尼铁路的长远发展。

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梁海明向财新表示，雅万高铁的建成具备多项重要意义，除了可彰显中国基建能力输出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吸引力，也能推动印尼的铁路技术、相关产业发展升级。

一位熟悉当年招标过程的人士向财新透露，印尼最终选择中国方案，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政权稳定性，因为高铁建设需要许多年，选择中国能有更持续的合作。

梁海明表示，这说明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信，中国高铁的高质量与实用性媲美甚至优于西方国家，且通过中国高铁在中国运行的多年良好实践，采用中国制造、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不仅可以给乘坐中国高铁的印尼民众带来舒适感、速度感、幸福感的体验，还能对中国与印尼未来开展更多的“新基建”合作起到示范、引领作用，进而推动印尼加快经济发展、产业升级、改善民生。



“过去交通不便，万隆是爪哇岛的内陆城市中心，但不能充分享受印尼丰富的海洋资源。高铁开通后，蔬菜生鲜甚至活鱼都可以很便捷地从雅加达运到万隆。同时还能增加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交流，带动万隆旅游业的发展，以及高铁沿线的房地产开发等多种产业经济。”21岁的印尼青年Fadhil颇具期待地如此勾勒高铁开通后的景况。

建设挑战重重

最终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组成中国企业联合体，和由印尼维卡公司牵头组建印尼国企联合体，双方于2015年10月正式签署雅万高铁合资协议，成立中印尼高铁合资公司（KCIC）。该合资公司负责雅万铁路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谢锋在采访中透露，2015年签订合资协议时，项目计划在2015年底启动仪式，2018年建成，2019年开通运营。KCIC对雅万高铁的运营于2019年5月31日开始，为期50年。不过，从2015年以来，雅万高铁的实际建设周期却慢于预期，并陆续面临征地问题、预算超支、新冠疫情等诸多挑战。

2016年1月21日，雅万高铁项目开工奠基，2018年6月项目正式开工建设。2022年10月13日，总统佐科在视察高铁项目时表示，项目总进度已达88.8%，并计划在2023年6月投入商业运营。

征地困难，是制约雅万高铁工程进展的最重要原因。由于高铁全线所涉及的土地都位于人口密集的爪哇岛上，在所有权上又涵盖国企、私企及私人用地等多种主体。在征地赔偿和费用谈判等问题上，很多印尼民众、企业与当地政府反复拉锯，连带影响工程进度。

雅万高铁的施工难度亦颇高。从地质条件来看，雅万高铁所在的爪哇岛区域多地震和火山；万隆则处在区域沉降段，沿线雨量极为丰沛，气候复杂多变，山川沟壑纵横，岩层地质复杂。

一位参与雅万高铁项目建设的知情人士在印尼告诉财新，为适应雅万高铁沿线的运行环境，为雅万高铁量身打造的列车组还采用了智能感知技术，配置地震监测预警系统。"地震、避雷等中国大多数地区不需要太费心的问题，在印尼（设备的敏锐度）可能需要提高一个层级。"

"从雅万高铁项目中，我们也学习到印尼当地市场的游戏规则、技术标准和文化习惯，丰富了项目实践经验，有助于对未来的项目进行提前预判。"这位来自中国的知情人士表示，雅万高铁的列车设计，也充分考虑了当地的文化和宗教习惯。除了采用印尼传统的腊染 （Batik）花纹图案做装饰，在每个车厢里还设置了祈祷室，供旅客在途中使用。

根据印尼雅万高铁项目部2018年公布的资料，雅万高铁项目当中，58座桥梁的总长度达84公里，在高铁总长度中占比六成，13座隧道长度约17公里，占比约12%。其中二号特大桥全长36公里，紧邻雅加达到万隆高速公路，地形环境复杂，桥梁其中一个主墩距高速公路匝道最近的距离仅20厘米。

为了落实生产尽量本地化的承诺，雅万高铁的建造方中铁在原本不具备梁生产能力的印尼开设了工厂，先后雇佣了两三千名当地工人，让当地职工从如何为高铁工程绑钢筋、架梁、制梁等逐步学起。

前述知情人士透露，建造高铁在印尼是一项从无到有的过程，包括很多高铁领域所使用的技术规范术语，原本在印尼语中还无法找到对应的词汇。未来，等雅万高铁商业化运营以后，还需要培训印尼当地的高铁运维公司。"这些生态系统的打造，也有利于未来在印尼的持续发展。"

2020年3月，受全球新冠疫情暴发的影响，雅万高铁又被迫暂缓。尽管两国都在积极推动高铁项目的复工，但修建成本仍不断上升。KCIC称，该项目的超支成本约有20亿美元，总成本估计将达73.6亿美元。

"疫情期间，中国承包商光是提供口罩、消杀、防疫等物资，就已经增加了不少开支。"接近项目实施工作的知情人士表示，疫情还导致项目工期不可避免地延长。这些因素都一定程度增加了资金压力。

印尼媒体Tempo 11月9日引述KCIC总裁威亚纳的话称，因购地成本增加、施工期程延后、材料价格上涨等问题，该项目预算已超支，并向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申请了约10.3亿美元贷款。在此之前，佐科亦于2021年10月签署总统令，允许使用印尼国家预算资金支援雅万高铁工程。目前，雅万高铁的项目支出占印尼2015年GDP的0.6%。

2022年6月，雅万高铁全线13座隧道实现全部贯通，工程建设转入铺架施工阶段。8月，采用中国标准、为雅万高铁量身定制的高速动车组和综合检测列车在青岛下线，9月间陆续抵达印尼雅加达。11月9日，雅万高铁试验段的接触网成功进行了热滑试验，确保高铁的供电设备能达到联调联试条件，这也为G20峰会期间进行的这次动态检测创造了条件。

雅万高铁铺轨采用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RTS III板式无砟轨道和减隔震桥梁支座。行控系统方面，则采用中国高铁标准CTCS—3列车运行控制系统。

如今，在全线隧道和桥梁工程贯通后，目前雅万高铁的正线已经开始铺轨，并有约十分之一的路段已具备上线测试条件。其他的运营工作也在有序筹备中，雅万高铁预计将于2023年6月正式通车。

雅万高铁是中国高铁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在海外建设的第一单项目。从高铁设计、工程施工，再到装备制造和运营管理，雅万高铁全线都采用了中国技术和标准，以及使用中国所生产的工程机械、钢轨、动车组列车等装备。

争夺东南亚基建

在"一带一路"的支持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基建合作已经从传统的基建项目，扩展到包含数字基建、电信基

建、智慧城市建设等新基建项目上，并一跃成为东南亚国家最重要的一方基建投资力量。

近年来，中老铁路、缅甸皎漂港、中缅天然气管线等传统基建项目依次落成，中泰高铁已经启动修建，中缅铁路也在修建之中；以“信息丝绸之路”为代表的非传统基建项目，也在东南亚地区大范围展开。

为了在基建领域与中国竞争，七国集团（G7）也在2022年6月提出了由G7主导的“全球基建设施及投资伙伴关系”计划（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该计划目标在五年内，为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筹集6000亿美元资金。美国将募集2000亿美元，主要来自联邦资金和私人投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则表示，欧盟将在未来七年筹措3000亿欧元，用于全球可持续基建及卫生设施。

由美国商务部领头，目前在非洲西南部国家安哥拉开展的20亿美元太阳能开发项目，便是“全球基建设施及投资伙伴关系”计划的旗舰项目之一。

为何基建项目的投资和承揽，成为大国间竞争在东南亚地区的体现形式之一？梁海明认为，东南亚地区长久以来存在“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平衡状态。但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在逐步打破这一平衡。在此格局下，意欲“重返亚太”的美国寻求在东南亚重塑影响力，具有其必然性。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嘉颖则向财新表示，美国在“冷战”中与苏联竞争时，也曾投入大量资本在海外参与基建。因此，美国如今宣布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基建，是为了让自己在这些地域的影响力与中国相比时不处于劣势地位。不过，庄嘉颖也称，美国在投资时，可能更倾向以政府资金与私营部门投资相结合的方式出资，步伐相对于中国会更加谨慎。

重大基建项目的完成，也有其溢出效应。以2022年3月通车的中老铁路为例，该铁路班列因需求庞大而多次增加开行班次，并对老挝经济带来了超出预期的积极效用，甚至帮助提升了老挝邻国泰国输华农产品的运输效率。

对印尼当地人而言，雅万高铁项目如今还成为民族自豪感的一种象征。一名来自雅加达的年轻人骄傲地对财新表示：“美国没有高铁，新加坡也没有高铁，我们印尼是东南亚国家里第一个有高铁的国家！”

王小青、朱俊熹（实习）对此文亦有贡献

版面编辑：刘春辉

显影｜健身房“瘦身”

撰稿｜财新周刊 孙嫣然，李丛汛（实习）
摄影｜财新周刊 李丛汛、丁可（实习）

教人瘦身的行业开始自我瘦身。高负债、高客单价、资金高周转的传统商业健身房被加速出清

11月24日，高楼林立的北京金融街空旷冷寂，商业区人流稀少，街面上几家健身房均暂停营业，驻留店内的工作人员一脸惆怅，未知停业到何时。

11月18日，北京市新增79例本土确诊、436例无症状感染者，至11月30日累计本土确诊人数超过3.3万人。

2022年5月，北京市民也一度居家办公并暂停堂食，健身房曾关闭一个多月。疫情三年来，暂停营业和限流导致直接收入损失，各地倒闭、跑路的健身房层出不穷。

多名北京地区健身房经营者对财新估计，今年倒闭且无人接盘的健身房占总量约四分之一。2022年以来，传染率更高的奥密克戎变异病毒带来了更频繁的疫情冲击，更多健身房迫于现金流压力倒闭。而据上海体育学院发布的中国健身行业报告，2021年主流城市的健身俱乐部和健身工作室已经同比下滑了近两成。

需求收缩，令健身行业滑入了存量竞争时代。常态化防控下，这个教人瘦身的行业也有了主动或被动的“瘦身”需求。高负债、高客单价、资金高周转的传统商业健身房被市场加速出清，小型社区健身房和教练自主开设的健身工作室，因规模更小、资产更轻，在疫情期间拥有了更强的抗风险能力。



北京金融街，因遇疫情员工大多居家办公，位于写字楼五层的健身房客流锐减，临时停业。

消费习惯变了

疫情防控给城市生活频频按下暂停键，商业设施门店间或停业，人流量急剧下滑；消费者因封控改变了生活习惯，不再坚持去健身房；而不绝于耳的健身房“爆雷”“跑路”消息更加重了他们的疑虑，很多人不再愿意为半年、一年的远期服务埋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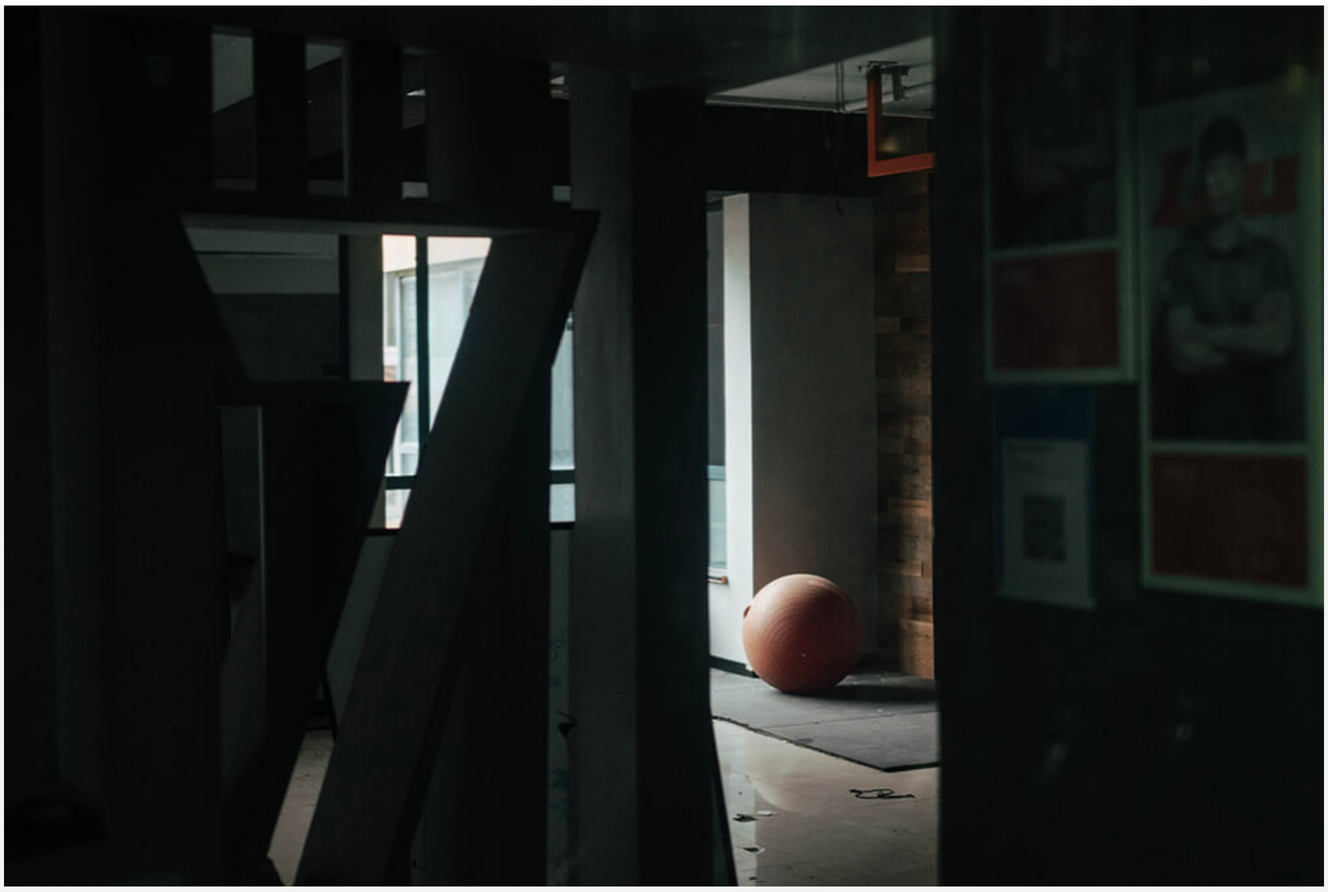
对健身房来说，人流量下滑导致会员办卡、续卡的营收急剧萎缩，入会购买私教课的转化率也相应下滑，风险偏好降低则表现为客单价显著不及以往。长时间的居家或社交限制，消费者健身积极性降低，很多健身房不得不采取停业期间不消耗会员卡时长的做法，进一步勒紧了本不宽裕的现金流。

陈可在成都开了两年多的健身房，就没能熬过疫情，不得不在2022年10月宣布闭店。他在2020年疫情初起时引入投资开店，本寄望在行业低谷之际抢占市场，如今看来是错得不能再错的决策，完全押错了入市时点。“到关门的时候一共亏了450万元。2022年成都的两次疫情封控集中在4月和7、8月，正好是健身的旺季。”他对财新说。

魏雨晴是一名健身私教，三个月前刚刚关闭了自己经营了五年的成都健身工作室。“其实每月能实现收支平衡，甚至有多余的流动资金，但门店频繁歇业让人看不到希望，不如加入一家综合性健身房，共享资源也分担压力。”



成都双楠街道，魏雨晴在一家综合健身房给会员上课。工作室闭店后，她将自己的会员转到这里，同时带过来一部分健身器材。



魏雨晴的工作室仍保持着闭店时的样子，“我不怀念这里，经历过的回忆都在心里”。

倒闭的健身房有几种处理方式，有的只是将会员批量转至附近另一家店，有的则是将店面、器材和运营模式一并出售给下一个入局者。苏雷做的正是健身房资产盘活的生意。他在2012年入行销售健身器材，2018年开始经营二手设备转售、倒闭门店转手交易等；二手设备通常被五折买入，再以全新价格的七到八折卖出。

“过去三年回收的量逐年递增，疫情刚开始时一个月能收几十家健身房，有的设备甚至是全新的。”但苏雷也有他的烦恼——现在健身房显著地关张多、新开少，收回来的货物卖不出去，从2022年10月以来，他几乎不再收购器材。“为了压缩仓储成本，很多存货只能当废铁卖掉，十台跑步机能凑够一吨！”

仍在维持运营的健身房压力巨大。北京的周沫加盟了六家乐刻运动健身房，她对财新表示，之前几家店均在两年内回本，2022年新开两家是因为疫情让商场腾出了门店空位。“新店投入的预售人员不比去年少，但因为人流下降，销售额比之前的少了两成左右。”

必爱体健身房位于北京时尚潮牌聚集的朝阳三里屯商业区，毗邻使馆区，人员流转率相对高。2022年以来，周边不少公司裁员、倒闭，门店会员流失明显。店长Lee对财新坦言，疫情导致的整体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一左右，门店勉强处于盈亏线上。“如果我们不是开在这个位置，可能也会倒闭。”



北京三里屯，Lee给顾客上私教课。Lee 表示，近年来购买年卡的会员在减少，现在私教课是收回现金流的主要渠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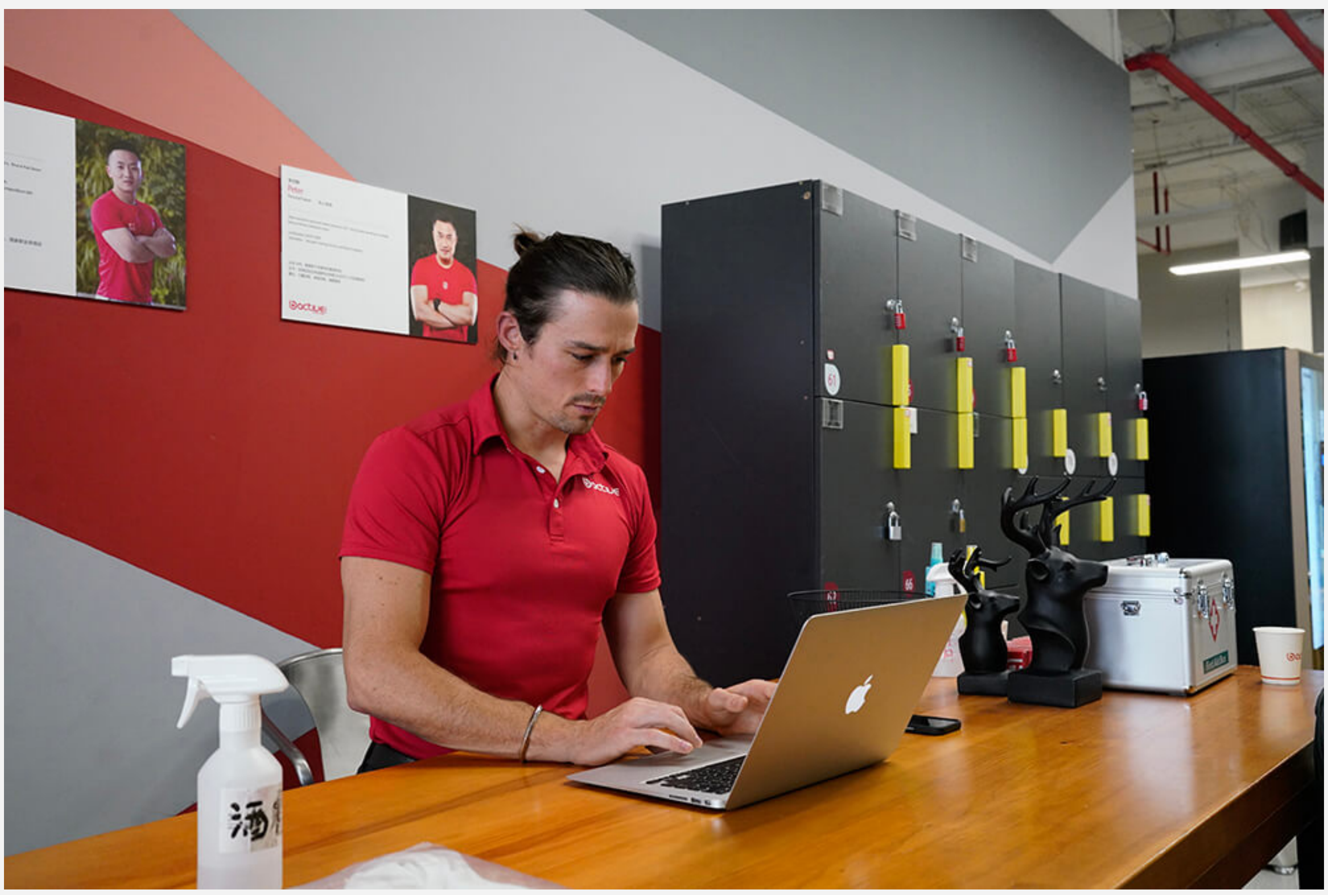
Lee的健身房坐落于商业区，平日下午客人不算多，因此15点前入店有价格优惠。



Lee在照片墙前介绍这家店成立六年间的往事。

美国人Robbie来成都已有十年，三年前开始负责运营必爱体北京、成都两地门店。他告诉财新，间歇性停业让持续消费变得更加困难，“关门20天足以让人失去前往健身房的动力”。魏雨晴也表示：“有会员刚建立好健身习惯并初见成效，封控结束后体重又长回来了，很打击积极性。”

年卡和私教课越来越难卖，而这曾是传统健身房迅速回笼现金的两大利器。陈可赶上过健身房的黄金时代，“2018年整个市场都很好，我们游泳健身卡卖3500多元一年，消费者看的是你场地大不大、设备多不多，稍微用一点现在看来很拙劣的技巧都能成交”。如今，陈可明显感觉到顾客消费力下滑：“以前他可能一买就是50、100节课，现在最多30节。”



成都航空路，Robbie在桌前工作。他认为关门20天足以让人失去前往健身房的动力。



工作结束，Robbie切换到锻炼状态，“锻炼与吃饭洗澡一样，是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

健身房变小

不少传统健身房主打高端概念，有的甚至配备了会所泳池，营业面积可达两三千平方米，前期一次性投入三五百万元是常态，后续运营中房租占成本大头。

“健身房对区位要求高，本质上是用房租换流量。”陈可曾经看过一个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项目，每月房租30万到35万元，人力成本30万元，加上水电和杂项开支，“一个月做不到100万元业绩就赔钱”。

高成本高投入之下，健身房不得不尽快回笼资金，“游泳健身了解一下”的地推话术遍布街头巷尾。一般而言，一家新开健身房会在前期准备过程中就雇佣地面销售团队，并利用预售卡资金购置设备等；开业之后，健身房也难以摆脱对销售团队的持续依赖，一间健身房维持十几、二十人规模的销售团队属于常态。很多健身教练还兼职销售，以从销售中赚取更多提成，以至于健身房和美容院一样充斥着营销气氛，这也令不少消费者反感。

实际上，传统健身房大量销售年卡，相当于背负了未来12个月的债务，只有在完成一年的服务之后才算清偿完毕。在这个过程中，健身房需要持续获得新客，或让老客复购课程，从而维持运营所需的现金流。

实际上，以过度营销快速回笼现金的年卡模式是一种“短期赌注”，赌的是用户办卡后不会坚持健身，不会过多占用健身房服务和资源。陈可透露了一个行业心知肚明的数据：一般一家店会有高达七成的年卡客户一年来店不超过十次，有长期健身习惯的不超过一成。

疫情挤破了很多高负债健身房的泡沫。即便没有疫情影响，健身房也只能做周边三到五公里的生意，新会员的增长终会饱和。Lee指出，传统商业健身房在开业两三年后倒闭是常态，“有的老板早就规划好了开新店‘续命’，或是做好了跑路的准备”。



成都双流区，苏雷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仓库里堆满了收来的健身器材。大幅缩减库存后，苏雷仍有四个类似规模的仓库。

如今，试图适应现有发展环境的新兴健身房，开发了月卡、周卡、错峰卡等更灵活、多元的促销花样，提供更多短期、低价的会员周期选择；比如，近两年兴起的团操课主要以次卡的形式销售，平均每节只需几十元。这些碎片化收费方式降低了消费者踏入健身房的门槛，吸引更多健身“小白”加入，也比年卡会员更能让人坚持。

周沫表示，自己门店中有九成会员选的是239元的月卡。Lee也表示，疫情期间，月卡会员的占比由三成提高到了半数以上。“我们的前期投入和后续运营成本都远低于传统健身房，因此靠月卡收入也能慢慢周转，实现收支平衡。”

客单价降低，考验着健身房压降成本的能力。新一代健身房大多开在人流密集的写字楼、商场，单店面积多在200至400平方米，有的甚至不配备淋浴间；设备多为面向爱好者而非专业训练者的轻量级器材，数量配置也少于传统模式；人员精简，团队大多不超过五人，教练基本兼任前台、销售的职能。

团操课是健身房“变轻”的重要方式。超级猩猩、乐刻、Keepland等机构均高薪聘请莱美认证教练，开设搏击操、瑜伽、跳舞、心肺等团操课程。莱美是创立于新西兰的健身品牌，自上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意想不到的是近两年在社交网络才真正流行起来。

团课只需要场地，不需要设备，加上很多综合性健身房的团课教练都是兼职人员，一节团课下来只需向教练支付200—300元的课时费，对健身房而言成本极低。Lee认为，团课是未来的趋势，“对于刚接触健身、不知道该练什么的人来说，团课能让你很快融入，价格更便宜，按次数买课也容易坚持”。



苏雷总是穿着一身正装出现在仓库，全程负责器材的收发。



近百辆动感单车已在苏雷的仓库里存放了两年。



放在叉车上的发货清单。苏雷经常从早上一直忙到晚上9点，“一个月前媳妇儿做产检，都是丈母娘带着去的”。



苏雷带着员工到双流一家健身工作室回收八角笼，几乎每次回收他都亲自到场。

强撑现金流

传统健身房基本靠强势营销留存、转化客户。陈可回忆称，2014年是行业转折点，“POS”（Present Order Sales，现单销售）模式开始盛行，主张私教兼任销售角色、促进办卡后的私教课转化，行业还流行一种鼓励销售人员与顾客建立深度情感联系的“加州模式”。“这些推销理论一度被健身房奉为圭臬，让教练以自上而下的姿态对顾客发动‘攻势’，达到‘替客人做决策’的效果。”

健身房最看重的年卡和私教课意在筛选客群，留住的都是消费意愿和能力都很强的客户。如今，健身消费者的年龄层在下降。魏雨晴称：“在2015年到2017年间，来买私教课的大多是30到40岁的女性会员，如今提倡全民健身，20多岁的年轻女孩越来越多。”

年轻人普遍主见强、重体验，对强势营销的套路不买账。在他们以周、月甚至一次团课为单位踏入健身房后，如何留存转化，稳住续卡率、复购率，成了新课题。新式健身房给出的答案是：重运营、轻销售。

私教销售提成模式已被新型健身房逐步抛弃，销售提成降低或彻底取消，课时费比重上升，以让私教专注于教学，给客户更纯粹的健身体验。周沫大学期间自己考了私教证，毕业后跨行进入健身行业，但传统健身房的销售压力让她落差很大，“私教收入来自会员卡和私教课的提成，每个月底薪只有一两千元，卡提、课提至少占四成。”相比之下，乐刻九成会员来自自己的App，用户办卡后可前往任意门店，教练不背负销售KPI（关键绩效指标），而是按照每次实际消耗的课时分成。

销售对引流、获客的贡献大为降低后，相应的营销成本就会提高。魏雨晴表示：“如今健身房价格更透明，消费者比价意识很强。门店在大众点评推出低价限量的团课引流，也很难规避用户转战多个健身房‘薅羊毛’的做法。”



成都长益路，一家健身房停业。

“对于疫情，我们其实没什么太好的解决办法。”Lee表示，他的健身房在北京只有4家，只能覆盖周边社区，线上营销的转化效果并不好，获客靠的还是客户之间互相介绍。

Lee的门店不走低价战术，比其他小型健身房单价要高一些，但强调服务质量和社群营造。财新采访期间，其店内进出客人不乏外国人，他亲切地逐个跟他们打招呼，能说出每个人来健身房的年头。店里刚做过万圣节换装训练活动，前阵子还举办过硬拉项目的内部比赛。

更长远来看，压降成本并不能彻底解决现金流压力，大部分小型健身房仍要靠外部资本支持，而行业融资在2022年已陷入停滞。乐刻、超级猩猩、Keep在2020年至2021年间获得数轮融资，其中乐刻、超级猩猩投后估值均超过10亿美元，Keep最后一轮融资估值则达到24亿美元。Keep于2021年传出美股上市计划，后因数据监管问题于今年2月转战港股，但直到招股书财报失效，港股上市仍无实质进展，9月份更新财务数据重新递表。

市场对健身是否为低频次、弱需求有所担心，而在强监管环境下，Keep这类互联网拓客模式也可能陷入高成本的增长瓶颈。Keep过去几年持续亏损，从2020年初至2022年一季度，累计净亏损超过61亿元。其自营的线下健身中心Keepland主要推广线上课程，占总营收比重不过一成。今年6月底，北京地区Keepland从2019年的13家收缩到了7家。

上述三家行业“独角兽”2022年均未传出新的融资消息。必爱体门店负责人Robbie说：“2019年盈利状况不错，股东给钱还挺容易的。现在疫情到第三年，投资人已经不相信你说的话了。”



北京金融街，一家健身房临时停业。

健身房瘦身只是疫情期间活下去的权宜之计。不少健身房还有站稳脚跟想“变重”、冲击行业顶尖的理想。魏雨晴称：“很多同行一开始走大众路线，积攒一定资金后，往往会想着开分店冲击高端。”

私教课仍是提高客单价、增厚利润的主要手段。乐刻自2018年起孵化包月私教课品牌FEELINGME，2022年以来加速拓店，目前开店100家；团课起家的超级猩猩也在2019年推出主打私教的门店作为“第二增长曲线”。

这同时也是由于主品牌拓店趋于乏力。据官方披露，乐刻目前总数在1140家左右，包括了旗下所有品牌和装修好未开业的门店，其中加盟店占七成。门店密度过高已经给乐刻带来分流隐患，在北京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两公里内开设五家门店的情况；商场店的定位也决定了选址点位总量有限，制约门店增长。

2022年以来，骑行、飞盘等户外运动热极一时，刘畊宏走红、帕梅拉入驻抖音，智能健身设备也取得发展。这反映出社会健身意识的进一步提升，同时也让居家健身、户外运动成了健身房以外的替代选项。

多名受访的健身行业人士都认为，健身房能够提供面对面互动、同伴之间彼此激励等线上不可替代的社交增值，线下健身仍有市场空间。“这些线上健身视频的用户如要继续健身，后续涉及器械使用和教练辅助，最终他们还会来到健身房。”Lee说。



北京上地，疫情之下，一家健身房临时停业。

（文中陈可为化名）

图片编辑 | 董德

开篇图说：2022年10月15日，成都，陈可的健身房停止对外营业，但仍有一些老会员自行前来锻炼。

订阅财新
支持严肃新闻

最新财新周刊｜万亿个人养老金开闸

来源于《财新周刊》2022年第47期 出版日期 2022年12月05日

锁定期长达十年以上的万亿资金引来了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公募基金、保险公司的同台竞争，将有效引导市场重估配置，优化久期结构，更给沉迷的资本市场带来长期资金愿景



市民用手机查看个人养老金服务项目。12月5日起，个人养老金缴费凭证可查询下载并用于当年的税前扣除，这意味着中国版IRA（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个人退休账户）在开闸短短一周后，即顺利打通各个关节。图：视觉中国

文丨财新周刊 岳跃 吴雨俭 程思炜 王石玉 全月

酝酿多年的中国养老第三支柱，终于在2022年末迎来历史性时刻。12月5日起，个人养老金缴费凭证可查询下载并用于当年的税前扣除，这意味着中国版IRA（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个人退休账户）在开闸短短一周后，即顺利打通各个关节。

2022年11月25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称"人社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公布个人养老金先行城市（地区）的通知》，36个先行城市（地区）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可参加个人养老金；账户开立在当天随即启动，11月28日产品陆续开售。

这36个城市（地区）中，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均入选，福建省则是全省纳入，浙江、广东、山东、河北、辽宁均有两个城市（地区）入选，其余省（自治区）多是省会城市入选。

目前，已有首批23家银行可开通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37家基金销售机构也能协助开户；个人养老金可投的四类产品中，129只养老目标基金以及7款保险产品均已上线，储蓄和理财产品也上线在即。

"周五（11月25日）下午3点上线后，当天就开了100来万户，第二天又开了100多万户，加起来200多万户。不过大部分人都只是到了开户阶段，真正的投资金额只有零头而已，多处在观望状态，据说到周六（11月26日）进入投资环节的接近2亿元。"有保险公司人士向财新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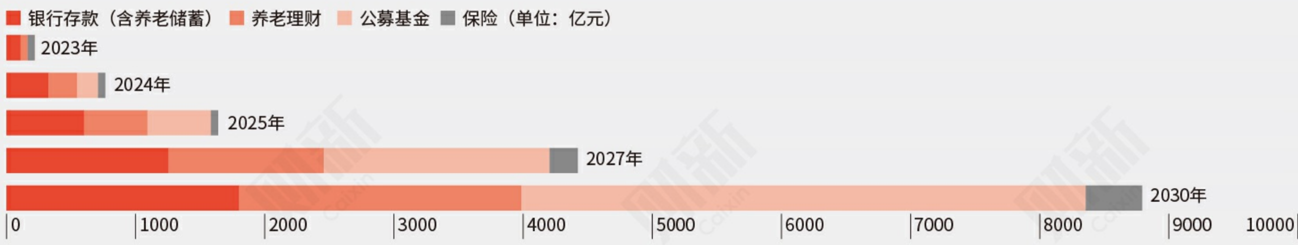
自2022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后，半年之内各项相关政策密集征求意见和正式出台，速度之快超乎市场预期。11月初，五部委联合发布《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个人养老金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与此同时，证监会和银保监会分别出台公募基金、商业银行、理财公司及保险公司的相关细则。至此，中国个人养老金的顶层设计搭建完毕（参见本刊2022年第44期《中国版IRA准备启航》）。

不同于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的社会共济属性，也不同于第二支柱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由用人单位建立，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参加人有更大的自由度和选择权，它是指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实现养老保险补充功能的制度。

正式开闸之前，预约办理账户开立就已成为各家参与机构的必争之地。多家商业银行派发"现金红包"或赠送礼品吸引储户开户。但从目前的开户数量看，与潜在有资格参与的群体相比并不算多；从产品销售情况看，目前规模最大的还是银行的养老储蓄，其次为养老保险，买基金的暂时较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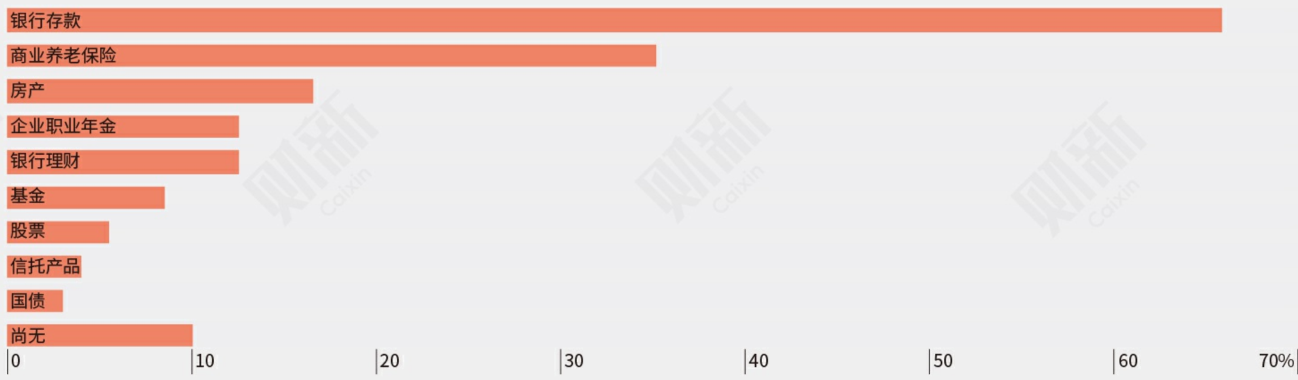
上海证券分析师刘亦千表示，个人养老金对中国居民而言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因此短期内参与的居民数量可能不多；对投资者而言，"为何要将资金投入个人养老金账户"是他们会产生的疑问；而想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现有政策在个人所得税方面提供的税收优惠外，还需要在投资者教育方面积极布局。

个人养老金及各类产品配置规模预测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1版》、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银保监会、国海证券研究所

养老金融不同渠道参与度



注：调查对象对金融市场不同渠道的养老财富储备方式的选择，多选题各选项占比之和大于100%

资料来源：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调查报告（2022）》

“中国居民要真正接受并践行长期投资和养老投资理念，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银行、公募基金等金融机构需进行持续的投顾和投教，这一工作任重而道远。”刘亦千表示。

目前，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公募基金、保险公司的四类产品各有千秋，在为不同风险偏好、年龄收入特征的人群提供选择的同时，各家机构同台亮相势必也会展开竞争。

申万宏源证券分析师邓虎表示，个人养老金当前业务模式带来的格局，如资金账户开户等使银行有渠道优势；但个人养老金产品无销售费用和极低的管理费率，让银行渠道的销售优势今后会下降。此外，个人年度参加额1.2万元的上限，让行业一直关注的首发规模失去意义，参与机构的重点将转向如何吸引个人投资者持续投入。

“初期肯定是银行唱主角，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个人养老金的本质和初心。储蓄和理财产品能否提供充足的养老资金？会不会最后又重返国家补贴的老路？什么样的产品能够真正实现养老替代？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一位资深的养老金行业人士称。

对市场来说，万亿元规模的个人养老金作为十年以上的长期资金将带给整个市场配置的全面重估，也有利于进一步优化A股资金久期结构，促进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更好地发挥。

必要的三支柱

中国为何推出个人养老金制度？一个重要目的是有效补充作为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

早在上世纪90年代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国务院就提出“三支柱”构想，经过30年发展，逐步形成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其中第一支柱即基本养老保险，包括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由法律强制实施，采取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旨在为退休人员提供最基本的养老保障；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主要发挥补充养老作用，由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共同建立；第三支柱是个人养老金和其他个人商业养老金融业务，由个人自愿参与缴费，是对第一支柱的有效补充。

在成熟市场中，美国的三支柱的比例为1∶6∶3，其第二支柱雇主养老金计划是重头；第三支柱中绝大部分都是IRA，截至2021年末的占比达到84%；而且美国还允许第二支柱内的资金向第三支柱转移，因此IRA近年在三支柱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目前中国养老保险体系仍存在第一支柱独大、第二支柱发展偏弱等问题。截至2022年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47亿人，2021年度收支规模达到12.6万亿元，累计结存超过6万亿元，构建了世界上最大的养老保险保障网，但这更多是中国人口规模所致。

四类个人养老金产品特征对比

	类型	入围标准	定位	权益资产配比
1	养老储蓄产品	储蓄存款（包括特定养老储蓄，不包括其他特定目的储蓄）	安全保值	0
2	养老保险产品	年金保险、两全保险、银保监会认定的其他产品	保值保障	0—20%
3	养老理财产品	投资风格稳定、投资策略成熟、运作合规稳健，适合个人养老金长期投资或流动性管理需要的其他理财产品	稳健增值	0—40%
4	养老公募基金	养老目标基金、其他公募基金；最近四个季度末规模不低于5000万元或者上一季度末规模不低于2亿元	积极增值	0—80%

	现行期限	优势	劣势	风险水平	增值能力
1	按产品设计期限：整存零取产品最短1个月可部分支取；特定养老储蓄整存整取产品分为5年、10年、15年和20年四档	本息有保障，安全程度高	收益低，长期增值效果差	低	低
2	保险期间不得短于5年；首批上线产品的领取条件均为不早于60周岁	兼顾风险保障和资产增值	投资增值能力弱，费率较高	↓	↑
3	以5年封闭式运作为主，部分产品期限为3年	收益较为稳定，费率较低	透明性差，权益投资能力较弱	↓	↑
4	1年至5年的持有期	长期收益能力突出	短期波动大	高	高

资料来源：财新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由于人口老龄化加剧、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本身的限制，尤其是生育高峰期出生的“60后”进入退休年龄，第一支柱的重要组成部分即职工养老保险的收支压力持续加大，部分省份如黑龙江已出现“穿底”（即当地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已耗尽），第一支柱对财政补助的依赖与日俱增。此外，由新农保发展而来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面临保障水平低等问题。

分别自2004年和2014年建立的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发挥了一定的补充养老保险的作用，但覆盖面仍然偏窄。财新根据人社部数据计算，截至2021年末，企业和职业年金参保人数分别约为2875万人和4325万人，积累基金约2.64万亿元和1.86万亿元，均远低于第一支柱。对劳动者来说，只有单位就业人员才能参与企业职业年金，大量灵活就业者无法参与这一补充养老制度。而且，目前参加企业年金的仍以大中型国有企业为主，中小型企业持续缴费的意愿不强，也就难以惠及相关劳动者。

个人养老金要发挥扩大参保人群覆盖面的作用，最大的制度吸引力是税收优惠。这也是个人养老金与通常意义上的个人存款、购买一般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区别，即用税前收入去缴费投资。

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近期明确的政策，个人养老金采取“递延纳税”的税收优惠模式，即缴费、投资收益环节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递延到领取环节征税；个人领取个人养老金时还享受一定优惠税率，不并入综合所得，而是单独按照3%税率计算缴纳个税，3%的税率也是现行个税最低档。上述税收政策自2022年1月1日起实施。

财新查询到，“个人所得税App”已上线“个人养老金扣除信息管理”功能，个人通过扫码录入个人养老金缴费凭证上的二维码，确认后导入个人养老金扣除信息。与子女教育支出、住房贷款利息或房租支出等专项附加扣除类似，个人可以选择在当年预扣预缴填报，也可以选择在次年3月—6月汇算清缴时填报个人养老金信息，从而享受每年1.2万元限额内的据实扣除，即用于缴纳投资个人养老金的这部分收入暂免个税。对取得经营所得等类型收入的个人来说，则只能在次年汇算清缴时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

在人社部的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上，每月5日起，个人养老金参加人可以查询下载上月的个人养老金缴费凭证；每年1月15日起，可以查询下载上年的个人养老金缴费凭证。在“个人所得税App”中“办税”栏目下的“扣除填报”页面，扫描个人养老金缴费凭证上的二维码，即可完成信息导入，在个税预扣预缴或汇算清缴阶段进行税前扣除。因此最早从2022年12月5日起，即可开始填报2022年度个人养老金的预扣预缴信息。

不过，个人养老金制度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吸引力可能不足。理论上，参与个人养老金的门槛并不高，10.47亿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均可参加，但递延纳税的优惠模式直接惠及的是现行个人所得税纳税人，大量无需缴纳个税的中低收入者难以享受这一红利。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18年—2019年公开的预估或统计数据，2019年新一轮个税改革全面实施后，个税纳税人从此前的1.8亿人降至6400万人，减少了1.15亿—1.16亿人；再考虑到专项附加扣除制度，有保险公司统计相关个税税基只有近千万人。而对中高收入者来说，由于中国目前对个人投资金融产品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吸引力也可能受到影响。

亦有包括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董克用在内的多名学界、业界人士对财新表示，中国发展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已非常迫切，当前先把个人养老金制度建立起来，吸引一部分人参与，再逐步扩大覆盖面。

万亿长线资金可期

个人养老金承载着弥补养老金缺口和助力资本市场发展的双重使命。随着基金、储蓄、理财、保险四大类产品可供投资，个人养老金能为资本市场带来多少增量资金？

根据人社部《202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21年末，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10.29亿人。理论上，假设全体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都参加个人养老金，且每人每年顶格缴纳1.2万元，那么给资本市场带来的增量资金会有12.35万亿元；假设仅有1%的参保人参加个人养老金，则增量资金将达到1235亿元。

但实际情况并不能如此简单测算。业内目前有多种测算口径，群体基数和参与率主要考虑试点单位、收入结构、税收优惠力度等因素。

有分析师根据国家发改委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司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共同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21）》数据测算，中国居民月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000元（即年可支配收入3.6万元）的比例约为16.34%；假设此类人群均顶格参与个人养老金，则每年有望为市场带来约2.02万亿元的资金增量。

不过，这一测算并未考虑月收入5000元以下免个税的情况，因此2.02万亿元的资金增量明显虚高。由于个人养老金领取阶段的税率直接对标的是累进制个人所得税率的最低档3%（月收入5000元至8000元），因此年累计应纳税所得额超过3.6万元（月收入8000元以上）的个人才更有意愿参与个人养老金的税收递延优惠，否则参与个人养老金反而会缴纳更多的个税或没有节税效果。

国海证券分析师李杨认为，边际税率在10%以上的人群（月收入1万元以上）参与意愿较高，而边际税率在3%的人群可能部分参与。假设月收入5000元至1万元、1万元至2万元和2万元以上群体的参与率分别为30%、70%和90%，中性估计下预计个人养老金参与人群整体在1200万左右，市场空间每年接近1500亿元。

“参考美国经验，个人养老金配置中初期预计以低风险的存款或理财类产品为主，但随着个人养老金认知度的提升和居民投资意识的强化，公募基金份额预计会快速上升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李杨表示，个人养老金落地之初范围有限，预计实际渗透率较低，随着试点地区的逐步放开，2025年的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629亿元，2030年预计达到8849亿元。

而关于这些增量资金在四大类产品中的分配比例，业界都给出了较为一致的预判，即初期主要配置银行类资产，后期会以公募基金为主。根据美国市场经验，在IRA刚起步时，银行储蓄类产品占比一度超过80%（1980年末）；但随着利率水平不断走低，储蓄难以满足保值增值需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共同基金等权益产品在IRA账户资产中的占比持续攀升；目前美国IRA持有的权益类资产占比约65%。

根据李杨的测算，2030年时，中国个人养老金配置公募基金规模有望达到4424.71亿元，占比50%。

国盛证券分析师王程锦表示，A股市场长期面临的机构化水平不足和资金期限偏短的问题，有望随着个人养老金的入市而缓解。“参考海外经验，个人养老金规模的壮大及共同基金的配置偏好将极大推动股市的机构化进程，而且养老金自带的长线资金属性也直接带动股市长久期资金比重的抬升，有利于进一步优化A股资金久期结构。”



首批入选个人养老金的保险产品

公司	产品名称	保障责任	领取条件
中国人寿	鑫享宝	养老年金、失能护理保险金、身故保险金	终身月领（或年领）、10年、15年、20年月领（或年领）
人保寿险	福寿年年	养老年金、重度失能保险金、身故保险金	终身领取、 10年、15年、20年、25年领取
太平人寿	岁岁金生	养老年金、身故保险金、全残保险金	终身领取、10年、20年领取
太平养老	盛世福享金生	养老年金、失能护理/疾病全残保险金、身故保险金	终身领取、固定期限10年(或15年、20年、25年)领取
泰康人寿	臻享百岁	养老年金、身故保险金	终身月领（或年领）、10年、15年、20年、30年月领（或年领）
泰康人寿	臻享百岁B款	养老年金、身故保险金	终身月领（或年领）、10年、15年、20年、30年月领（或年领）
国民养老	共同富裕	养老年金、身故保险金	终身领取（月领/年领）、10 年、20 年（月领/年领）

公司	保障利率（稳健型/进取型）	2021年结算利率（稳健型/进取型）	收取初始费用
中国人寿	2%/0	4%/5%	每笔不超过5%（目前为0.5%）
人保寿险	3%/0.5%	5%/5.3%	每笔不超过3%
太平人寿	2%/0	4.5%/5.53%	每笔不超过2%（目前为0）
太平养老	3%/0.55%	暂无	每笔不超过5%（目前为0）
泰康人寿	2.85%/0.5%	6%/6.1%	每笔不超过3%
泰康人寿	2.85%/0.5%	暂无	每笔不超过5%
国民养老	3%/0	暂无	每笔不超过3%（目前为0）

资料来源：财新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近日，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2022金融街论坛年会上表示，估值高低直接体现市场对上市公司的认可程度，要深入研究成熟市场估值理论的适用场景，把握好不同类型上市公司的估值逻辑，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估值体系，促进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更好地发挥。

虽然A股市场的长期趋势与盈利相关，但阶段性走势仍以估值为核心主导。王程锦表示，参考美股经验，20世纪90年代之前，美股同样面临与盈利阶段性背离的现象，但伴随美股投资者结构机构化水平的抬升，以及以养老金驱动的长线资金比重的提升，美股的定价体系自90年代开始基本与盈利保持强关联，即机构化趋势与资金久期延长

将促进股市定价向基本面回归；“未来伴随个人养老金的壮大与入市，A股定价体系也有望经历更为充分的重估与优化”。

银保基同台竞技

参加人普遍反映，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以及产品购买流程流畅简洁，总体上用户体验较好。参加人需要开设两个账户：一个是在人社部信息平台建立的个人养老金账户，用于信息记录、查询和服务，参加人享受税收优惠、领取养老金等以此为基础；另一个是在银行开立或指定的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用于缴费、购买产品、归集收益等。

这两个账户是相互惟一对应的。直接通过商业银行渠道，可以一次性开齐两个账户（信息账户、资金账户）；而通过基金代销机构开户，则需要额外开一个交易账户，再与上述两个账户绑定。达到领取条件时，资金会划转至参加人本人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

银保监会公布的首批可以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业务的商业银行共23家。目前，竞争开户客源已经成为各大银行的“主战场”。“个人养老金开户的数量都是给银行发了任务的，要求我们大力支持第三支柱。我们每个人身上是背指标的。”一位国有大行北京支行客户经理表示，“有一些客户可能已经在其他银行开好这个资金账户了，银行之间还是有竞争的。”

光大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指出，作为资金账户惟一开立机构，掌握着“资金入口”的大中型银行在个人养老金领域发展初期更具竞争优势；“借助多元化的综合业务布局，还可同时涉及个人养老金产品发行、销售、咨询、托管、给付等多重角色，提供‘一站式’养老金融服务，个人养老金制度有望从中间业务收入贡献、存款沉淀、托管规模等多重维度利好大中型商业银行”。

“虽然开户很丝滑，但是真正进入到产品购买环节时，保险产品的体验还是不太友好，因为要做‘双录’（指录音录像，目的是为了保证已向消费者披露产品的风险），很多人都卡在了这个环节。但如果是购买银行储蓄、基金则不需要这个环节。其实消费者的购买渠道都是自己的银行账户、个人养老金账户，无须再这么麻烦。”有保险公司人士表示。

以招行为例，在购买个人养老金中的保险产品时，App会弹窗提示“双录”。招行客户经理介绍，保险产品的购买可提供线上“双录”服务，同一家产品需要买一次“双录”一次，即使是同一产品要购买不同金额，也需要“双录”多次。“双录”时间约为5分钟。

银行有开户的特有优势，但其他金融机构不甘落后，也在个人养老金业务方面谋篇布局。例如，嘉实基金早就将养老金管理业务定位为战略基石性业务，并在2020年设立了大养老管委会；为发展个人养老金业务，嘉实基金还专门成立了FOF投资部。

“对公募基金而言，个人养老FOF属于让利产品，公募在考虑这个业务时，短期内并不看重它的规模对管理费的贡献，因为确实不多，刚开始能卖出10亿元都是比较好的了。主要还是支持国家政策，以及布局长远业务。”一位公募基金人士表示，企业年金刚开始的时候也不起量，如今也有公募基金后悔没有第一时间拿到试点资格而申请相关业务。

“总规模不会太大。目前保险公司如果准备这项业务，多以服务国家战略为主，要做的话前些年肯定是要往里贴钱的。”一名中小型养老保险公司高管坦言。

接近保险行业的监管人士向财新表示，目前从政策制定来看，对于个人养老金的保险产品，均依据现有监管规则，并无突破。“近两年行业面临转型，整体都比较难。个人养老金是一个新模式，很多东西需要在探索中前进，也需要观察消费者和市场的反应，再看业务如何调整，整体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在推行个人养老金的同时，银保监会也强调了商业养老保险在“第三支柱”中的重要作用。在日前举办的2022金融街论坛年会上，银保监会人身险部主任陈映东就表示，要统筹推进第三支柱养老保险规范发展，支持金融机构积极开展个人养老金业务，同时持续深化商业养老金融改革。

富达国际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丛黎对财新表示：“在所有养老金投资产品里，比较难做到某一类产品可以满足全生命周期的需求。我们认为现阶段在四大类产品中，每一类产品都会有自己的一些优势，也会有短期内需要进一步弥补的地方。四类产品互相弥补、互相合作，共同满足投资者多样化的需求。我们并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合作关系。我们现在也与银行、保险机构等合作，帮助它们做底层资产配置。”

“保本”产品选择多

参加者在选购个人养老金产品时，在投资收益率之外，资金的安全性也摆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从后者来看，银行发行的养老储蓄、保险公司发行的养老保险都具有明显优势，属于不会“赔本”的买卖。

目前，个人养老金的产品池子里尚未正式上线养老储蓄产品。不过，从2022年11月开启的养老储蓄试点情况看，部分特定养老储蓄的年利率高达4%，具有不小的吸引力；而个人养老金中保险产品的保底利率，多定在2%—

3%的水平，但2021年的结算利率最高也达到6%，且存续期限长，首批上线的7款产品领取条件均为不早于60周岁。

自2022年11月20日起，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在合肥、广州、成都、西安和青岛开展特定养老储蓄试点，单家银行试点规模不超过100亿元，试点期限为一年；产品包括整存整取、零存整取和整存零取三种类型；个人每家银行的购买上限不得超过50万元。

"储蓄存款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期限多，品种全，方式灵活，本息保障，适合风险偏好较低的客户。"农业银行个人金融部账户与支付管理处处长蒋浩表示。

特定养老储蓄产品的期限分为5年、10年、15年和20年四档。与一般的银行储蓄产品相比，它在保本的基础上，还能享受较高的收益率。也正因如此，一经上线便受到了市场的热捧，部分银行网点的产品额度销售一空。

特定养老储蓄产品的年化利率，若整存整取，在广州、西安和成都三地的年化利率高达4.0%，在青岛和合肥的年化利率是3.5%，比一般的5年期定期存款利率（2.75%）最高多出了1.25个百分点；若零存整取或整存零取，广州、西安和成都的年化利率为2.25%，青岛、合肥的年化利率则为2.05%，比同类5年期定期存款利率（1.55%）也最多高出了0.7个百分点。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在利率下行周期，银行储蓄产品难以长期维持高达4%的利率，"毕竟4.025%的保险年金都已经下架了，现在长期产品最高只能卖到3.5%"。

目前，四大试点银行在不同城市的进展不一。工商银行广州某营业网点客户经理介绍，目前购买特定养老储蓄产品暂时无法通过手机银行等手机App完成，必须在营业网点办理；而中国银行西安某营业网点业务人员表示，虽然试点已经正式开始，但目前正在组织业务学习，尚未正式开始销售。

此外，多家非试点银行对财新表示，它们正在积极研发、上线更多养老储蓄产品。招商银行相关部门负责人对财新表示，该行目前正在研究养老储蓄存款产品，争取加入下一批养老储蓄试点。

保险产品方面，首批进入个人养老金保险名单的七款产品分别来自六家险企，包括中国人寿、人保寿险、太平人寿、泰康人寿四家人身险公司，以及太平养老、国民养老两家专业养老保险公司；产品分别是年金保险、两全保险和其他银保监会认定的产品，专属商业养老保险也在其中。

"个人养老金保险产品具有运作安全、成熟稳定、标的规范和侧重长期保障的特点，险企准入门槛高，产品选择严格。与其他种类产品相比，保险产品侧重长期、稳健，具有保障责任。"蒋浩表示。

七款个人养老金保险产品都搭配了"稳健回报"和"积极进取"两类账户。其中，稳健型以长期固定收益类资产配置为主，追求长期稳健的投资收益；而进取型在固收类资产的基础上，还配置了更大比例的权益类资产，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同时追求长期较高的投资收益。

两类账户间可自行灵活转换，不收取账户转换费。从具体的收益率来看，稳健型账户的保障利率水平多处于2%—3%；其中，人保寿险的"福寿年年"、太平养老的"盛世福享金生"、国民养老的"共同富裕"三款产品保障利率为3%。

进取型账户的保障利率较低，但目前实际的结算利率较高：进取型账户保障利率最高的是太平养老"盛世福享金生"的0.55%，而中国人寿、太平人寿和国民养老的保障利率为0；从结算利率看，进取型账户有较大吸引力，中国人寿的"鑫享宝"、人保寿险的"福寿年年"、太平人寿的"岁岁金生"、泰康人寿的"臻享百岁"四款产品在2021年的结算利率处于4%—6%，其中泰康人寿的"臻享百岁"结算利率最高达到6.1%。

产品的保障内容上，所有保险产品均涵盖了养老年金和身故保险金。前者是指被保险人在60岁及以上时，可选择终身领取或是在固定期限（如10年、15年、20年等）领取养老保险金直至身故；后者则指若被保险人在60岁前身故，则保险公司可向受益人给付申请时的账户价值。

此外，中国人寿、人保寿险、太平人寿和太平养老的产品还囊括了全残/失能保险金；未提供该类保障产品如国民养老的"共同富裕"产品，则提供特殊退保保证。

不同保险公司的起付线也不一样。比如在招行App上，国民养老的起付线为2500元，而泰康人寿则定在了1.2万元的最高上限。

以中国人寿"鑫享宝"利率演示为例：若一名男性从30周岁起，每年向该产品的稳健型账户投入5000元，连续投入30年，并选择终身年领的方式，其从60周岁起每年可领取养老年金1.14万元（2%的保障利率）/1.61万元（4%的结算利率）/2.32万元（6%的结算利率）；累计领取金额随年龄增长而增长，若至80岁（目前中国平均寿命为78岁，男女略有差异），共可获得24.04万元/33.89万元/48.69万元养老年金。

如果该名男性从30周岁起，每年向进取型账户投入5000元（最低保障利率为0时），同时选择十年期的固定领取方式，那么自60周岁起，他每年可领取1.70万元/3.96万元/4.75万元（分别基于0/5%/6%的结算利率）；累计领取的金额为固定数，即十年共获得17万元/39.61万元/47.58万元。

有业内人士向财新表示，由于保险公司的系统建设和对接速度稍逊于基金公司，目前并非所有银行渠道都可以购买到保险产品。比如，招行App上暂时仅显示了国民养老和泰康人寿的产品，而中国人寿目前仅对接广发银行、太平养老对接兴业银行。

“银行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业务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保险只是出产品，目前很多险企还没开发完系统或未完成多方测试，银行也不着急，它们忙着自己系统开发测试上线呢。”一名还未上线个人养老金业务险企的高管表示。

长线看待风险产品

含权比例是影响个人养老金产品波动的核心。一位公募基金资深人士表示，30岁至40岁人群，风险承受能力较强，可支配的现金经得起数十年的流动性耗损。拉长时间维度，选择权益资产占比高的产品利于做高收益率，养老目标基金、养老理财产品都在备选范围。

截至11月底，首批入选的129只养老目标基金产品中，包含50只养老目标日期基金和79只养老目标风险基金，规模共计890.59亿元，持有期一至五年不等。

两类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同。目标风险基金先期以进取型投资为主，目前投资组合中权益资产占比最高的达到80%，普遍在50%左右；而目标日期基金先期以稳健型投资为主，目前投资组合中非权益资产占比最高达到90%，普遍在80%左右。不过，它们成立以来的加权平均年化收益率约-1%。

“可能是因为在个人养老金之前的投资者资金期限相对较短，养老目标基金很难真正按照养老属性来进行资产配置，叠加2022年以来权益市场大幅波动，导致成立时间较短的养老目标基金还未积累收益就遭遇了大幅回撤，未来长钱不断入市后，预计情况会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善。”中信证券研究部的观点称。

从黎对财新表示，在养老储备的过程当中还是要看长期的业绩，产品是为了未来养老做投资的，不能只看短期一两年的表现。现在市场整体确实波动比较大，不光是养老目标基金，其他类的基金产品和金融产品同样面临这样的情况。

在银行理财方面，目前参与养老理财产品试点的是十城、“10+1”家银行理财子公司，试运行近一年时间。截至11月25日，存续的养老理财产品共计50只，规模合计995亿元，大多数设有五年或十年封闭期，也有三年期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理财产品除了绝对收益策略导向，还增加了收益平滑基金的设计。具体而言是通过提取部分超额收益以备在业绩低于基准时进行回补，实现“削峰填谷”、降低净值波动的作用。

“养老理财是有业绩比较基准的，这个标准由理财公司设定：市场部跟投资部说，能不能定高一点；投资部说已经挣不到钱了，不能定这么高。”一位券商投顾人士指出，业绩比较基准定为5%的肯定会比4%的好卖，但业绩若在短期内不达标，会不会增加投资者投诉和纠纷呢？毕竟“刚兑”心理还有一定惯性。

关于个人养老金可投资的公募基金产品，一位市场人士也对财新称：“肯定不会一开始就把全部公募基金都纳入进来。要赶上现在这个行情，养老金都亏没了，以后谁还敢买？有可能和当年出师不利的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基金一样，完全被踢出市场。所以初期还是要以低波动稳健的产品，或者有锁定期、服务客户生命周期的产品为主，没有必要一上来就抢地盘。养老金融市场要培育，至少要有10年、15年以上的过程。”

根据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的数据，截至2022年上半年，过去的五年、七年和十年间，标准股票型基金的区间收益率分别达到85.86%、66.94%和265.01%，换算成年化收益率分别达到13.17%、7.59%和13.81%。

不过，截至11月25日，在全市场的普通股票型基金中，仅有16只成立时间超过十年，年化回报率均值13.7%。偏股混合型基金方面，共计326只成立时间超过十年，年化平均回报率为22.04%。

银河证券表示，尽管经历了2019年、2020年业绩大爆发后，2021年权益基金迎来了业绩小年，2022年上半年权益类各类型业绩更是出现不同幅度的回撤，但从权益类基金在过去三年、五年、十年的收益表现来看，公募基金依然是十分优秀的投资品种。“过去十年偏股型基金和标准股票型基金年化收益均超过了13%。践行长期价值投资理念，价值只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公募基金能帮投资者发大财吗？并不能。如果拉长投资时间，基民的年化收益能比GDP增速好一些，就已非常不错了。”上述公募基金资深人士表示，因此，业内常用“GDP+”来形容公募基金赚钱的底层逻辑。FOF就是靠大类资产配置实现一套组合拳来平滑此涨彼跌的波动，用专业的管理人代替个人挑选基金。

“监管比较鼓励各家公募做好5%—10%年化区间的产品供给。收益率约5%的产品，银行理财可以提供；超过20%的有股票型、偏股混合型基金。”一位公募基金FOF人士表示，投资者在考虑个人养老FOF时第一个想到的是税收优惠，但实际上，这种“长钱”属性应该更看重战胜通胀的收益水平。

另一位基金投顾人士在介绍养老投资理念时指出，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最需要的是七至十年的国债、国开债指数品种，在此基础上，用一年期的品种做好“削峰填谷”。但由于启动试点阶段只限投资目标养老基金，短期调仓的品种不够配置。

“正因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平稳落地的初期对产品均有一定封闭期要求，市场波动时的踩踏赎回风险还是比较小的，临近到期，基金管理人通常会做一些流动性安排。”上述公募FOF人士表示，只是投资者是否愿意让渡资金几十年的使用权来提早做一些养老储备，还是需要根据收入水平、闲钱规模来决定。

版面编辑：刘春辉

陈昌华专栏｜经济反弹看防疫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2年第47期 出版日期 2022年12月05日

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绝不奇怪，但反弹强度能有多大，防疫政策的走向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



2022年12月1日，广州海珠区敦和路，防疫人员。11月30日，海珠区发布通告，放松防控措施。随着中央政府发布优化防控二十条措施，最近一些地方的防疫措施有所调整，但纵使防疫政策走向宽松，也是缓慢、曲折和反复的。图：财新 梁莹菲

文丨陈昌华
Aletheia Capital中国策略分析师

又到展望明年经济时。2022年中国经济明显比预期差，疫情和房地产应是最主要的原因；国际上，俄乌冲突和能源价格急升，以及美国利率上升和随之而来的美元强势，也对中国经济造成一定负面影响。中国政府在年初定下5.5%的增长目标，随着疫情不断反复已不现实；10月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调低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到3.2%，为1977年后最低（除了2020年）。2023年又将如何？

在2022年的低基数上，2023年经济增长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绝不奇怪，但反弹的强度有多大则是一个疑问。防疫政策的走向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中央政府发布优化防控二十条措施，最近一些地方的防疫措施有所调整，但纵使防疫政策走向宽松，也是缓慢、曲折和反复的。究其原因，新冠变种病毒奥密克戎的传染性太强，因此2022年以前行之有效的防疫政策在新变种的环境下有所滞后，并使得财政和社会成本不能承受。另外，即便奥密克戎的毒性逐渐下降，也不能跟一般流感相提并论，特别是在疫苗接种率不够高的群体中。

过去一年，全球不少地方都出现过新冠大暴发，但中国在2020年武汉疫情后基本没有大暴发，因此在防疫政策放松后，中国的暴发程度可能更像东亚地区而非欧美。假定中国做得特别好，在放松后感染人数高峰只有总人口的0.1%，但这仍等于每天约140万宗病例，是现在全球每天30万染疫人数的4倍多。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如何调整宣传和缓解群众恐慌将是大挑战。此外，医疗资源和死亡人数是另一难题。要减少重病和死亡人数，更高的疫苗接种率（特别是老龄人口）和新冠药物的储备缺一不可。纵使这样，一个相当大的死亡人数也将不能避免。

因此，防疫政策放松还将是一个漫长而充满曲折的过程。在这种背景下，消费不宜看得太乐观。在2022年消费接近零增长的基数上，2023年消费或可实现4%或5%的增速，但实际增速取决于防疫政策，从负增长到双位数增长都有可能。

此外，房地产和出口也是2023年中国经济的两大不确定因素。在收入和就业预期变坏的环境下，加上结婚人数、城镇新增人口数量的下降，2023年房地产销售和投资持续负增长亦不足为奇。虽然最近的金融政策有支持房地产业的倾向，但更多是诸如“保交楼”等向房地产企业注入资金、避免引发大规模房地产危机的政策，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需求现状。

纵使中央政府这些年的经济工作重点是推动内循环，但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主要靠外需推动。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随着中国出口竞争对手逐步恢复生产，中国在主要市场的占有率已从2020年底的高点逐步下降。最近大半年中，若把中国出口总额增长中的量、价因素分开，可以发现中国出口增长基本靠价格上升拉动，出口量同比下降，而价格上升是全球通胀所致。2023年，全球通胀应有所回落，实际经济增长则应接近衰退边缘，中国的出口市场份额预计持续下跌。因此，中国2023年出口总额很可能低增长或负增长。

基建和部分工业投资在2023年的增长或会比较稳定，但能否成为拉动经济的“火车头”尚有疑问。纵使央行在年初已开始放松银根，但在2022年很长时间内，新增社融没有明显上升，主要是对前景不太乐观，导致居民和企业的

贷款需求不大。因此，即使部分进口替代和自主技术创新的投资或许不错，但工业和房地产投资在2023年不会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基建投资从政府态度和贷款供应的角度是比较正面的，但在防疫开支高压和财政收入不理想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对2023年中国经济的基本判断有两个：一、2023年经济增长应好于2022年，但增速达5.5%或6%很困难；二、防疫政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新冠肺炎防疫全纪录（实时更新中）

版面编辑：刘春辉

最新财新周刊｜室内氡超标争议背后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2年第47期 出版日期 2022年12月05日

30多年来中国室内氡浓度显著上升，这被认为与墙体材料革命和建筑节能推广有关



2022年夏，成都成华区中车共享城二期，业主自行拆除地面的自流平、地暖回填层以及二次墙体，并重新恢复，以降低室内氡浓度。图：受访者提供

文丨财新周刊 周泰来，吕嘉鑫 黄佳钰（实习）

2022年4月，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中车共享城”开发商通知二期业主收房。一位大学教授顺手用仪器测了一下他房子里的放射物浓度——让他意外的是，室内氡浓度大幅超标。

教授在业主群里把这个事情抖了出来，很多业主都自行委托检测机构去检测自己的房子，结果都是氡超标。“高的400多（Bq/m3），低的都有200多（Bq/m3）。”花300多万元买了一套100多平方米房子的业主王女士说。《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50325-2020）要求，民用建筑工程在竣工验收时，必须检测包括氡在内的污染物浓度，氡的浓度要小于150Bq/m3。Bq（贝可）是放射性活度单位，放射性元素每秒有一个原子发生衰变时，其放射性活度即为1贝可。

室内氡浓度主要源于建材。氡是一种放射性气体，它是导致肺癌的第二大环境因素，仅次于吸烟。人类接受氡暴露的主要途径是吸入氡的短寿命子体，这些子体衰变时产生的α射线可损伤肺和支气管上皮细胞，产生随机性效应最终导致肺癌。

关于中车共享城二期室内氡超标的孰是孰非，业主与开发商在各执一词的情况下已部分达成和解。这只是室内氡浓度问题的一个片段和缩影。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30多年里，中国室内氡浓度呈显著上升趋势。专家认为，这与两大因素有关：一是墙体材料的改革，从黏土砖到加气混凝土砌块的墙材带来了室内氡浓度的上升；二是建筑节能的推广，近年来大力提倡的建筑节能政策带来的通风换气率降低，是室内氡浓度上升的另一大原因。

氡浓度争议

业主和中车方面的一大争议焦点是建材是否合格。一些中车共享城业主在自行整改过程中，逐步锁定了造成氡超标的建材源头。自行整改首先是拆自流平地面，其成分是石膏。业主们发现虽然氡浓度有所下降，但依然还有100—200Bq/m3。于是又接着拆地暖回填层，回填层的成分是水泥砂浆。这两个部分拆除以后再测，部分房屋的氡浓度就直接达标了。剩余仍不达标的业主再拆屋里的灰渣板二次墙体。“拆除二次墙体后一般都能达标。”业主们由此认为，氡超标主要源自自流平地面、地暖回填层和灰渣板二次墙体。

王女士表示，拆除并恢复自流平和地暖回填层的花费在一两万元，如果拆除二次墙体的话，花费可能就要上10万元了。为此，业主们要求开发商中车科技园（成都）有限公司（下称“成都中车”）赔付相应费用，或者进行房屋整改，交付符合国家标准的房子。成都中车是中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中车科技园”）的子公司，后者是央企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王女士提供的成都市成华区住房建设和交通运输局2022年7月25日发给中车共享城二期业主信访回复称，针对业主反映的室内氡超标问题，区住建交局约谈了该项目相关责任主体单位，要求尽快核实情况，回应业主关切。目前，开发企业正在组织拆除和替换自流平相关工作。待施工完成后，将由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对室内氡浓度进行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

但中车科技园副总经理徐厚广对财新称，中车方面在业主监督下对室内建材原地取样了60多份，统一进行了放

射性检测，结果都是合格的，“而且是远远低于国家限值的”。他表示，按照《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建材的内照射指数要小于1，中车共享城的建材测出来大部分都是0.1，有个别的是0.2、0.3。

徐厚广认为，上述中车共享城的业主和第三方检测机构测得的氡浓度，是在新风系统尚未开启的条件下，在自然通风情况下测出来的初值。按照《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国家标准管理组2022年6月29日向成华区住建交局的复函，在自然通风情况下测出来的氡浓度值，如果超过150Bq/m3的限值，并不能判定氡超标，需对氡超标房间用“示踪气体测试法”测定房间通风换气次数，并换算出换气次数为0.5次/小时情形下的氡浓度。换算后室内氡浓度不超150Bq/m3的，采取通风换气措施加强通风，把氡浓度降下来后可判定氡符合标准要求。

徐厚广表示，中车共享城二期的住宅是按照绿色节能建筑的标准盖的，能耗低，所以气密性很好。“密闭测试过一些房间，通风换气率在0.1到0.3不等。”因此业主和第三方检测机构测得的氡浓度，并不能判定房子就是氡超标的，需要换算成0.5次/小时通风换气率下的值。

事实上，在后续处理中，成都中车方面认为中车共享城是“集中通风”建筑，而非“自然通风”建筑，因此必须在新风开启的条件下进行检测。徐厚广表示，其依据为中车科技园向住建部去函咨询和得到的答复。他提供的住建部2022年8月4日的回函答复称：关于集中通风民用建筑氡浓度检测，统一设计安装和提供新风系统，并作为工程配套一起销售或交付使用的民用建筑，竣工验收时，在设计工况状态下，按集中通风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50325）等标准规定的方法检测。新风量等设计工况指标应符合现行有关标准规定；未提供新风系统的民用建筑，竣工验收时，在设计工况状态下，按自然通风检测。

“住建部的解释应该是非常清晰的。”徐厚广表示，成都中车共享城二期是“统一设计安装和提供新风系统，并作为工程配套一起销售或交付使用的民用建筑”，所以应该按集中通风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50325）等标准规定的方法检测，即在新风系统开启的情况下进行检测。

徐厚广提供的检测报告显示，10月初成都中车曾委托国家建筑工程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对中车共享城两宗地共19栋楼的85户检测了室内氡浓度。检测方法为，客厅、卧室和书房采用集中通风状态进行检测，在室内氡浓度检测前门窗关闭24小时，封闭期间和检测期间集中通风系统处于高挡位正常运行，检测期间门窗保持关闭状态。检测结果显示，氡浓度全部合格，检测值都在几十Bq/m3的水平，有极少数的主卧和书房的氡浓度达到了104Bq/m3、106Bq/m3的水平，但也低于前述150Bq/m3的国家标准值。

但王女士对此有不同看法，她认为住建部的该答复仅仅是列举了集中通风和自然通风的两种检测要求，并未定性中车共享城是哪种性质的通风。“不能要求老百姓始终使用新风系统。”她说，新风开启后噪音比较大，影响晚上睡眠。其次开新风有能耗问题，一边开暖气或者空调，一边开新风把室内的空气置换出去，会导致能耗高、电费高。

一位知情人士也对财新表示，如果仅按照初测值，不换算通风换气次数的话，成都市面上很多新房子氡浓度都会超标，反而是比较老旧的房子不超标，“特别是新建的绿色建筑，因为密闭性太好了”。

目前，成都中车已和部分业主达成和解。业主提供的和解协议显示，房屋出卖人已委托国家建筑工程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再次对中车共享城二期住宅项目室内氡浓度进行抽检，抽检比例不低于房间总数的5%，检测结果认定项目合格，买受人认可检测方法和检测结果。但包括王女士在内的一些业主并未签订协议，目前正在走法律程序，将与成都中车对簿公堂。

室内氡浓度普升

成都中车共享城的氡超标争议，是中国室内氡浓度问题的一个缩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退休研究员尚兵介绍，中国组织的第一次全国室内氡水平调查，是由卫生系统在上世纪80年代完成的。调查结论为，中国室内氡浓度的平均值为24Bq/m3。“当时做完觉得没什么问题，咱们国家室内氡浓度很低”。

2002年—2004年在科技部社会公益基金支持下，尚兵组织了一次对中国26个城市室内氡污染的调查，结果发现中国室内氡浓度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明显升高，达到43.8Bq/m3。

这次调查结果也让辐射防护领域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潘自强十分意外，因为43.8Bq/m3的水平基本上在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上翻了1倍。“当时潘院士说要核对这个数据，我还专门给潘院士写了一个我们调查的具体设计。”尚兵回忆说。

2006年到2010年之间，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和住建系统的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也分别组织了室内氡浓度的调查。前者调查了浙江省和另外7个城市，均值为30.7Bq/m3，氡浓度超过100Bq/m3的房间有36间，约占总调查房间的1.8%；后者则调查了10个城市，均值为36.1Bq/m3，浓度超过100Bq/m3的有23户，占被调查总户数的3.3%。

虽然这两个调查的结果都低于尚兵的调查结果，但也都明显高于上世纪80年代的调查结果，确认了中国室内氡浓度的显著上升趋势。

十年之后的2020年底，以“环境氡污染监测、评价与防治技术”为主题的香山科学会议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据《科技日报》报道，尚兵在这次会议上介绍，继2005年中国26个地区室内氡浓度调查之后，2018年至2019 年，

她所在的研究所又陆续对深圳、广州、北京、长春、哈尔滨、海口等地开展了室内氡水平调查。阶段性调查结果显示，与2005年调查结果相比，6个城市室内氡水平均呈现出整体增高趋势。以深圳为例，论文《深圳市室内氡浓度水平调查与研究》介绍，1992年测得的深圳市室内氡浓度均值为26.8Bq/m3；1997年为33.7Bq/m3，2007年为47Bq/m3，2016年为64Bq/m3，2018—2019年为63Bq/m3。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于2009年出版的《WHO室内氡手册—公共卫生层视角》，估计全世界室内氡平均浓度为 39 Bq/m3，其中高的国家比如捷克为140Bq/m3，芬兰为120Bq/m3；低的国家如澳大利亚为11Bq/m3，日本为16Bq/m3。而美国的水平为46Bq/m3。《WHO室内氡手册》称，为了限制个人风险，建议设定国家氡浓度参考水平为100 Bq/m3。即使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实现，所选择的参考水平也不应超过300 Bq/m3。

需要严格控制室内氡浓度，是因为氡是紧随吸烟之后的第二大致肺癌环境因素。据中国疾控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2022年的一篇论文，假设中国室内氡浓度平均值为30Bq/m3，则中国约6.62%的肺癌死亡是由居室内氡暴露造成的——2015年中国肺癌死亡人数为84万人，由此估算由居室内氡暴露致肺癌死亡人数约5.5万人；若假设中国室内氡浓度水平为40Bq/m3，则约有8.82%的肺癌死亡可归因于居室内氡暴露。中国疾控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近年来组织开展的氡浓度监测数据初步结果，中国居室内氡浓度水平已经接近70Bq/m3，据此水平估计，约15.38%的肺癌死亡是由居室内氡暴露导致的。

另据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2022年的一篇论文，取当前中国公民接受室内氡暴露的平均浓度为40Bq/m3，初步试算结果表明，当前中国室内氡致肺癌的人群归因危险度可达6.39%以上，若以中国2020年的肺癌新发病例数82万估算，中国目前每年可能约有5万人因接受室内氡暴露而诱发肺癌。

尚兵表示，化学污染一般是有味道的，而氡污染无色无味，隐蔽性很强，因此需要提高重视程度。

此外，中国室内平均氡浓度持续上升，也意味着超标的房子越来越多。从区域来看，由于严寒和高寒地区的房屋墙体较厚，即建材用量增加，且实施节能技术以后房间更为封闭，室内氡就更加容易超标。南方如广州这些城市，由于建材原料的辐射水平较高，室内氡浓度在竣工验收检测中较高，但平时居民开窗通风较多，所以室内氡浓度水平并不高。据广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在201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氡活度浓度随建筑年代呈现增长趋势，且新建的多层、高层建筑氡活度浓度偏高，在日常的工程验收检测中发现超过200Bq/m3的房间比率在10%左右。而海南近年来室内氡浓度上升较快，可能与当地空调使用率提高、开窗通风减少相关。

复旦大学放射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卓维海对财新记者称，虽然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过几次室内氡浓度调查，但相较房屋总量，调查样本量还是偏少。目前亟须有关部门牵头开展足够样本数量的调查，以摸清中国目前的室内氡浓度水平。

新型墙材氡问题

多位专家对财新称，中国室内氡浓度水平上升，与两大因素有关：一是墙体材料改革；二是建筑节能的推广。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城市化进程提速，大部分中国居民从平房住进高层楼房，主流的建筑结构也从平房的砖混结构变成了高层楼房的框架结构。由于框架结构的墙体不承重，因此高层楼房的墙体可以选择各种轻质材料，而非传统的黏土砖。与此同时，传统黏土砖的生产对耕地破坏很大，国家大力推进墙体材料改革，淘汰黏土砖。

以加气混凝土砌块为代表的新型墙体材料由此得到大力推广。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教授王栋民对财新称，一方面加气混凝土砌块不使用黏土，以粉煤灰、矿渣等为原料，能够消纳固废，降低能耗；另一方面加气混凝土砌块比较轻，能浮在水上，保温、隔热、隔音等性能好。2017年，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联合印发《新型墙材推广应用行动方案》，要求到2020 年全国县级以上城市禁止使用实心黏土砖，地级城市及其规划区限制使用黏土制品，副省级以上城市及其规划区禁止生产和使用黏土制品；新型墙材产量在墙材总量中占比达80%，其中装配式墙板部品占比达20%；新建建筑中新型墙材应用比例达 90%。然而，包括水泥、混凝土、砖、砌块在内的建筑主体材料都含有放射性核素，是室内氡气的主要来源。从黏土砖到加气混凝土砌块的墙材革命，同时带来了室内氡浓度的上升。尚兵介绍，从原材料上，粉煤灰和黏土不一样，粉煤灰放射性核素含量高；其次，黏土砖的致密度很高，氡很难析出来，但轻型加气混凝土孔隙度高，氡就容易析出来。

墙材行业是消纳固体废弃物的大户。西安墙体材料研究设计院党委书记唐玉娇2022年1月在《中国建材报》撰文称，目前我国墙体材料行业年利用工业固废、建筑废弃物等各类废弃物已超1.35亿吨，节约能源3200万吨标煤。比如北京市2021年墙材生产过程综合利用固体废弃物57.8万吨，主要为建筑垃圾25.8万吨、水渣10.4万吨、粉煤灰10.1万吨。

以粉煤灰为例，粉煤灰是火电厂煤燃烧的烟气中捕集下来的微细飞灰，其主要组成是各类氧化物，包含二氧化硅、三氧化二铝等。发表于2019年的《贵州典型电厂粉煤灰的放射性安全评估》一文介绍，估计中国2010年—2015年年均产出5亿—6亿吨粉煤灰。粉煤灰综合利用率稳定在68%—69%，主要用于水泥、商业混凝土和墙体材料（砖）等建筑材料。煤中含有一定量的放射性元素，绝大部分会富集在粉煤灰中，粉煤灰中放射性元素相对原煤可富集3倍左右。

上述论文称，调研贵州不同区域的六家电厂后发现，黔北地区桐梓电厂和二郎电厂粉煤灰的内外照射指数均明显大于《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要求的1.0，需要明确限制掺杂比后方可作为建筑主体材料使用。目前贵州电

厂粉煤灰主要用于复合硅酸盐水泥生产。“黔北地区电厂粉煤灰的放射性水平较高，如果不加以监管进入民用建筑，可能导致较大的放射性安全隐患”。

发表于2006年的《新型墙材用工业废渣中天然放射性核素分布研究》介绍，新型墙体材料利用量比较大的粉煤灰、炉渣（矿渣）和煤矸石中，粉煤灰和炉渣的放射性核素含量较高，均有超过国家放射性核素限量的样品出现。因此粉煤灰和炉渣在掺入比例上要严格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建议掺入量不宜超过70%。同一电厂不同时间采集的粉煤灰的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也会有很大差异，最大值可达到最小值的2倍以上。因此新型墙材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应经常性地检测放射性水平。

但中国加气混凝土协会一位相关技术负责人对财新称，加气混凝土产品主要为加气混凝土砌块和板材，目前全国有几千家生产企业。加气混凝土产品并非纯粉煤灰制品，有些厂家掺一部分粉煤灰，粉煤灰用量占比50%—60%。据他了解，加气混凝土产品每年都要按照国家要求进行放射性方面的检测，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放射性超标，“有专家可能认为用到了粉煤灰原料，而粉煤灰可能有放射性，但实际检测情况是粉煤灰并不超标”。

新型墙材除了放射性核素含量较高，氡析出率也较高。2010年就有论文介绍，当时中国发现许多用符合《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6566-2001）标准的建筑材料所建造的房屋内氡浓度超标的例子。一些建筑材料，特别是一些新型建筑材料采用了发泡等技术，尽管建筑材料的放射性核素比活度相近，但氡析出率有很大差别。有专家指出，现行的建筑材料放射性控制标准不能达到有效控制居民辐射照射的目的，氡的析出率能够反映建筑材料的综合特性和较为全面的信息，有必要对掺渣建筑材料的氡析出率加以控制。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是工信系统的标准，2010年修订发布《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6566-2010）时，并未增加氡析出率控制指标。但住建系统于2010年修订发布的《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50325-2010）则增加了氡析出率的控制指标，要求民用建筑工程所使用的加气混凝土和空心率（孔洞率）大于25%的空心砖、空心砌块等建筑主体材料，其放射性限量应符合表面氡析出率小于等于0.015Bq/(m2×s)。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的主要起草人员、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原院长王喜元告诉财新，根据实验结果，空心材料不管是加气混凝土砌块还是空心砖，均比实心的材料“释放氡厉害”，所以把氡析出率加上去了。

“现行建材标准中氡的母体核素镭含量的控制指标仍滞留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水平，不适用于多孔材料和轻型加气混凝土。”尚兵建议收紧《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限值，将氡的母体核素镭的含量控制在更低水平。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技术物理系教授郭秋菊对财新称，如果要修订建材的核素标准，需要定量回答建材对室内氡浓度的贡献到底是多少。相关部门应该有一个科学方案主导的实际测量调查，以查明目前高层建筑建材其成分是什么样的、放射性核素含量怎么样、氡析出率怎么样、构不构成安全问题。

中国建材联合会副秘书长兼标准质量部主任周丽玮对财新称，目前《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正在修订。此次修订最主要的原因是该标准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的要求，要从条文强制修订成全文强制。她表示，此次修订也在做很多调研，“比如说住建部有氡的析出率，我们就要看析出率能不能加到标准里头。但目前争议很大，主要是测量方法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稳定成熟的测量方法，是不能纳入标准的”。

一些专家认为，对于工业废弃物用于建材，需要更加严格的标准和监管。全国人大代表、同济大学土木工程材料系教授张雄在2019年全国人大会议上建议，修订用于建筑材料的工业废弃物有害成分相关标准。张雄称，工业废弃物主要是各类尾矿和冶炼废渣，其主要资源化利用途径是制造墙体材料、水泥混合材、混凝土掺合料等。工业废弃物往往残存含有重金属或辐射性物质，这些有害组分一旦进入建材产品，将与人类日常近距离接触，长期对人的健康会有危害。中国对资源化利用的工业废弃物虽然在有害成分方面有控制规定，但控制项目不完善且标准要求偏低，资源化过程存在二次污染风险。

另一方面，由于工业废弃物资源化作为建材原材料时，往往是一次性鉴定其有害成分种类与数量，建材工厂进料时也没有每批监测有害成分，而工业废弃物有害成分波动很大。

张雄建议，修订和完善用于建筑材料的工业废弃物有害成分相关标准，制定工业废弃物资源化过程中无缝隙和可追溯的工业废弃物有害成分监控规范程序，防范综合利用工业废弃物制造的建材产品二次污染风险。

节能建筑也有弊端

多位专家对财新表示，近年来大力提倡的建筑节能带来的通风换气率降低，是室内氡浓度上升的另一大原因。“从我们实际处理的氡超标事件来看，很多地方就因为建筑节能做的通风换气率很低，氡积累导致超标”。

中国从1986年开始推广节能居住建筑。原建设部首先在北方集中供暖地区实施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要求采取增强建筑围护结构隔热保温性能和提高空调、供暖设备能效比的节能措施，在保证相同的室内热环境的前提下，与未采取节能措施前相比全年空调和供暖总能耗减少30%。1996年，采暖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进行修订，其目标节能率为50%。2010年以后，我国寒冷和严寒地区推出要求更高的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居住建筑执行65%的节能标准。

建筑节能的一大途径是提高门窗气密性等级。对自然通风建筑来说，建筑外门窗是室内通风换气的主要通道，

除了开关门窗，通风换气主要靠对外门窗的缝隙徐徐进行。通风换气率是在门窗关闭的条件下，每小时室内空气更换的次数。

王喜元等人所著《中国室内环境概况调查与研究》一书介绍，门窗的气密性是通风换气效果的重要指标。气密性等级越低，空气渗透量越大，通风换气效果越好。以一个50立方米、窗户面积为2平方米的房屋为例，气密性等级为1级时，其换气一次需要2小时，即通风换气率为0.5次/小时。每提高1级气密性等级，空气渗透量就减少，当窗户按照6级气密性窗计算时，换气一次需要5小时，通风换气率为0.2次/小时。也就是说，门窗气密性越高，室内外空气对流越小。

为了节能，现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和门窗应用技术规范对建筑外门窗的气密性都有具体规定。比如《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要求，严寒和寒冷地区外窗的气密性等级不应低于国家标准《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中规定的6级。

虽然《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2020）规定，夏热冬冷地区、严寒及寒冷地区等采用自然通风的一类民用建筑最小通风换气次数不应低于0.5次/小时，必要时应采取机械通风换气措施，但目前建筑的门窗气密性大体是按6级要求的，相当于只能满足通风换气率0.2次/小时要求。

“中国室内环境概况调查与污染防治研究”课题对 2015年—2016年5省市住宅（含个别办公室）130个自然通风房间进行的通风换气率现场实测表明，住房通风换气率在0.5次/小时及以上的房间数仅占比约30%。

通风换气率与氡浓度直接相关。发于2020年的《建筑节能设计对严寒和寒冷地区居室氡浓度和换气率的影响》论文介绍，2018年11月到2019年11月，研究团队在哈尔滨、佳木斯、沈阳、西宁、银川等5个城市的25户多层和高层住宅中测量了室内氡及其子体浓度与换气率，其中21户房屋的室内换气率均值为0.19次/小时，明显低于1980年代北京地区典型建筑物室内换气率测定结果0.5次/小时。

该研究结果表明，密闭门窗24小时测量氡及其子体浓度，这25户室内氡浓度均值为122Bq/m3，范围为33-255Bq/m3。其中9户房屋24小时均值超过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50325-2020）规定的限值150Bq/m3。

该研究还显示，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室内氡浓度是砖混结构房屋的1.7倍，而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的换气率仅为砖混结构房屋的60%。2010年以后城市新建住宅多为1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严寒和寒冷地区采用更严格的节能设计标准，建筑结构均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墙体材料绝大多数采用新型墙体材料加气混凝土砌块，密闭性增加、换气率降低，导致室内氡浓度明显高于2000年左右的砖混结构住宅。

“要正确地处理好建筑节能与室内环境的关系问题，两者处理得不平衡，过分强调建筑节能，忽视室内环境，这是不可持续的。”王喜元对财新称，人在不通风的房子里捂的时间长了就会出问题，“不要说氡了，就是二氧化碳都会中毒。”

尚兵认为，改变生活方式，养成开窗通风的习惯，是解决室内氡污染的成本低且非常有效的方法。她在哈尔滨的一个研究中看到，一户人家关闭门窗后，室内氡浓度非常高（超过700Bq/m3），她让这户人家夏天多开窗通风，在冬天每天定时开窗15到30分钟进行有意识的自然通风，该户人家室内的氡浓度就能达标了。有论文显示，开门窗情况下房间换气率平均为关门窗和关门窗开空调情况下的41 倍和35倍，氡浓度很快接近外部环境水平。

“我历来主张从源头控制，尽快把多孔建材中的镭含量控制到低于120到140Bq/kg的水平，室内年换气率在0.3次/小时，严寒地区冬天至少每天开窗换气一次，早上起来开窗15分钟—30分钟，就可以低于世卫组织限值。”尚兵说，“脱离健康一味强调节能，是不科学的教条主义。”另外中国地域广阔，有多种地质背景和气候条件，在制定控制标准上也需要细化，将节能环保与控制辐射污染结合起来。

版面编辑：刘春辉

回溯｜一周回溯（《财新周刊》2022年第47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2年第47期 出版日期 2022年12月05日

11月30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我们敬爱的江泽民同志患白血病合并多脏器功能衰竭，抢救无效，于2022年11月30日12时13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6岁”。

11月29日至12月1日，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12月1日，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访华。

11月27日、28日，中共中央人事任命公布，陕西省原省长赵一德接替刘国中，出任陕西省委书记；国资委原主任郝鹏接替张国清，出任辽宁省委书记。

11月25日，人社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发布通知，明确个人养老金制度在包括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在内的36个先行城市和地区启动实施。

11月29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加强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方案》，其中明确，加快提升80岁以上人群接种率，继续提高60—79岁人群接种率。

11月29日，中央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传达学习党中央近期决策部署，强调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1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于12月5日降低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25个百分点。此次降准为全面降准，共计释放长期资金约5000亿元。

11月29日，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航天员费俊龙、邓清明、张陆与神舟十四号乘组航天员首次进行在轨轮换，并在轨工作生活6个月。

11月28日，中国证监会决定在股权融资方面调整优化5项措施，包括恢复涉房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及配套融资、恢复上市房企和涉房上市公司再融资等。

11月29日，在联合国审计委员会第52次特别会议上，中国审计署审计长侯凯接任联合国审计委员会主席，就任时间自2023年1月1日起，任期2年。

11月28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mpox”为猴痘的新名称，以避免原名“monkeypox”可能造成的污名化。

11月26日，赤道几内亚国家选举委员会公布，现任总统奥比昂在11月20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赢得94.9%的选票，将连任总统，任期为7年。

11月26日，哈萨克斯坦当选总统就职典礼举行，托卡耶夫宣誓就任哈总统。在11月20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托卡耶夫以81.31%的得票率胜选。

11月26日，台湾地区基层公职人员“九合一”选举进行投票，在已选举产生的21个县市长中，中国国民党获13席，民进党获5席，民众党获1席，另有2席为无党籍。

11月26日，蔡英文宣布辞去民进党党主席职务，以示对该党在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中的表现负责。

11月28日起，新疆乌鲁木齐市逐步有序恢复公共交通和低风险区商超等场所运营；29日起，有序恢复低风险区快递物流企业经营，加快恢复社会面生产生活秩序。

11月24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吉祥苑小区一高层住宅楼发生火灾，致10人死亡、9人受伤。初步确定火灾原因为家庭卧室插线板着火引发。

11月27日，北京明确严禁采取硬质隔离、硬质围挡等措施封堵消防通道、单元门、小区门；30日起，北京对长期居家的老人等部分群体核酸免检。

11月29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通报，将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对于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等严重违法行为，坚决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1月25日，北京朝阳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吴亦凡强奸、聚众淫乱案，吴亦凡获刑13年，附加驱逐出境。北京市税务部门当日通报，吴亦凡偷逃税被追缴并罚款共计6亿元。

11月27日，广州多区公告，长期居家老人、每日网课学生、居家办公者等无社会面活动的人员，若无外出需求，可以不参加全员核酸筛查或核酸检测“应检尽检”。

11月30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劳荣枝故意杀人、抢劫、绑架上诉一案进行二审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原判，对劳荣枝的死刑裁定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11月26日，湖北省纪委监委网站消息，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原主教练李铁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监察调查。

版面编辑：刘春辉

前瞻｜美国佐治亚州参议员决选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2年第47期 出版日期 2022年12月05日

文丨财新周刊 侯吴婷

12月6日，美国佐治亚州联邦参议员竞选将进入第二轮，这是此次中期选举中参议院内胜负未定的最后一个议席。在此前第一轮选举中，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沃诺克（Raphael Warnock）以超过3.7万的选票优势领先共和党籍候选人沃克（Herschel Walker），但两人所得票数都未超过50%的当选门槛。

该参议员第二轮竞选的提前投票于11月26日开始，持续至12月2日。26日当天，数千名佐治亚州选民涌向投票站进行提前投票，一些人甚至在街区周围排队数个小时。根据佐治亚州政府数据，至少有7万选民参加了当天的提前投票。

这两位候选人人生历程大相径庭。民主党籍候选人沃诺克从一名牧师开始逐步声名鹊起，2021年1月，沃诺克在第二轮参议员选举中获胜，成为佐治亚州史上第一位黑人参议员。由于去年选举是为了填补已退休共和党参议员的剩余任期，因此沃诺克今年也必须参与中期选举，以谋求一个完整的六年任期。

而共和党籍的沃克此前为美式橄榄球运动员，此次得到特朗普背书而参加竞选。沃克的选战经常受到个人丑闻困扰，包括其进行家庭暴力的指控和曾向两位前女友施压要求她们堕胎。沃克选举中一直坚持其反对堕胎，支持在全美范围内禁止堕胎，在这方面与支持堕胎权的沃诺克立场截然相反。

据非营利组织AARP乐龄会佐治亚州（AARP Georgia）公布的民意调查数据，沃诺克以51%对47%的支持率领先沃克。若沃诺克赢得此次选举，拜登所在的民主党将获得51个席位，进一步扩大其在参议院的优势地位。

在自11月8日开始的中期选举中，参议院共有35个席位进行改选，包括14个民主党议席和21个共和党议席。美国参议院共有100个席位，议员任期六年，其中三分之一席位每两年进行改选。

事实上，在11月12日内华达州民主党籍参议员候选人马斯托击败其共和党籍对手后，民主党已经获得50个席位（包括两位与民主党抱团的独立派参议员），再加上民主党籍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兼任参议院院长，可在关键时刻投出打破僵局的一票，与目前拿下49个席位的共和党相比，民主党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参议院。

不过，美联社报道评价称，尽管民主党守住参议院的控制权，但2024年其将面临一场极具挑战的拉锯战。在下一次参议员选举中，民主党需要守住23个席位，而共和党只需10席，同时，改选参议员的州中包括诸多“深红州”，包括蒙大拿州和西弗吉尼亚州，以及日益右转的俄亥俄州。

在众议院，所有435个席位都在此次中期选举中进行改选。截至目前，共和党已赢得220个席位，超过成为多数党所需的218票，对获得213个众议院席位的民主党维持着个位数规模的微弱优势。

版面编辑：刘春辉

国风丨《阿凡达》续作能否救市？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2年第47期 出版日期 2022年12月05日



《阿凡达：水之道》电影海报。

文丨财新周刊 关聪

11月23日，美国20世纪影业公司通过官方微博宣布，《阿凡达：水之道》将在12月16日于中国内地院线上映。

《阿凡达：水之道》是2010年上映的《阿凡达》续集，讲述残疾军人杰克通过克隆技术，化身成为潘多拉星球上的纳威人，和公主娜塔莉结合并养育了两个孩子，而一场意外打破了平静的生活。电影阵容包括原班人马萨姆·沃辛顿、佐伊·索尔达娜、西格妮·韦弗。

近一个月没有具备票房号召力的商业大片，院线期待《阿凡达：水之道》提振市场。

国庆档结束之后，中国内地影院已近一个月没有具备票房号召力的商业大片激活票房，周票房连续四周徘徊在1亿元水平。直至11月18日，《名侦探柯南：万圣节的新娘》《坠落》等引进片投放市场，才带动周票房突破2亿元。

与此同时，进入秋冬季节，新冠疫情在数个省份反扑，在防控要求中，影院今年第二波大面积停业。11月21日，一张成都莱纳星影城售卖“午休套餐”的海报在社交媒体传播，影院利用电影院座椅供人午休“开源”求生，足见影院经营之难。

2020年新冠疫情后，海外电影市场同样遭受冲击，新片延期发行甚至放弃院线转投流媒体，进口片对国内整体票房贡献占比已连续下降两年。2020年—2021年，国产电影撑起市场，票房占比分别达到80.5%、84.5%。

截至11月23日，2022年全年的票房为282.75亿元，仅为2021年全年的60.11%。由于今年下半年体量最大的档期国庆档仅创收14.96亿元，同比大跌65.84%，行业已下调对全年票房增速预期。多名从业者曾向财新预计，在缺乏大片的情况下，11月、12月票房潜力有限，全年票房可能仅以300亿元收官。

若要追平2021年成绩，当前的电影市场至少需产出187亿元票房，《阿凡达：水之道》上映之日至年末仅有16天，其间没有节假日，明显无法靠单片达成这一量级。

《阿凡达》2009年末上映后，曾以27亿美元票房打破当时全球影史票房纪录，2010年1月登陆中国内地院线，成为国内首部票房突破10亿元的影片，首映分账票房累计13.39亿元。2021年3月，《阿凡达》在中国内地重映，在春节档后市场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再度拿到3.75亿元票房。

以数字影像为看点的科幻商业片向来烧钱，《阿凡达》投资体量就接近3亿美元。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此前亦称《阿凡达：水之道》投资不菲，市场关注在当前情况下能否收回投资。

在世界影史，3D电影《阿凡达》有着深远的技术和产业意义，2010年3月的第82届奥斯卡金像奖，《阿凡达》获得7项提名，最终夺得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和最佳视觉效果三个奖项。时至今日，应用在《阿凡达》中的虚拟拍摄和动态捕捉仍是电影市场努力攻关的工业化方向。

版面编辑：刘春辉

心智丨怎样花钱买快乐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2年第47期 出版日期 2022年12月05日



插画丨董必奇

文丨蓝玲
安人心智特约作者

临床心理学家发现，适度购物，有很大的心理和治疗价值。即使没有购物，只是在浏览商品，大脑都能感受到快乐。它是怎么起作用的？

让人快乐的方法很多，但多是有门槛的，并且不能迅速获得。而购物的快感，简单、随手可得，不管是线上线下、价钱高低，而且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进行，想要的东西一到手，即刻就有满足感。即使是网购，下单的那一刻起，你就充满期待了。所以，网购会让你体验到更大的兴奋，因为商品没到手，你就不知道它真正的样子，这种不确定性，让你紧张又期待。

心理治疗中有一种方法叫"可视化"，指利用想象力，引导我们创造出一些感官体验，或者完成某项任务、实现某个目标后的心理意象，它常用于心理演练或让患者放松。购物也是类似这样的可视化过程，它让我们想象到积极的结果，获得积极情绪。

购物的时候，大脑会处于很放松的状态。有些人就把它当成一种让大脑短暂休息的方式，在工作间歇，去购物网站随意浏览下商品，让精神减压放松，迅速提升工作状态。

所以你会发现，就算没有真正下单购买，单是浏览商品，就已经让我们感觉到快乐了。我们喜欢去寻找、发现、占有那些自己喜欢的物品。谁没做过这样的事呢？将一些商品加入购物车，又把它删除，再找新的，又删除，再继续寻找，如此反反复复，乐此不疲。

我们对物品的渴望，比对物品的需求更强烈。有心理学家认为，购物的冲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生存本能。狩猎采集时代，人类祖先生存的环境非常恶劣，食物匮乏，白天大部分时间，都要花在寻找、捕猎食物上，很可能辛苦了一天还一无所获，一整天饥肠辘辘，即使能获得食物，也很危险辛苦，不像现在随手可得。所以，他们一看到想要的东西，就得立即拿到手，就算现在用不到，也要囤积起来，要不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虽然现在物资不再匮乏，但这种心理机制依然发挥作用。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总会买一些根本用不到的东西，你的大脑告诉你，将来总会用到的。为什么商家一制造出稀缺感，我们会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下手，你的大脑告诉你，快快快，不抢这东西就没了。尤其是在碰到打折促销、清仓甩卖的时候，购物冲动立马就来，这波便宜不占，太吃亏了，以后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了。

你有没有想过，购物应当是让人不愉快的，虽然得到了商品，但失去了金钱啊，可我们为什么热衷于此？购物涉及复杂的大脑活动，有研究发现，人们在看到想要的商品时，大脑中的奖赏中枢就活跃了，这是购物冲动被引起了；但看到商品价格的时候，活跃起来的是大脑中负责高级决策的部位，这是购物冲动被抑制了。购物还与大脑中负责情绪调节，尤其是恐惧情绪的部位有关，人们看到的商品价格越高，它越活跃。而当人们要作出决定时，大脑中与负面情绪相关的部位就被激活了，如果决定放弃购买，这个部位就会更加活跃。

所以，在购物时，大脑会不断权衡，最终才决定是否要购买。购买，就意味着自己的钱会减少，商品价格越高，损失越大，反应就越大，购买行为可能就被抑制了。但如果真要放弃购买，心里也会不开心，因为渴望没有得到满足。

虽然购物让人快乐，但我们也知道，这种快乐很短暂，所要面对的问题、面临的压力，也不会因此消失。所

以，要适度、理性购物，不要让购物成为你处理焦虑、压力或负面情绪的首选方式，更不要超预算消费。尤其要注意强迫性购物行为，如果你总是有购物的念头，花过多时间在购物上，购物频率已超出自身的承受能力，经常会购买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并且关于购物的想法、冲动或购物行为本身，已经对你造成明显困扰，还导致了经济问题发生，那么，就需要警惕或询问医生了。

如果要让购物带来的快乐更持久，也是可以的，怎么做？有句话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有研究发现，在别人身上花钱占支出的比例越大，个人幸福感越高。但在自己身上花钱所占支出的比例，跟幸福感就没什么关系。怎么感觉有点傻呢？不是。把钱花在别人身上，可以加固我们的社会关系，让我们获得更持久的幸福，并能感受到自主感与成就感。

此外，与购买物质相比，购买体验，例如旅游、听音乐会、看展览等，能带来更多幸福。为什么？体验消费带来的快乐更持久，一件衣服可能只让你快乐3天，一次音乐会，3年后想起，你可能还回味无穷，这种体验可以变成你人生的一部分，但物质很难。并且，物质是可以用来比较的，很容易相形见绌，美好的体验却难以比较，也难以替代。

当你深陷痛苦时，花钱参加一些会让自己痛苦的活动，俗称“花钱买罪受”，例如，徒步旅游、高强度健身，也可以消除或缓解痛苦。很有趣是不是？花钱是要买快乐的，花钱买痛苦减轻痛苦，用魔法打败魔法？这是因为，痛苦能让我们感受到新生，经受痛苦的洗礼之后，人们会感觉身体和精神都变得更强悍了。而且，身体的疼痛，会让我们更关注肉体的感受，从而忘了心理的痛苦。不过，这样的活动请谨慎体验，要看自己的身体是否承受得住，安全为上。

更多精彩请阅读：【专题】心智

版面编辑：刘春辉

天眼｜下半旗志哀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2年第47期 出版日期 2022年12月05日

图丨财新周刊 丁刚

12月1日，北京天安门下半旗志哀。江泽民同志患白血病合并多脏器功能衰竭，抢救无效，于2022年11月30日12时13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6岁。为表达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对江泽民同志的无比崇敬和深切悼念之情，自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发布之日起到江泽民同志追悼大会举行之日止，北京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和香港中联办、澳门中联办、我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

版面编辑：刘春辉

回声（《财新周刊》2022年第46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2年第47期 出版日期 2022年12月05日

财新网友：预期就像绳子，能拉动但推不动，一旦看涨预期的共识打破，后续就比较难了。

《稳住房地产》

EvanFan：不光楼市，疫情防控跟经济的各个层面息息相关。

《稳住房地产》

Bohang：“法治”和“法制”的区别，老问题了。

《切莫狭隘理解反不正当竞争》

iceber：那么多领域的国企垄断，是否适用于反不正当竞争法？

《切莫狭隘理解反不正当竞争》

Kristin：国企改革要重于反垄断。

《切莫狭隘理解反不正当竞争》

财新网友：这么多年刚兑的影响太深了。个人如果不能接受风险的话，比起买理财产品，把钱存进银行吃利息是个更好的选择。

《债市赎回潮来袭》

版面编辑：刘春辉

读周刊看视频（《财新周刊》2022年第47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2年第47期 出版日期 2022年12月05日

特斯拉要拼成本优势和规模经济，冲击2030年产销2000万辆的目标——@《财新周刊》《马斯克拼规模》，相关视频：芒格：特斯拉确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

12月5日至17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的第二阶段会议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财新周刊》《COP15大会第二阶段移师蒙特利尔》，相关视频：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COP15·财新国际圆桌

2023年全球经济前景可能更加灰暗，中国经济增长亟须重回合理区间，如何调动各方积极性——@《财新周刊》《经济寻路后疫情时代》，相关视频：刘世锦：建议2023年经济增长目标不低于5%

金融奋力救市之后，中国房地产业怎样才能软着陆——@《财新周刊》《稳住房地产》，相关视频：跨越低迷：房地产的复苏周期与拐点

版面编辑：刘春辉

财新视听内容精选（《财新周刊》2022年第47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2年第47期 出版日期 2022年12月05日

【华尔街原声】

分析：欧盟提出的天然气价格上限过高/分析：美国铁路罢工风险将影响经济

【周五晚7点】

银企密集签约托底楼市；时隔七月 央行再降准

【财新云会场】 守护生物多样性： 科技的破解之力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如何？保护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国内各领域有哪些经验和做法

版面编辑：刘春辉

答疑（《财新周刊》2022年第47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2年第47期 出版日期 2022年12月05日

联系编辑部：邮箱newsroom@caixin.com或电话（010）8590 5000

北京读者 欧阳：

俄罗斯总计五艘22220型核动力破冰船中的第四艘“雅库特”近日下水，北极航道初具雏形，这将给中国带来哪些影响？

本刊产业新闻部：

北极航道主要包括东北航道、西北航道和穿极航道(中央航道)，其中，位于俄罗斯北部北冰洋离岸海域的东北航道发展潜力更大。相对传统贸易航线，该航道能把欧洲和东亚港口间的航线距离减少超过三分之一。咽喉要道地位可比拟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

欧洲船舶咨询机构Banchero Costa数据显示，2022年1月至10月，俄罗斯对中国大陆LNG出口量同比增长21.2%至440万吨，占其总出口量的16%，双方贸易量主要来源于亚马尔液化天然气（LNG）项目。

北极圈内的亚马尔LNG项目是中俄合作开发北极的起点，四条产线总年产能约1740万吨。

在北极航道东线可通航季节，亚马尔项目LNG直接运输到日本只需14天，到上海为18天。在其他月份，运输到亚洲的LNG将由破冰LNG船运到欧洲转运港，再转船到常规LNG船前往亚洲，如此一来，到上海需要32天。

2021年，北极航道通过货量约3500万吨，同比增长近6%。其中，三分之二的货量为LNG和原油，其余是干散货及其他杂货。在过去的十年中，北极航道通过货量增长了超过15倍。俄罗斯官方称，预计到2024年，北极航道货运量将达到8000万吨。

版面编辑：刘春辉

最新财新周刊｜2023年经济如何重回合理区间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2年第47期 出版日期 2022年12月05日

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如何？防疫措施优化的同时，赤字率多高才能满足稳增长的需要？在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新增专项债券限额规模如何设定？

文丨财新周刊 于海荣

临近年末，市场对下一年宏观政策的关注再度升温，尤其是在2022年前11个月新冠疫情拖累经济增速持续低于潜在增速、疫情防控持续优化的背景下，宏观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将如何力促2023年中国经济重回合理区间，成为讨论的焦点。

近期，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及学术委员会主任王一鸣等多位政策研究人士均表示，当前经济还未回到合理区间， 2020年—2022年三年平均增速低于现阶段中国潜在增长水平，这会导致中长期经济增长的机制性损伤，呼吁2023年应力促经济重回合理区间。

这与市场的呼声一致，但问题是，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是多少。目前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和高盛、瑞银、野村等多家国际机构对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集中在4%—4.5%之间，国内机构的预测则多集中在5%以上。

为使经济增长回到正常轨道或合理区间，刘世锦建议，2023年政府应提出不低于5%的增长目标，力争2022年—2023年两年平均增速达到5%左右。也有部分人士，比如汇丰银行大中华区前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认为，2023年将经济增长目标定在5%左右，有误导的风险。他称，年度经济增长目标不仅对地方政府有指导意义，也对市场主体预期有一定引导作用。在目前市场主体预期转弱的情况下，制定一个低于往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不利于稳预期和提振信心，2023年中国经济的合理增长区间应为6%—7%。

2023年中国经济的表现仍将与防疫政策密切相关。目前可观察到，虽然步调不同，但各地防疫政策优化已经在落实之中。市场普遍预期，2023年外需走弱，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边际下降，基建投资增速将高位回落，房地产投资可能筑底，但对经济增长仍有拖累，在此背景下，消费需求的恢复对经济增长尤为关键，而消费与防疫政策直接相关。

疫情防控政策优化之外，宏观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对能否拉动经济重回正轨也至关重要。2022年初的预算安排中，财政赤字率从2021年3.2%左右降至2.8%，疫情后首次低于3%，收支更多依靠使用结余结转资金和特定国有金融机构上缴近年结存利润来弥补，但在实际运行中，疫情频发多发及相关防控措施导致税收收入下降，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影响土地出让收入大幅短收，而支出端大规模核酸检测支出增加、各种刚性支出不减，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剧。

鉴于未来可动用的结余结转资金规模下降、土地市场短期内很难明显改善，研究者普遍建议，2023年财政赤字率要再度提高至3%以上，考虑到地方财政收支压力大，适当增加中央债务规模，缩减地方债务规模。在地方债中，增加一般债务占比。这些优化债务结构的建议，研究者已经提出多年，但在往年的实践中，并未能成为现实。在2023年经济亟须重回正轨、地方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这些学界已有共识的思路能否落地，值得关注。

合理增长区间是多少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目标设定为5.5%左右，但3月开始疫情在部分地区暴发，防疫措施收紧，供应链受到冲击，对经济增长造成较大影响。

2022年前三季度，中国GDP累计同比增长3%，就在部分市场机构乐观地预计四季度经济较快反弹、将带动全年增速达到甚至超过3.5%之际，11月以来疫情范围再次扩大，经济活动再度明显放缓，市场情绪回调。目前市场机构普遍预计四季度经济增速仍然低迷，很难在三季度3.9%的基础上加速，部分机构的预测已经低于3%。王一鸣坦言，目前形势下2022年经济增速要达到3.5%“还需努力”。

在这种情况下，力促经济重回合理区间已经成为共识。不过，2023年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在防控形势趋缓之后，房地产能否企稳、外需放缓程度和政策对冲力度，都是关键因素。

目前IMF对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为4.4%，IMF和高盛、瑞银等机构的预测为4.5%，野村的预测偏低，只有4%。不同机构在具体预测上可能有一定差异，但预测的基本逻辑大致相同。

瑞银预测的基准情景是2023年3月全国两会后防疫形势大幅好转，全球经济增长因激进的货币政策紧缩和持续的能源冲击而放缓。在此情景下，预计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回升至4.5%，2024年继续回升至4.8%，接近潜在增速水平。其中，房地产活动将逐渐低位企稳，对GDP增长的拖累明显低于2022年，因此基建投资稳增长的需求降低；出口增长将明显放缓。

“消费复苏是增长反弹的关键因素，其力度取决于防疫形势变化。”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称，防疫形势是影响经济复苏的关键因素，如果防疫形势在2024年之前都未明显好转，则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走弱至2%，2024年反弹至5.8%；但如果防疫形势发生了好转，则这一反弹将提前到来。

高盛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闪辉也认为，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加速将主要来自消费的修复反弹。高盛当时预计，中国有60%的概率在2023年二季度开放，即在新增病例增加的情况下也不采取封控措施，有30%的概率在2023年二季度前开放，有10%的概率在2023年二季度后开放。

不过，全面放开也并不意味着经济快速反弹。根据高盛对其他文化相近、先前疫情防控政策也较严的东亚经济体的梳理，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在2020年、2021年防疫政策加码后人员流动减少；在奥密克戎出现后，政策几无限制，但人员流动仍明显减少。

闪辉解释称，刚刚放开时，大家可能会因为不想被感染或周围感染的人非常多而自觉减少流动，私人部门消费下降，但是在放开后的第二个季度消费出现明显反弹。因此，2023年上半年包括二季度，中国经济还会比较弱，此时政策可能还需继续发力，但到下半年，若消费明显复苏，政策也会相应退出。

中金则基于疫情对经济影响程度的不同，对2023年经济走势作出两种情景的预测。一种是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逐步减弱，经济内生动能显著复苏的可能性偏低，前期积累的储蓄难以大幅转化为需求，全年GDP增速在5.2%左右；另一种情景是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显著下降，经济内生复苏动力比较强，企业和家庭观望情绪可能大幅减退，投资和消费都会有比较明显的反弹，预计2023年GDP增速或提升至6.7%。

在增长目标的确定过程中，除了当年的实际情况，还会考虑与往年及中长期目标的衔接。2021年在基数较低的情况下，增长目标仅设定为6%以上，远低于8.1%的实际增速，其中一个原因是考虑了与今后目标平稳衔接；而2022年5.5%左右的增长目标处于市场预测区间的上限，则主要考虑稳就业保民生防风险的需要，并同近两年平均经济增速以及“十四五”规划目标要求相衔接。



注：2008年至2016年为实际赤字率，2017年至2022年为预算赤字率
资料来源：全国财政预算、决算报告

二十大报告重申2035年远景目标，这一目标实际上蕴含了中期增长底线，即年均经济增速达到4.73%。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0年—2021年两年平均增速为5.1%，王一鸣称，2022年增速若达到3.5%，三年平均增速也只有4.6%。也就是说，目前经济增速已低于中期增速的底线。

刘世锦建议，2023年政府应提出不低于5%的增长目标，他同时称，考虑到2022年基数低，如果2023年上半年能够大部或全面摆脱疫情冲击影响，各项稳增长措施落实到位，尤其是改革开放加大力度，稳预期稳信心见到成效，实际增速还可能更高一些，应力争2022年—2023年两年平均增速达到5%左右。

也有部分研究人士认为5%左右的增长目标偏低。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斌测算称，如果2023年设定5.5%的增速目标，仅意味着产出缺口不再进一步放大，但仍会存在产出缺口。要实现2035年目标，对应的增速应该是6.4%。要想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对应的经济增速应该是6.8%。“2023年增长目标至少在工作层面仍要朝着6%以上努力。”

“2023年中国经济的合理增长区间应为6%—7%。”屈宏斌也表示，2022年经济增长受疫情冲击远低于正常水平，如果将2023年经济增长目标定在5%左右，扣除低基数效应后的真实经济增长仅为3%左右，连续两年的超低增

长可能会导致难以承受的就业压力。6%—7%的增长区间则意味着在低基数上经济明显恢复，两年平均增速有望达到5%左右，和2020年—2021年两年平均增速持平，剔除基数效应后的真实经济增长稳住了，有助于稳市场主体预期和保就业。

赤字率或再超3%

在疫情防控政策之外，宏观政策是影响2023年中国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在政策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已经降至历史较低水平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空间缩小，市场寄望财政政策承担更多逆周期调控的责任。

2020年疫情暴发后，连续两年中国财政赤字率都超过了3%，分别达到3.6%和3.2%，2022年是本届政府最后一年，出于种种考虑，年初预算报告中安排的赤字率降至2.8%，赤字规模也较2021年减少2000亿元，中央赤字和地方赤字即地方一般债券各减少1000亿元，分别为2.65万亿元和7200亿元。

不过，中国公布的赤字率并不是当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简单相减即可得出，还需要考虑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结余结转资金的调入调出。赤字的计算公式为：赤字=支出总量（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补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收入总量（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全国财政使用结转结余及调入资金）。

除了赤字，2022年新增的大规模存量留抵退税和各类支出资金，还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保障：一是跨年度的财政资金调节，尤其是2021年预算执行完成度低，有较多存量资金可供调度，各类资金合计约为1.4万亿元；二是央行等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上缴结存利润，规模为1.65万亿元。相应筹集的资金虽然未纳入赤字口径，但实际弥补了财政收支缺口。

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由于存量留抵退税范围扩大，加之疫情影响企业经营，税收短收，2022年1月—10月税收收入14.26万亿元，较全年目标相差3.75万亿元，各地不得不通过多渠道盘活闲置资产等方式获得非税收入来弥补缺口，前十个月非税收入同比增长23.2%，而同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4.5%。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郭磊测算称，2022年非税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已是过去十年以来最高。

受影响更大的是政府性基金预算。受土地出让市场严重下滑的影响，1月—10月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5.22万亿元，同比下降22.7%，而年初预算目标是增长0.6%。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汪德华预计，2022年全年土地出让收入与年初目标相差3万亿元左右。这与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年初的估算基本一致。由于市县政府普遍从政府性基金调入资金到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收入短收较多，部分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也可能受到影响。

虽然2023年存量留抵退税对财政收入的拖累基本消除，但考虑到经济增长仍存在不确定性、可以动用的结余结转资金和特定机构上缴结存利润规模下降、土地出让收入难见大起色，市场机构普遍预计2023年财政赤字率将再度升至3%以上。

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估算称，考虑到存量留抵税额剩余规模已经不多，且当前未出台更多减税退税举措，预计2023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收入大概率企稳，带动税收收入边际修复，可能多增超万亿元，但结转结余、利润上缴等资金或减少近3万亿元，收入端补充有限，而稳增长支出压力依然较大。

渣打银行大中华及北亚首席经济学家丁爽认为，2023年财政政策要适度宽松。考虑到地方政府的财力已经明显削弱，应将赤字负担更多交给中央政府，而非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率可以设在略高于3%的水平，新增地方专项债限额不超过2022年，使得包含地方专项债在内的整体赤字率从2022年的7.3%下调至6%左右，避免造成“财政悬崖”。

汪涛也预计2023年官方公布的财政赤字率将小幅提高至3%，现收现付制的实际财政赤字率可能提高0.2个百分点至5.3%。她测算称，包括政府预算赤字、土地出让净收入以及用于基建的准财政融资在内的增广财政赤字率，2022年提高3个百分点以上，2023年将提高0.5个百分点，2024年或将收缩。

“虽然2023年财政扩张规模低于2022年，但其乘数效应或超过2022年。”汪涛认为， 2022年增广财政赤字率的扩张主要来自政府收入相对预算的缺口较大，占GDP的2%以上，经周期性调整后的财政脉冲较为疲弱，而且2022年财政支持主要是减免和延缴税费的形式，其乘数效应较低。她预计，2023年财政收入稳步回升、减税降费规模缩小，在乘数效应提高的推动下，增广财政赤字率的小幅扩张仍可以为财政支出提供稳健支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冯俏彬撰文称，从体制层面看，当前中国提高税收的可能性不大，要在税收收入有限的情况下保持财政支出强度，就只能多在统筹存量上做文章，如国有资产经营红利上缴比例、盘活存量、加强国有资产收益管理等。同时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好重点支出，发挥好“自动稳定器”的作用，用好用足中国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体系，解决好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问题。

新增专项债限额调增还是缩减

近年来研究界一直呼吁优化政府债务结构，既包括在新增债务中，适当增加中央债务规模、缩减地方债务规模，也包括在地方债中适当增加一般债务规模、缩减专项债务规模。但这些建议并未被采纳，近年地方债务规模扩大主要依靠专项债券，一般债券占比持续下降。2023年这种状况是否会改变？

目前市场对2023年新增专项债券限额的预测存在较大分歧，既有主张缩减规模的，也有建议规模持平的，还有预测规模将继续扩大的。

中信证券联席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认为，2023年稳经济的挑战不能轻视，从财政预算的角度需要打足提前量。他预计，2023年预算赤字率和新增专项债额度均会有所突破，赤字率或由2.8%上调至3%以上，新增专项债额度或由3.65万亿元上调至4万亿元以上，释放更多的预算内空间，缓解地方财政收支压力。

扩大专项债规模，固然可以增加地方可用财力，但是从近年来的实际情况看，制约专项债稳增长作用的主要因素并非规模不足，而是很难足量合规落地。近年来在地方债严监管态势下，严格合规的、有一定收益回报的专项债项目偏少，导致"钱等项目"、债券资金闲置等现象，这在各地审计报告中多有体现，也得到地方财政人士的认同。

近期备受关注的方舱专项债即是例证。财新翻阅山东部分区县方舱医院专项债券项目实施方案发现，在项目预期收益的核算上并不严谨，也很难成真。比如山东烟台市海阳市方舱隔离点项目，预计2022年往后五年内为疫情期，收入包括场地租赁收入、停车收入、配餐收入；济南市方舱医院项目则预计未来两年疫情缓解，2024年疫情缓解后，方舱隔离点可用于对外租赁使用，租赁标准为每床位230元/天，远高于疫情期间150元/天的隔离床位费收入。有长期关注地方投融资的人士称，这种测算更像是根据收益自平衡的要求倒推出来的。

汪德华提醒，按现行规定，专项债所投项目需要实现自我资金平衡，地方政府一般要将项目连带产生的土地出让收入计入才能做到。而考虑到土地市场的长期下滑趋势，土地出让收入可能会影响到专项债的正常运转，需要尽快完善专项债等财政政策工具。

"2022年在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基础上，追加使用5000多亿元专项债结存限额，推动全年地方政府债务率接近警戒线，或超120%。"赵伟也表示，疫情之后，地方债务加快积累、付息压力加大等，或抑制地方债扩张空间。土地财政低迷也加剧专项债付息压力，考虑到专项债投向的公益性项目前期收益较低，2023年地方专项债务加码付息压力将进一步加大，专项债规模可能面临收缩。

过去三年，专项债规模增加超过10万亿元。财新根据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息公开平台数据计算，2022年1月—9月，地方专项债券付息额为4790亿元，已超过2021年全年的4738亿元，同比增长26.9%。

"最大的风险点在于，在土地收入下降的同时，地方政府承担着巨大的债务还本付息压力。"冯俏彬担心，一旦某个点、某个环节上出现漏洞，可能导致地方政府想方设法、动用所有能用的资源还债，甚至不排除个别地方政府可能用一般公共预算去填专项债的窟窿，这就蕴藏着巨大的风险。

她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出台制度，在专项债和一般公共预算之间建立"防火墙"，对一般公共预算用于偿债的比例和范围作出严格规定，预先防范土地收入下降对财政正常运行产生过大冲击。

"从2023年专项债的使用情况可以看出，专项债使用效果不及预期。"冯俏彬认为，这与中国经济转型的关系密切。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以后，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空间大大缩小，以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为主线的新基建投资在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更需要为社会投资、民间投资创造空间。从财政政策的角度看，政府投资仍要继续，但一要坚持财政投资的基本特性，突出基础性和公共性；二要牢牢地抓住数字经济、绿色发展这两个方向，突出重点；三要想方设法带动民间投资和社会投资。"应该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推动财政在投资方向、主体、协同性方面做好协调。"

2022年除了专项债，稳基建的任务还落在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上。在部分研究者看来，这一工具的推出，一定程度上为专项债缩减规模提供了可能。

国家发改委11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7399亿元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资金已全部投放完毕。在此前后，11月8日至25日，国家发改委投资司三次开会，要求工作重心从提高审批效率、加快资金投放，尽快转向强化要素保障、做好配套融资、加快推动项目开工建设上，督促地方实现11月30日前项目全部开工的目标，尽快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

明明表示， 2022年政策增量很大一部分体现在政策性银行上。在年初新增贷款额度的基础上，三家政策性银行追加了8000亿元信贷额度，加上政策性金融工具，对宏观经济的增量刺激规模或将达到2.7万亿元。

他认为，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使用更为灵活，配套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在基建和制造业领域对预算内财政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补充，预计2023年这一工具继续追加额度的可能性较大。

不过，据财新了解，制约这一工具效果的仍然是有效需求不足，目前商业银行只给一小部分项目做了授信，实际放贷规模更少。要充分发挥政策工具的效果，还需要激活有效需求，提振投资信心。▫

版面编辑：刘春辉

沈联涛专栏｜FTX破产的教训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2年第47期 出版日期 2022年12月05日

监管机构将加强对加密货币交易所的监管，但很难阻止下一个丑闻，永远不要投资那些看起来好得不真实的东西

文丨沈联涛
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所杰出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

11月中旬，全球第三大加密货币交易所FTX骤然宣布破产，震动了加密货币世界。该交易所约有100万交易者，交易一系列加密货币，日交易额约100亿美元，占全球加密货币交易总量约10%。虽然它没有像2008年雷曼倒闭那样震动主流金融体系，但这场崩溃也引致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呼吁，加强对加密货币交易以及交易所的监管。

FTX由山姆·班克曼-弗里德（Sam Bankman-Fried）在2019年创立。同年，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的创始人赵长鹏以1亿美元购买FTX 20%的股份，彼时FTX的估值在10亿美元左右。2021年7月，FTX从软银、红杉资本等知名投资机构处募集9亿美元，估值达到180亿美元。2022年1月，4亿美元的C轮融资让FTX估值升至320亿美元，但不到10个月后就申请破产。问题出在哪里？

11月12日FTX宣布破产当天，班克曼-弗里德同时宣布辞去CEO职务，由约翰·雷三世接任。这位曾担任安然公司清算人的新CEO 11月17日公开就FTX及其附属公司的会计记录表示："从未见过管控如此彻底失败的企业，也从未见过这样完全缺乏可信度的财务信息。"

由于调查仍在继续，甚至牵涉国会质询，一些情况尚不完全清楚，但许多在受监管的交易所中不会出现的与利益冲突和消费者保护相关的治理问题都出现了。这些问题曾出现警报，但都被忽视了。

首先，无论从交易量、客户数量，还是估值来看，FTX的崛起都异常迅速。创始人擅长公关宣传，FTX赞助了多项竞技赛事，如NBA球队迈阿密热火队的主场冠名为FTX体育馆，还曾赞助过梅赛德斯-AMG-Petronas F1车队。班克曼-弗里德还是美国政治的重要捐赠者。

11月2日，专门报道虚拟货币及技术的媒体CoinDesk曝出班克曼-弗里德创办的另一家公司——专注于加密货币量化交易的Alameda Research，持有FTX发行的代币FTT总流通量的70%，这些与FTT相关资产占这家公司净资产的88%。这引发市场对FTT的抛售。这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些资产是否真的有流动性，定价是否受益于关联交易。

一家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取决于公司净收入增加、借款或资本注入带来的现金流，以及所持有资产价格的上涨。2009年麦道夫庞氏骗局的运作基础是，用新投资者的现金向老投资者支付回报。加密货币骗局曾被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称为"分散式庞氏骗局"。

在受监管的证券交易所中，如果存在操纵标的价格的关联交易，这种交易将被视为犯罪。通常情况下，操纵交易停止的那一刻，标的价格就会暴跌，投资者逃离、提取现金，整个系统运作也随之停止。

CoinDesk的文章引发了投资者的逃离，他们担心相关公司没有现金。关于FTX资产负债真实状况的信息仍然有限，但目前的信息显示其资产可能在10亿美元左右，而负债可能高达90亿美元到500亿美元，涉及10万多个债权人。除了大型机构投资者，许多散户投资者也会遭受损失。监管者担心公众失去信心。

加密资产会因为FTX破产而前途黯淡吗？答案是"是"。加密资产估值膨胀很大程度上缘于货币宽松带来资产价格通胀，新奇金融产品的估值因此脱离现实。当美联储等全球央行加息收紧流动性时，各个市场的资产泡沫就开始破裂。

监管机构无疑将加强对加密货币交易所的监管，特别是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确保这些资产得到适当隔离，不会被滥用。这会阻止下一个丑闻吗？很可能不会，监管者每建一堵50英尺的墙，就会有人造出一架51英尺的梯子。

FTX、麦道夫等丑闻给投资者的真正教训是，永远不要投资那些看起来好得不真实的东西。如果投资者不明白投资的是什么，最终就会受骗上当。只有深陷其中，人们才会正视现实。投资请睁大眼睛。

版面编辑：刘春辉

随笔｜我的房子我做主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2年第47期 出版日期 2022年12月05日

在光头女的带领下，一场游说签名运动在今年夏天展开。最后，郡政府公布了居民投票结果：52.5%反对，45%赞成。郡监督长在公听会上无奈宣布：撤回将我们社区设置为“历史区域”的计划



赖特设计的流水别墅是建筑融入自然环境的典范。

文丨坚妮
作家

我正在加州开会，收到一封只有链接的邮件，打开一看标题——郡监督长在社区会议上宣布将撤回设置“历史区域”（Historic Overlay District，HOD）的建议。我轻喊一声“我们赢了！”环顾四周，没人知道我为啥高兴。

三天拿下心仪房子

儿子到西部读大学后，我就想卖掉住了多年的学区房。一是为了在资产增值税免税封顶的区间内套现，二是不想再维护这间高地税、高能耗的大屋。卖房必先买房，拖拖拉拉前后看了三年，不是嫌性价比不合理，就是环境不合意。

正意兴阑珊准备放弃之时，接到熟悉我喜好的房屋经纪打来的电话，说有个房子符合我的要求。她劝我去看一看，只是时间有点紧，下周就截止接受标的，只有三天时间准备。

我一直以为，华盛顿首都附近较好的社区已经全被富豪占据，房价都近千万。没想到，离我住地只有两英里，竟然藏了这么一个树木参天、幽静低调的社区，几百栋房子半掩半露点缀在树林缓坡中。林中的小房子，原木高屋顶，四面大玻璃窗，石下泉水汩汩，窗外参天大树下高高低低的各种灌木，将邻居远远的屋顶分隔成不同景色。四周虽空幽寂静，但没有藏在森林深处独居的恐惧。门前青石板地上一只橘色猫，在虎视高枝上一只火红色的红衣主教鸟。我对经纪说，就是它了，我要下定。

我在美加两国居住几十年，前后搬过十几次家，其中购置房产九次，五次是自己住，四次或为投资，或为安排父母。我经手过的这些房产，有独立屋，也有公寓；有学区房，也有山居；有的通过经纪，有的直接跟屋主交易；每一间从搬入到搬出，都要重新装修改造，期间还担任过业主委员会的财务。久经锻炼的我，可以算得上半个置产专家。所以这次尽管只有三天时间做房屋检查报告、准备银行贷款和下标书，我志在必得，最终在与八个买家的竞标中，成功拿下这间我理想中的房子。

看到这里，别以为我是个爱折腾的人，这全是因为美国税局有个贷款利息免税政策。为了每年拿回被政府扣掉的所得税，无论身处何地，都要买房，尤其是华人，不愿意让山姆大叔占了便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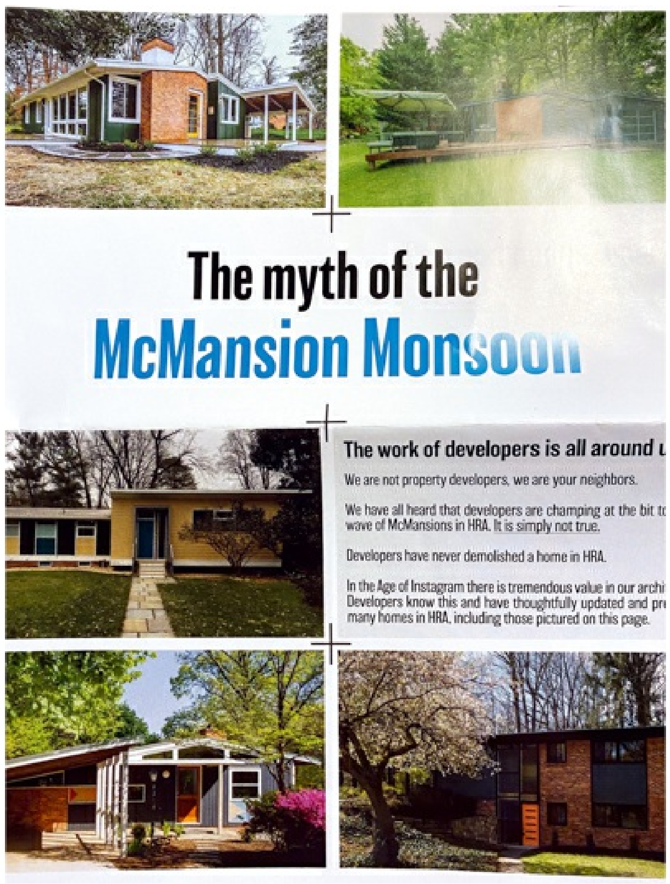
这个社区1951年到1958年之间建成，由两个年轻的建筑师设计，一个来自哈佛，一个来自耶鲁。他们崇尚世纪建筑大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赖特的代表作流水别墅，便是依山建于潺潺流水之上，树木掩映，楼层高低错落。这种将建筑融入自然环境的理念，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就是“道法自然”。这个社区正是赖特风格——道路弯弯曲曲随坡势而走，房屋不超过两层，而且尽量将下层顺坡势而建，以避免让房屋在自然环境中喧宾夺主；使用的木石建材和门窗颜色，也都以融入环境为原则而设计。

社区入口的牌子上，有“历史区域”字样。我曾为华盛顿市政府的房屋历史维护委员会当过两年翻译，参加过开发商在唐人街建房的听证会，知道凡是被认定为“历史区域”的房屋，装修或改造都要经过很繁琐的政府规划批准。

可是经纪告诉我，这个字样是社区人士自己的“冠冕”。查看了郡的房屋记录，果真如此，于是放下心来。

房子到手，花了半年将浴室和地板翻新，跟新冠疫情进入北美同一个时间住了进来。

春去夏来冬至，疫情不去，我每每庆幸自己好运。如果住在原来的社区，大屋密集，左邻右舍难免要碰撞交际，哪有这么好的隔离与健步环境？而且邻居养的两只猫——李特别和司马忌（见前篇《人猫不了情》），跟我结为密友，每日往来，常有新招，平添无数乐趣。



反对将社区划定为“历史区域”一派的宣传材料。

当初决定买这房，也是看中车库的朝向从早到晚都采光，准备改造成一个画室。找了五六个承包商报价，连图纸都花钱请设计师做了，到最后一分钟，却只是拆了个阳台，加了个停车位；因为住下来之后，喜欢上了车库打开与前院相连的空间，可以练太极拳剑。寻思画室可以盖在车库上面。无奈疫情带来供应链断接，通货膨胀，承包商们突然都拽了起来，没有一个再回电话。反正我不急，就等供应链恢复，通胀过去再说吧。

邻居游说反对“历史区域”

这时，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

一天傍晚，邻居来敲门，说是拉人签名，反对郡规划委将我们的社区定为“历史区域”。我事前看到过社区小报上介绍，建立历史区域是为了保护这里的自然风貌，阻止改建豪宅。因为我们这个社区离华盛顿市区不过10英里，周围社区都被大屋豪宅逐渐蚕食，像我们这种一户一两英亩的地块，完全可以建造成三四层高、面积七八千尺的豪宅。

我对大豪宅没有兴趣，所以便对来人直说，我没有改建豪宅的愿望，不反对将社区定为“历史区域”。

这位邻居没有因为我的表态而放弃游说，说她当初和我一样也不反对，而且是牵头人之一，但此一时彼一时。我有点好奇，她的反转怎么回事？于是邀请她进门，反正我跟猫咪李特别坐在纱屋里享受傍晚的凉风，多一个伴，听听社区新闻也未尝不可。

这位头发剃得像尼姑一样的邻居住在社区大操场公园旁边，我每天散步经过她门口，有时看见她带着大狗出来散步，隔着马路跟她点个头而已。她开门见山，说她跟我的紧邻是对立派。这位紧邻不仅是李特别和司马忌的家主婆，也是个厉害角色。为了两只猫友，我要万万小心不可得罪猫妈。赶紧叮嘱她说话别太大声，我纱屋后面的灌木丛外就是邻居家的前院，虽然隔着几十尺，风可以把声音刮过去。我可不想让猫妈知道我跟她的对立面“私通”。

光头女会意地一笑，说我懂了。我不知道她懂了什么，反正立即加了一道防线，提醒自己谨慎开口。这种民间自发管理公共事务的事情，往往是邻里之间关系的导火索。我以前参加过公寓大楼的居民管委会，发现这种义务志愿组成的公民组织，除非有知识有理智的务实业主占多数，否则管理公司就会利用那些头脑不太清醒又很在乎自己观点的业主，做出有利于管理公司加价和控制大楼事务的决定，而参与公共事务的业主之间有时会因此生隙。业主管理委员会是国家政治的缩写版，管理公司就是政客，业主里容易被忽悠的人越多，管理公司越容易控制业主的钱包。

光头女口齿清楚，条理明晰。原来她跟猫妈都是社区公民协会起头要建立历史区域的一群人。一年多以前，他

们去郡政府要求修改规划，对本区的房屋翻修限高限大。但是，经过一年多跟郡县政府的规划发展部合作，一本指南出台，她才发现上当受骗。所以现在出来力挽狂澜，要游说居民拒绝接受这个决定。

她的叙述涉及内容繁多，我一时无法消化，就问了一些问题，试探她究竟是客观冷静理性，还是个人恩怨占上风。因为我的邻居猫妈是建筑设计师，很懂得跟政府规划部门打交道。她也向我出示过一份政府文件，要我砍掉我院子里面的竹子，暗示如果我的竹子长到她的院子，政府会来罚我款。难道她也会上当？光头女情商不低，没有正面回答关于猫妈的问题。她说会把社区公民协会跟政府人员几次讨论的录像和那份118页的指南传给我，让我自己研究。



按照“历史区域”指南里的说法，社区内有50多间经过改造的房子被划为“无代表性”，认为它们脱离原型，失去历史特征。



我实地查看，发现除了两三栋属于豪宅型大屋，其余既融入环境，又给社区增加了美感。

最后，我看着她手上的签名本说，如果看完材料支持你的观点，我不想让猫妈知道我签了名。光头女马上拿出另外一张纸说，我可以单独给你一页纸。我有些不好意思，解释说，为了她家两只猫，我要很小心维护跟她的关系。光头女马上说，她家的猫吗？确实在这个社区太有名了，我听到不少人投诉它们呢。我赶紧说，我没有投诉它们，它们整天来我这里玩，刚才你进来，她还在这里。光头女说，你说的是那只橘色猫吗？她有一阵夜间经常到我的院子里，被我的夜间摄像机摄了下来，我家老鼠从此绝迹了。我是不会投诉她的。

从我家到她家要有小半里路，李特别灭鼠灭到那边去，真不简单，社区公民协会真应该给这只猫咪颁发灭鼠勋

章才对。当然我没这么说，因为李特别也抓鸟，抓鸟是在白天，扑鼠是在黑夜，有多少人会去注意一只猫黑夜到他们家院子里捕鼠？人都只看见摆在眼前一目了然的一面，何况爱鸟的人恨抓鸟的猫，至于猫的天性是什么，不在考虑范围。

一审再审的委员会

我花了两个星期读完118页的指南，听完数十个小时的会议讨论录音，还打电话去郡规划部核实了一些问题，真是学到不少知识。

两年前，社区人士自发组织的公民协会向郡政府查询，如何能将建筑高度和面积限制列入规划条例，防止开发商进来建豪宅。政府相关机构建议，将社区变成"历史区域"。于是这帮社区人士接受了郡政府这一建议，由政府提供2.5万美元，雇一个由两位女性建筑师组成的建筑顾问公司，写一份"历史区域"指南，再由政府职员协助社区人士组成工作小组，向居民解读指南。每次会议录音和报告都被放到了郡政府的网站上，任何人都可以去查看收听。

这份指南详细介绍了本区的建筑历史和特征，根据美国内政部部长的历史建筑规划指南和一个叫作建筑审核委员会（ARB）的审核范围，解释了建立"历史区域"之后，社区屋主或开发商要装修或推翻重建时，需要遵守什么样的规定和走什么样的申请程序。

根据光头女的说法，不少人听完解释后大失所望——指南里并没有明文限制建筑高度和面积，却给屋主装修时设置了许多限制，比如门窗朝向和颜色、车道宽窄、停车位大小、园林护墙围墙高矮等。

更过分的是，社区中有50多间房子被划为"无代表性"，意即这些房子因装修过，已经失去了历史特征，也就是说，此类改建以后将不会被批准。我拿着这张地图去这些房子实地查看，发现除了两三栋属于豪宅型大屋，其余既融入环境，又给社区增加了美感；一旦被划为历史区域，以后屋主装修，只能跟70年前的设计和材料完全一模一样。那便再也不会有人花心思做审美改造，毕竟，70年前开发商走的是廉价开发道路，房屋设计本身都极简单。像我这样爱美爱折腾的买家恐怕就会驻足不前，年轻一代更会嫌限制太多，那么社区是否会老化衰退？

更加繁琐的是，如果成为历史区域，申请室外装修，要先向建筑审核委员会递交申请，郡规划发展委需参照其意见核发建筑许可。这个建筑审核委员会由郡政府委任的九名专业志愿人士组成，目前有五个建筑设计师、一个律师、一个园林设计师、一个历史建筑保护专家、一个规划师。其中一个华人、八个白人（两位女性）。他们每月开一次会，审核任何跟历史建筑有关的装修改建方案。

社区工作小组花了大量时间，询问建筑审核委员会的审核标准和工作方法，甚至还看了某次月会审核申请的录像。他们在三小时里审核了近十份申请，几乎都是已经被打回去补交资料修改设计的重审。这些申请经九人举手点票，有的被通过，有的被拒绝。被拒绝的按照建议重新修改设计，再次提出申请。

审美权不能交给别人

我变得矛盾了。

一方面，我希望能保存社区的环境特色，不希望开发商进来盖大屋。之前住的社区因为学区好，每年都会有人买下旧房翻盖大屋。我在那里生活20年，目睹周围大树一点点消失，绿色空间被豪宅侵蚀覆盖，出门散步四目环顾都是水泥人行道和大宅，这也是我要搬离的原因。

另一方面，看过审查视频后让我明白，从法律上，即使是历史区域，政府也不能阻止屋主在尺寸上加高加大，但不允许改变房屋外形，非常死板教条，这是我无法接受的。我希望有一条中间道路。在没有找到中间道路之前，我们不应该贸然行事，一旦变成历史区域，就无法撤销，何况现在要后退都已经有很大困难。

我在电话里向儿子报告了这件事。他说，这不就跟三藩市一样啦，限制多多，要改建非常困难，所以房屋紧缺，房价高涨。我说，要是房价真会因此高涨也就罢了。这里跟三藩市不一样，附近有的是房源，谁会来抢你又旧又小又麻烦的房子？我担心的是社区因此老化，觉得应该有更好的办法。另外，我还担心李特别她妈，这左邻右舍都是赞成派，她要知道我是反对派，以后可不好相处了。儿子说，你管他们，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好吧，我决定上郡投票网站去投反对票。我反对，不是因为我个人会有太多麻烦。我已经把阳台拆了，停车位加了，如果不让我在车库上加高，我就把现有的纱屋改造成四季使用的大玻璃画室，会比加高更省钱省事，也不触犯任何规划条款。我是不想把建筑审美的决定权交给几个所谓专业人士，美的感觉因人而异，建筑师的风格也多种多样。

我在投票备注里说明，那个建筑审核委员会月审会的视频给人的感觉不好：有一两个意志很强又吹毛求疵的人在主导，过程公式化，没有对历史特征和审美关系的讨论。屋主可怜兮兮地央求他们放他一马，因为他已经按照他们之前的要求把图纸改了又改，他买的房子太旧太小，不改无法住下全家人。其实，图纸显示，他改造后的房子比现在好看太多。反对的人纠缠门的朝向，说他把大门改成朝街了。最后以五比四通过了修改方案，屋主还当即落了泪，我也几乎为他流下高兴的眼泪。看到这情景，谁还愿意把自己房屋的维修权交给这个委员会？

在光头女的带领下，一场推翻"历史区域"的游说签名运动在今年夏天展开。最后，郡政府在10月底公布了居民

投票结果——52.5%反对，45%赞成。郡监督长在公听会上无奈地宣布：撤回将我们这个社区设置为“历史区域”的计划，但是郡政府会保留所有资料，以备以后我们的社区再提出此要求。

头发花白的郡监督长在总结语里提道，有人批评建筑审核委员会的工作方式，她认为这不好，建筑审核委员会是专业人员义务出来为大家服务，不应该批评他们。这不是指我的留言吗？你不检讨自己的官僚机构给几个人过大的权力，伤害了纳税人，不喜欢人家指出你们的管理问题，却不知道自己失败的原因在哪里，这样的官僚应该早点退休才对。

推翻计划后，我赶紧到后院把新冒出来的竹子挖了砍了，好让猫妈心里好受一些。毕竟紧邻关系更重要。

版面编辑：刘春辉

专栏｜奥斯丁笔下的和谐社会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2年第47期 出版日期 2022年12月05日

在奥斯丁看来，英国传统的精华就是讲礼貌，以她的眼光，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算太坏，粗鄙的利己主义者才不可救药



2005年电影《傲慢与偏见》剧照。

文丨王芫
作家

这学期我有一门简·奥斯丁课。奥斯丁的小说我早就读过，但经过了生活的锤打，再读奥斯丁，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笔下人物的说话方式。比如在《理智与情感》中，威洛比辜负了玛丽安，之后又来她家求原谅。姐姐埃莉诺出来接待他，说了这么一番开场白："威洛比先生，你肯定能感觉到，反正我能感觉到，发生了那么多（不愉快的）事之后，你却不请自来，非要让我注意你，你这种行为想必是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到底是什么理由呢，不妨说来听听。"这其实就是说："你还有脸来我们家？"可是，奥斯丁偏要让人物说话千回百转，虽然也不乏机锋。

那么，我所说的生活的锤打是什么呢？话说我女儿和她男朋友今年大学毕业，两人被不同学校的博士项目录取，却分别向各自学校申请了间隔年，打算用一年时间周游美加。毕业典礼上，男方家长问我对间隔年怎么看，我直截了当说不赞成。我问他们怎么看。答曰："非常酷，然而我们很高兴自己已经过了这个年龄段。"我问儿子：他们家也是不赞成吧？儿子说：他们的意思是有利有弊，但总的来说还是酷。

我开始怀疑自己。毕竟除了我，他们都是英语母语人士。没想到，男方父母把我的意见传达给了孩子，造成女儿的男朋友对我有了看法。这证明我的英语理解没问题，只是犯了直率的错误。我沮丧地对朋友说：刚开始过招儿，先输一局。朋友说没什么了不起，年轻人一起旅游，转眼就吵架分手成路人。

好在他们还没分手，我就开始学习奥斯丁。如果以后再有类似的社交活动，我不妨试试奥斯丁式的千回百折，轻敲缓击。

在课堂上讨论奥斯丁，时间主要用来讨论历史背景、思想源流、文学传统之类。但我关注的重点不是学问，对于这些问题的兴趣，远不如小说的作法。然而，天天上课，耳濡目染，慢慢地我对奥斯丁的既定看法就有了改变。

比如，《傲慢与偏见》讲的是什么呢？按我以前的理解，就是出身平凡但美丽智慧的女主角嫁给了有钱有地位的好男人，和好莱坞爱情片的逻辑没区别。学习了奥斯丁所处时代各个阶级的分析，我才意识到，女主角并非出身平凡。在奥斯丁所在的英国，社会的中坚力量是拥有地产的绅士阶级。与此同时，新兴的资本主义又造就了一个拥有现金但尚且无地的阶层。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社会上存在有钱（moneyed）阶层和有地（landed）阶层之间的张力。

《傲慢与偏见》开头，搬到乡村来住的宾利兄妹就是有钱而无地的家庭。他们在乡间租个庄园住下来，目的是择机置产。宾利小姐尽管很有钱，但要提高社会地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嫁给达西先生这种有地的绅士。班纳特一家则是一半一半。班纳特先生是有地的绅士，但班纳特夫人的父亲却是个律师，班纳特夫人的弟弟是个商人，也是属于靠才华吃饭的中产阶级。宾利小姐表达对班纳特家女儿的蔑视，屡屡拿娘家的出身当靶子，同时对自己的财富来源绝口不提。班纳特家小姐们虽然出身不低，但是她们没有财产。这恰恰是因为她们家只有不动产，而英国独特的地产继承制是指定继承，她们家的庄园由父系祖先指定给历代男性继承人。既然班纳特家只有五个女儿，这座庄园就属于一个远房侄子。问题就在于：奥斯丁对此是什么态度？非常遗憾，奥斯丁不是个女性主义者，她没有在作品中表达对男权中心财产制的批判。教授通过大量文献证明，奥斯丁基本上是个保守主义者，不仅不打算改变传统，而且对于传统的断裂忧心忡忡。在奥斯丁看来，理想的社会秩序是有地的绅士阶级仍然有能力创造、吸纳新财富，只是法国大革命对这种理想秩序构成了威胁。奥斯丁只有两部小说明确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其中之一就是《傲

慢与偏见》。小说里写到镇上来了很多民兵，这符合18世纪90年代为了应对法国对英国的入侵威胁而做的军事准备。奥斯丁的全部创作，是要给有钱阶层与有地阶层之间的矛盾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从而避免法国式的动荡。

最终，大女儿简嫁给有钱无地的宾利——旧的传统吸收了新的力量；更优秀的二女儿伊丽莎白嫁给了有钱又有地的达西，巩固了绅士阶级之间的团结。在奥斯丁看来，英国传统的精华就是讲礼貌，而她的女主角无一不是传统的化身。这也就是奥斯丁笔下人物的说话方式让我印象深刻的原因。我还想到，曾有学者批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以奥斯丁眼光来看，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算太坏，粗鄙的利己主义者才不可救药。

不断有人和我讨论上学的必要性。我的体会是，系统的学习常给人泛泛读书得不到的领悟，但学校也并不能提供主动学习者无法接触的秘籍。上学对我是必要的，因为我不是一个主动学习者。如果不上学，我就无法知道什么是我不知道的。

版面编辑：刘春辉

乐此不疲｜经济人的雅好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2年第47期 出版日期 2022年12月05日

虽然生活在现代社会，但正规教育不足以让我们觉得自己与这个世界的联系是坚实的，对某些人来说，越是虚幻的，越是坚实的，因为那不会在验证中受挫



我和W君本是老相识，中间多年不见，再见时，他已是面团团地在喝茶，纠正我说，这不叫喝茶，叫品茶。图：IC photo

文丨刀尔登
诗人

W君一身都是宝。

这么说有些不敬，又一想，W君十九看不到这篇文字，说了白说，这个便宜不能不占。况以我们的交情，他便知道，又有什么办法，难道要再送我些茶叶吗？检讨内心，也没什么不敬，只是"一身"一词近谑，我是知道的，也许谨慎的说法是"W君一家都是宝"，可那样说又不好玩了，且他的宝贝，虽宣称是身外之物，在我看来，不免是身心的外骛，便越在外服，也是他的地盘，修身齐家，本来就是混着说的。

话虽如此，总有些惴惴，好吧，便改说"W君一家都是宝"——这也是实情，我去做客，坐下或站起，他一定要拿眼睛盯着，提防我压碎了什么，或触碰到什么他不放心我去触碰的家珍。他家里的好东西，可谓"琳琅满目"，今年深秋，在太行山中见到满树的野柿子累累如珠，红得耀眼，一时心爱，要恭候"摽有柿"，又没那个耐心，于是向W君借工具来打，果然积善之家，必有长竿子，一讨便有，一击便落。我本来不吃柿子的，一个月来，比屋而封在家中，便将来吃，一边吃一边想，古人拿这个东西当粮食，果然没有错。这是不可不感谢W君的。

我和W君本是老相识，中间多年不见，再见时，他已是面团团地在喝茶，纠正我说，这不叫喝茶，叫品茶。我对茶叶是一点意见也没有的，对W君或任何人的这种爱好也没异议，但对他们描述这一爱好的语言，以及总结出的一些理论，却有些腹诽。这有点像传统绘画，本身很好的，但那些画论真是读不得，况且一种画法自冠以"国"，还挺高兴，断非我想象中的艺术家所应有的脾气。茶亦如此，若不是我们喝酒的人抵抗，怕早就成为国饮了，所以那天我一边"品"一边想，自古茶酒不两立，这么说总是没错的。

座上有七八个人，用的器具是——姑隐其名称——某种陶器。我说我不用这个东西喝，问为什么，我说有拾人余唾的嫌疑，大家变色，然后强笑，我便知道又说错话了。只有W君认为我是可以改造好的，事后居然送我茶叶，还请我去他家参观学习。这又是不可不感谢W君的。到了他家，W君自然又要请我喝茶，喝真正的好茶。他有一块大抹布，还有一个大案子，那案子是通自来水的，在他预备之时，我踱到书架前，先闭上眼睛，跟自己打了一个赌，睁眼一找，果然便赢。那一年赌运奇佳，可惜都是自己赢自己。

我找的书是和周易相关的，一找便找到三四本，易与人生、易学发扬之类的名称——我绝非认为、也绝不敢认为以品茶为爱好的人，必伴有对易学的爱好，或这一倾向有多么显著，只是在我私人的小数据库里，这种机会不大不小，恰足以让我下注。反正这一次我赢了，转身向W君说："您还研究这个？"听到研究二字，W君快活而谦逊地说，只是玩玩，只是玩玩。但据此日和日后的观察，一说到周易，W君和他的多数同好一样，是要顿时魂飞魄散的，往往跌足长叹，以为上古的法术不传，以致神机杜默，我们再也听不到了。

这里要说明一些事情。说到人的倾向，稳妥一点，当使用有统计意味的表达，这并不是说你我手中握有"爱茶的人，爱易经的概率要比不爱茶的人高出23.4%"这样铁板钉钉的数字，而是诉诸概率，本为人类处理经验的基本模式，自觉是这样，不自觉也是这样。不管经验有多狭窄，总要勉力从中提取日后处理事务的借鉴。开明的人，能主动地提醒自己，不要轻易登泰山而小天下，而以扩展经验为务；豪迈者则懒得如此约束自己，但有归纳的机会，不

会放过；古典派的父母教训孩子，特别是在生气时，动辄便说“三岁看老”“你将来算是完蛋了”，斩钉截铁，不留余地，不管孩子的感受，也不管自己的论断从何而来，若日后孩子或竟不证他的预言，也毫无羞愧。

东汉时流行品鉴人物，比如看见这个人在席上这么一动，便见微知著，声称此人现在如何如何，将来如何如何。这中间也有有洞察力的，却往往将细致的观察隐藏起来，而装神弄鬼如蒙天启。风气一起，大家都有样学样，评一百人，只需蒙对一次，便坐拥识人之名声。这种方法的毛病，是将临时的观察和总结，抬高为理性运算的结果，而又从来不肯依照后来的验证，放弃或修正自己的理论，于是大量来路不明的格言和论断充斥我们的语言，引用起来方便之极，反驳起来麻烦之极。

统计意味的表达，“更有可能”之类，并不是否认人类行为有深层机理，也不是要放弃探索，只是当把握不大之时，不要那么胸有成竹，以免绠短汲深之讥。比如W君对茶的爱好与他的其他爱好以及日常行为的联系，只能说是莫须有，既然说不上来，不如不知为不知，避免使用“内在”“深层”“精神结构”之类的术语。而且“精神结构”这东西，就算有，也是将来的人的麻烦，咱们现在的人大可敬而远之，不必一有看不清楚、想不明白之事，就塞到里面，不再管了，把个挺有面子的对象，当地下室来用。

说回来，本来古人更看重龟卜，所谓筮短龟长，连周易的《系辞》里不也说“定天下之吉凶，莫大乎龟”么？但龟卜有一个毛病，要把占得的话刻上去，留待事后验证，这种实证精神虽然可佩，难免自诒伊戚。幸好还有蓍占，卜之不吉筮之吉，把话说得暧昧些，就不用很担心，像《左传》里史苏的占卜，怎么说都不会错，于是法天象地的乌龟，身列四灵，只好沦落到给人捉去煮汤了。至于周易，极有价值的典籍，很不幸成为某类脑筋的逋逃薮，且早已如此。理性是违心的，知识是辛苦的，理性又需要知识，知识又要学习，学习需要勇气，勇气需要道德，道德需要自省。要回避这些庸俗的事务，还有比“舍尔灵龟，观我朵颐”之类的话更安慰人的吗？我们虽然生活在现代社会，但正规教育不足以让我们觉得自己与这个世界的联系是坚实的，或者说，不足以使我们的某些天赋能力，主要是那些最珍贵的、有适当的用武之地，这些天赋没有恰当的表达，往往便以奇异的姿态呈现。比如说，对某些人来说，越是虚幻的，越是坚实的，因为那不会在验证中受挫。

我知道W君做过股票生意，便向他请教，听人说股票有好几百万只，如何知道当买此而卖彼，想必是钻龟揲蓍，深得易占之力了。W君摇头说，并非如此，那个还是要买书看报，观察思考等等。我便说，家有神物而不以日用亵之，真是高人啊，佩服佩服，然而难道就不曾动过心思吗？W君老实说道，不会算，就算会，也不敢用。我更加佩服，盖将爱好与日常生活隔离，W君是个榜样，他虽然对易经爱得深沉，一涉钱财，头脑立刻清明，于是想起孔子当年的抱怨，“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竟是不解风情。

W君的另一个爱好，是摆弄些人或称之为古玩的东西。“古玩”在这里是不恰当的词，但我实不知如何概括。比如他喜欢戴一长串珠子，红红的，常为此敞开胸怀，像是做完心脏手术。这东西玩则好玩，古是不古的，头几年还长在什么洲的什么树上。他还有好几只小核桃，据说也是宝贝，自从我发表了“此物可食”论之后，就不许我碰，自己则搓来搓去，看来一直要搓到皱纹里全是污秽，且渗进去，不用再担心有人会吃，才肯住手。这些都是小东西，他真正的心爱之物，不是瓷的，就是木头的，反正都是不怎么导电的。他将这些东西细心摆放在周围，将自己从现代文明的粗俗保护起来。当然，他也有金属制的东西。一个夏日午后，他邀我去家中喝茶解酒，一进门，先扑向一件铜器，用手去摩挲，我初以为这是某种除秽驱邪的仪式，请问后才知道，原来他新得此物，急欲褪去其“生气”，所以用出了汗的手掌来加速其成熟，至于那过程是氧化、硫化还是氯化，我俩都说不清楚。我便恶毒地想，我在场时用手，若无旁人，说不定还用脸呢。

W君说，他本来也无这些爱好，因为做生意，与人应酬，渐渐地浸染，渐渐地体会到其中的乐趣，且以此交结客户，事半功倍。我听了便为他高兴，爱好而有利于事业者，本就不是很多，W君灵台清明，着实让人放心。比如说，W君当然是热爱中医的，他有糖尿病，喝酒之前，便向肚皮扎一针胰岛素，而不是服用黄芪汤地黄引之类。

最近，W君又增添了两种爱好。第一种是养金鱼，我看了他的金鱼，说此物一声不吭，何不养猫乎，庶几两便，W君嗤之以鼻，说我性格太躁，原体会不到个中乐趣。我忽然觉到W君的安详，顿时惭愧，又悟到世上的事务，没几样W君是认为与己有深切关联的，不像我常在那里瞎操心些——按他的标准——与己无干的事。第二种，是对艺术品发生了兴趣，当然，他喜欢山水画，喜欢尖尖的山，雾气笼罩的水，水边或舟上有个高人，远远在从事自己的爱好，画上再题一句诗，“不如拂衣且归去”之类。我对艺术一窍不通，但文艺连称，我即弄文，他便误以为我总要懂些艺术，向我泄露他的趣味，说是看这样的画，便觉茫茫天地之间，心与身浮，“不定就是定了”。我不懂他的哲思，便说那就画很多很多的水，要山做什么，他说好看，我便说你当去东南，那边尽多这样的山，W君说已去过了，真的好看呀。

W君还有几种爱好，不一一。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曾说他是个大全乎人儿，就差练武术了。如今更要劝他去练武术，对身体好，且我写了这些文字，本该怕他生气的，他若练了武术，我就不用怕了。

版面编辑：刘春辉

逝者丨肯德基传奇总裁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2年第47期 出版日期 2022年12月05日

约翰·布朗（1933—2022）商业领袖



约翰·布朗（1933—2022）商业领袖

文丨财新周刊 沈欣悦

2022年11月22日，曾任美国肯塔基州州长、肯德基董事会主席兼总裁的约翰·布朗（John Y. Brown Jr.）在家乡列克星敦去世，终年88岁。

布朗1933年生于肯塔基州列克星敦，是家中五个孩子中惟一的儿子。他的父亲在肯塔基州众议院任职近30年，担任过众议院议长。在读高中期间，布朗就在一些体育运动项目上表现出众，还逐渐展露出销售能力和商业头脑，在夏天靠售卖吸尘器月赚1000美元。1957年，布朗获得肯塔基大学学士学位，三年后又在母校法学院获得法律学位。求学期间，他已靠出售《大英百科全书》套装每年赚取2.5万美元，还雇佣同学一道销售以增加收入。大学毕业后，他一度加入父亲的律所从事法律工作。1959年至1965年，他在美国陆军预备役部队服役。

上世纪60年代初，布朗让妻子参与经营烧烤餐厅，烤肉店的成功让他认识到快餐业的发展潜力。1963年，他遇到肯德基（肯塔基炸鸡）创始人哈兰·山德士上校（Colonel Harland Sanders），两人决定通过布朗家的烤肉店出售肯塔基炸鸡。第二年，布朗说服风险投资家杰克·麦塞（Jack C. Massey），以200万美元的价格向山德士上校收购肯德基，并向上校承诺，他将永远是公司的顾问和品牌代言人。

1964年至1973年期间，布朗担任肯德基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兼总裁，将肯德基从偏正式的餐厅改为快餐外卖模式。此举果然奏效，公司逐渐在美国各州以及海外开设1500多家餐厅，从此建立起国际声誉。到1967年，肯德基已成为美国第六大连锁餐厅，并于1969年成功上市。

1971年，布朗以2.84亿美元将他在肯德基的所有股份出售给美国烈酒经销公司休伯莱恩（Heublein）。此后肯德基又被出售给百事公司，百事公司于1997年作出重大战略调整，将肯德基、必胜客等餐饮营业拆分独立，成为如今的百胜集团。

在肯德基之外，布朗开始更广泛地投资餐饮业，包括购买并经营Lums、Ollie's Trolley、John Y's Chicken等连锁餐厅，不过它们都未能像肯德基一样赢得盛名。与此同时，布朗还先后购买过ABA的肯塔基上校队、NBA的波士顿凯尔特人队、布法罗勇士队（现为洛杉矶快船队）三支职业篮球队。

20世纪70年代，布朗逐渐成为民主党重要筹款人。因有新妻子前"美国小姐"菲利斯·乔治（Phyllis George）的名人身份加持，布朗充分利用自己在肯塔基州的知名度以及电视广告等现代化竞选方式，凭借"像运营企业一样运营政府"的竞选口号，最终击败前共和党州长路易·B·纳恩（Louie Broady Nunn），于1979年成功当选肯塔基州第55任州长。

布朗在任上发挥自身优势，多任命商界人士而非老牌政客担任州职位，并信守承诺任命了一名女性和一名非裔美国人进入州内阁。但在他任职期间，肯塔基州的失业率从5.6%攀升至11.7%。当州收入低于预期时，他曾将州预算削减了22%。据《纽约时报》，受经济衰退影响，布朗在州长任内政绩可谓毁誉参半。他将自己称为"政策的制定者和财政的管理者"，试图大力吸引投资；为保持州财政能力，他也不得不削减数千名雇员。

1983年12月，在州长任期结束后，布朗参加了1984年肯塔基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初选，但六周后因身体原因退出。1987年，他再次竞选州长但未能成功。

布朗曾一度被曝出个人丑闻。1981年，他因从迈阿密一家银行提取130万美元现金而受到调查，该银行没有按照法律要求向国税局报告这笔交易。1983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调查此事时，布朗声称这笔钱用来支付拉斯韦加斯"一个糟糕的夜晚赌博"的欠债。不过事后他又否认了这一说法，也并未再被指控有任何不当行为。调查记者、作家萨莉·丹顿（Sally Denton）在1990年出版的纪实作品《蓝草阴谋》（The Bluegrass Conspiracy）中提及，布朗的一些朋友曾参与过毒品和枪支走私。

淡出政界后，布朗重掌旧业，尝试开设多个餐厅品牌。1991年与乡村音乐明星肯尼·罗杰斯（Kenny Rogers）共同创立烤鸡连锁店，门店发展到350多家，最终出售给马来西亚成功集团。

2009年，哈佛商学院评选20世纪美国顶尖商业领袖，布朗与麦当劳主要创始人雷·克罗克（Ray Kroc）、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Sam Walton）、迪士尼创始人华特·迪士尼（Walt Disney）、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等人一同入选。

版面编辑：刘春辉